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王辉耀　苗　绿◎著

思想无形，力量无穷

智库，大国崛起背后的无形推手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作者：王辉耀，苗绿

ISBN：978750866712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自序

智库，又称思想库，英文为“Think Tank”，即为公共政策决策者提供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在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正如国际智库研究知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所言：“尽管各国智库数量有增有减，但不可否认的是，智库持续扩展着其在各个国家的影响力，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2015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众多智库被称为“影子政府”“政府的外脑”，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影响重大政策决策、为政府储备与输送人才等重要作用。其实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中国，智库则更为重要。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毋庸置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秘诀之一。然而，这种优势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决策不够科学，甚至错误，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吴邦国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也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过相关估计，认为我国“七五”计划到“九

五”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0亿～5000亿元。注

因此，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独立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思想出口单一、缺乏不同论证的弊病。作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重要形式，智库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使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智库看作中国的“第九大民主党”，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发展智库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发展智库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升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强调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这说明中国的领导层正在主动接纳不同的声音，这种纳谏思想意味着中国思想产品市场的形成。这无疑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智库的活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15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推动智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伴随着顶层设计紧锣密鼓地出台，我国掀起了智库建设的热潮。智库数量的迅速增加对于推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欣喜之余，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智库的发展远未成熟，国内各类智库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境，我国智库在发展格局、专业性、传播力、国际化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诸多差距，要由“智库大国”变成“智库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前景，我们始终是乐观的。且不谈中国源远流长的智囊文化，单从需求侧来看，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种类越来越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需要答案，民众也需要答案，这就是对智库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我和苗绿博士一起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CCG创办前后，我们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三十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国内外智库专家进行了交流探讨。2010年，我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之后，我又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随着对国际智库的认识和深入了解，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智库力量对一个国家崛起的意义所在。一个现代化大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提供智力支持。

2014年，我们撰写了《大国智库》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我们在书里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况，总结了国际智库发展的规律与作用，并勾勒出了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与前景。此书推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与良好的反馈，很多人与我们联络，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国际和国内智库是如何具体建设与运作的。作为智库发展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我们深感这是一份责任，如果能够将智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将多年我们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策划和写作本书。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翔实、可操作性更强，除了结合我们近十年来创办和运营智库的具体经验和体会，我们还多次举办和参与了国内外顶级智库专家出席的研讨会。仅以2015年为例，6月，我们邀请了詹姆斯·麦甘教授在CCG北京总部发表了“如何建设全球化智库”的演

讲。10月，CCG作为中国智库代表受邀参加了在米兰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我们与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威尔逊中心、英国查塔姆社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一起探讨了智库如何参与社会事务和政策决策等系列话题。2016年6月，我们还举办了中国智库创新峰会，邀请国内外顶级智库专家研讨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与八年的实操经验相结合，为大家推出了这本《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在本书里，我们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称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其中，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对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社会传播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的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是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注]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未来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真心期待，中国智库有一天能真正成为中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王辉耀 苗绿

2016年9月18日

---

1. 高福生，朱四倍.决策失误是中国最大的失误[J].决策与信息，2009.
2.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的讲话。

第一章
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可以说，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库在发挥着无形的思想作用。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的英国皇家学会到六次国运转折孕育出的六家德国顶尖智库[注]，从左右政府决策的美国智库到曾造就了经济巨人的日本智库[注]，不论西方还是东方，智库都在蓬勃发展并在影响国家政策的道路上演绎着各自的精彩。

---

1. 这六家智库分别是1908年创建的德国殖民地研究所、1914年创建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IFW）、1925年创建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1926年创建的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1949年创建的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IFO）以及1990年创建的哈勒经济研究所（IWH）。
2. 从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到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恢复元气，日本各类智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智库是什么

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

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心脏”，这颗“心脏”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力地搏动，必然有其独特之处。斜贯华盛顿西北与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Massachusettes Ave）是名副其实的“智库一条街”，众多知名智库皆坐落于此，其中布鲁金斯学会位于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位于1779号……正是这一家家智库，左右着美国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于早在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就将其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了。

智库是什么?

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中如此定义：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智库研究学者戴安娜·斯通（Diane Stone）认为，智库收集、消化和创造出一系列思想产品，主要是帮助政治和政府机构决策，有时也为媒体、利益团体、企业、国际机构和公共社会大众服务。

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E. Abelson）认为，“智库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公共大众”。[注]

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在《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智库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其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在运营层面，智库是符合501（c）（3）税法条款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相关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和观点；在政策层面，智库积极力争将其公众可信度最大化，尽其最大努力发现政治突破口，使专家知识和观点能够影响政策制定。[注]

美国智库学者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国际上学者对智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识。我们对智库的定义是，智库实际上就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智库要有独立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能够影响媒体和大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和参与，能更好地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公共政策的发展、决策、制定与实施。[注]

智库真有如此大的能量吗?

兰德，被誉为“白宫第一智囊”“大脑集中营”。笔者早年留学北美时就与其结缘，记得当时常常会接触到兰德发布的信息，还结识了兰德的几位研究人员。2009年，还曾访问兰德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今天的兰德早已声名在外，不过，其声名鹊起还要从60多年前那次“神预测”说起。“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由友变敌，进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注]，开始了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对抗。1946年，刚成立不久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旗下的兰德项目小组便接到了一

项来自美国空军的研究任务：为空军进行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性研究。同年5月12日，兰德即向美国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兰德认为，人造卫星在未来战争中将非常重要，主张美国制造人造卫星，报告写道，“美国卫星飞船的成就将点燃人类的想象力，并将引发可与原子弹相媲美的效应”[注]。此外，兰德还预测苏联将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遗憾的是，这份报告的超前性与预见性并没有引起美国官员的重视，甚至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束之高阁。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卫星”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斯普蒂尼克”1号(Sputnik 1，也译为“人造地球卫星”1号)，这与兰德的预测时间竟然仅差两周。当天夜里，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次日，《纽约时报》极为罕见地用0.5英寸大写字母印刷了横贯头版的三行标题:“苏联第一颗地球卫星升空；以时速18000英里环绕地球；球面运行四次横越美国。”[注]可见，“斯普蒂尼克”1号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苏联在军事科技上的捷足先登，让美国政府懊悔不已，从此不敢小看兰德的研究。兰德由此声名大噪，并开始在改变美国与世界历史的轨道上一路前行，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智囊机构。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光芒。”

早在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总统时期[注]，初出茅庐的布鲁金斯学会[注]就在“成立美国预算局”的法案中一鸣惊人，时任美国总统哈定曾评价预算局的成立为“合众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政府改革”。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美国政策产生举足轻重的一次影响是在“二战”结束后。1947年12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亚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致信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其对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注]的实施提交一份政策建议。1948年1月，布鲁

金斯学会上交了一份20页的报告，对马歇尔计划的重点、结构、具体操作等方面提出了8项详细建议，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政府采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份20页的报告保证了马歇尔计划的顺利执行。此外，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医疗改革、对外援助政策……布鲁金斯学会的足迹几乎遍布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各个重要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对政府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注]，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采纳，成为新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注]……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本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欧洲，智库的起步还要早些。

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的飞梭，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琴弦，并由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对智库的实际需求。1761年，英国皇家学会一则悬赏新型纺织机发明者的布告贴出来后，“各路精英”闻讯而动，随后各种高效率纺纱机争先恐后来到人间，短短十余载，纺纱机速度竟然提高了100倍，英国纺织业则由此在工业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NIESR）、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

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2014年6月18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场演讲会，并邀请了李克强总理发表了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可见其影响力非同寻常。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二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实现了快速发展，(注)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法国智库与英国及德国的差距较大，然而近年来也开始频频发力，如1979年成立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出版的《外交政策》（*RAMSES*）在全球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亚洲大多数国家建立或独立于“二战”结束后，亚洲智库则是伴随着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如日本的咨询业就诞生于“二战”后，日本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有关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建议》，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战略要看准中国的发展前景》《国际组织、地区共同体、国家和NG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研究报告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注)

亚洲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赋予了亚洲智库一个重要的特点：浓厚的政府背景，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较明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政府的高级“智囊”；韩国发展研究所亦是如此，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 Donald E. Abelson.The Business of Ideas: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in the USA in Think Tank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ed.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2. Andrew Rich.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
5. 张杨.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 参见http://www.nytimes.com/partners/aol/special/sputnik/sput-01.html。
7.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美国第29任总统，任期为1921年3月4日至1923年8月2日。
8.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由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其后，经济研究所于1922年成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于1924年成立，两者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9. 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了经济援助，协助西欧各国重建，这一援助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或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该计划的实施对欧洲各国的发展以及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 将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即在用武力打击美国敌人的同时，通过威慑、劝说和吸引来减少敌人的数量，以此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
11. 奥巴马在竞选中和竞选获胜后，均表示他的政府将摈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并主张在美国领导世界时，不仅要运用硬权力，还应更加重视运用软权力。
12.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 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J］.日本学刊，2008.

智库的力量之源

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ct）。

——布鲁金斯学会

智库究竟有何神奇魔力，能够令各国政府如此倚重？笔者认为，智库特殊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天生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个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可谓这种精神气质的最好诠释。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为智库影响国家政策的源头活水。

高质量是智库生存的根基

兰德公司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独特的预见力闻名世界，被誉为“兰德学派”。从1946年的《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兰德健康保险实验》[注]和《城市低收入人群住宅问题》，1999年的《遏制并接触中国》、2012年的《2025年的中国和印度：比较评估》等研究成果以其高质量影响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设计。

不单单是兰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同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英国的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所，德国的透明国际……几乎每个国际知名智库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惊世之作”。

只有独立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解决者”

布鲁金斯学会将“独立性”与研究质量和智库影响力相提并论。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对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一旦违反，必须离职，这些规定包括：可以在非党派基础上为政府官员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析与建议，但如果是为候选人的竞选或政治组织提供建议，就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而且必须表明其属于个人行为，与布鲁金斯学会无关；在公共场合或媒体采访中不能为候选人代言；不能在竞选中或同候选人的交往中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源，包括电子邮箱账户、助手的时间、计算机以及电话等，也不能使用学会的场地举办政治活动。

据我们了解，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虽然有许多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支持奥巴马并助他竞选，但他们都严格遵守了上述规定。

记得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时，我曾和该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有过交流，他认为，独立性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是能否成长为一家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对此，我深表赞同，只有遵循独立性，才能保证智库观点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解决者”。

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启动了一大批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为美国国务院拿出了682份备忘录，其中，“占领德国”“遏制苏联”“创建联合国”等建议均源于上述备忘录。(注)

在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前夕，奥巴马总统的办公桌上整整摆放了35套来自智库的研究方案。这些方案涵盖：怎么撤军？何时撤军？撤军之前如何做？……这些详尽的政策分析，静静地躺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只等他做出最终抉择。

奥巴马政府发布的首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施政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重视的国际规范、强化联盟与伙伴关系、重视合作与参与等主导思想与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推出的《遗产和未来的道路》中的政策建议不谋而合。而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中提出的推动美国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同样在美国进步中心关于《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中可见端倪。

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国家安全……智库将公共政策领域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影响政策为最终目标。西方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智库与政府之间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在任期结束后，会进入智库工作，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的政府工作经验和人脉从事研究；另一方面，智库工作可以为他们再度进入政府做好知识储备。研究者与执政者之间的身份转化，使智库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每一个毛孔。智库人才进入政府任职，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加大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而智库大量吸纳在政府换届选举后离任的官员，成为高级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提升了智库政策研究的质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不只是国家首脑的更

选，还牵涉诸多政府官员的卸任和空缺职位的人员补充，这就为“旋转门”机制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被福特总统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从政之前，他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离开政界后，他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今天，他仍活跃在美国的“第三轨道”外交的舞台上，影响力着实惊人。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国务卿，她曾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卸任国务卿后，回到斯坦福大学，并进入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加强中美教育交流，CCG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赖斯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联储前主席，在卸任仅两天后，就加盟了布鲁金斯学会，参与学会的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杰弗里·贝德（Jaferey Bade），曾任美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卸任后，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任主任。在奥巴马参与总统竞选时，他在人们普遍不看好奥巴马的情况下选择支持他，于2009年开始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并担任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事务方面的高级顾问。两年后，他离开白宫重返布鲁金斯学会任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资深研究员。

基辛格、赖斯、伯南克……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政要与研究者身份的转换，为美国智库旋转出分量与影响力。

知识和权力的完美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与有效性，而且使智库成为政府储备人才的港湾。比如：卡特政府曾吸纳了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更是大力吸收智库人才，不仅吸纳了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数十位政策专家，这其中就包括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政府高官，还对苏珊·赖斯（Susan Rise）等在内的几十位布鲁金斯研究员委以重任。

中国智库的“旋转门”也有过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朱镕基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任职；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现在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现在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从仅有的一些成功案例来看，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还不够完善，政府与智库之间尚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才双向旋转，到智库工作的政界人士多为退休官员，目的主要是发挥“余热”，而且即使是退休的政府官员，大多也是进入了各种协会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进入智库。

CCG咨询委员会主席由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担任。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第一人，龙永图先生被称为“全球化先生”。近年来，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CCG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的未来之路。“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注]龙永图主席曾表示：“我想在我最后的这些年头里面，拿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打造CCG，使它具有国际影响力。”他和其他国内外政要对我们智库的指导和参与，让我们这家社会智库方向更为明晰，也更有前行的力量。

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注]也非常支持中国智库的发展。吴建民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外交事业，退休后仍为推动民间公共和智库外交积极奔走。2011年起，他欣然担任CCG的顾问,积极参与我们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等活动，鼓励CCG坚持用全球化理念、开放的视野建设智库，鼓励CCG多“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交流，发出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由于现行公务员制度限制，由智库或学界进入政界的概率比较小，少量成功案例几乎都是体制内智库旋转到政府部门的。中国的智库界会聚了大量的人才，一直从事政策研究，应该开辟从智库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和渠道，倡导人才的“旋转”，逐步建立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间的轮换、挂职机制，比如将技术官员旋转到智库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的一个考察条件，又如选取政策研究室等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智库学者挂职锻炼或借调工作的试点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我们希望在顶层设计出台后，未来中国智库的“旋转门”将转出更多精彩。

---

1. 兰德的研究成果为需求方的成本负担（Demand-side Cost Sharing）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基础，堪称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对医疗政策的最大贡献。在兰德研究成果发表后，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公共医疗保险制度纷纷加入“需求方成本负担”的制度设计。
2. 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龙永图在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4. 2016年6月18日，吴建民先生在武汉因车祸不幸逝世。

全球智库新生态

尽管智库数量有增有减，但不可否认的是，智库持续扩展着其在各个国家的影响力，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詹姆斯·麦甘

“智”慧博弈

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2015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落地发芽，或缓慢长大，或步入成熟。从区域分布上来看，除了南极洲外，全球各大洲都有智库的身影，不过，智库在各大洲的分布大格局未有显著变化，北美洲、欧洲仍分别以28.2%、25.9%的比例占据着全球智库的半壁江山，亚洲、中南美洲分别以18.4%、11.3%紧随其后（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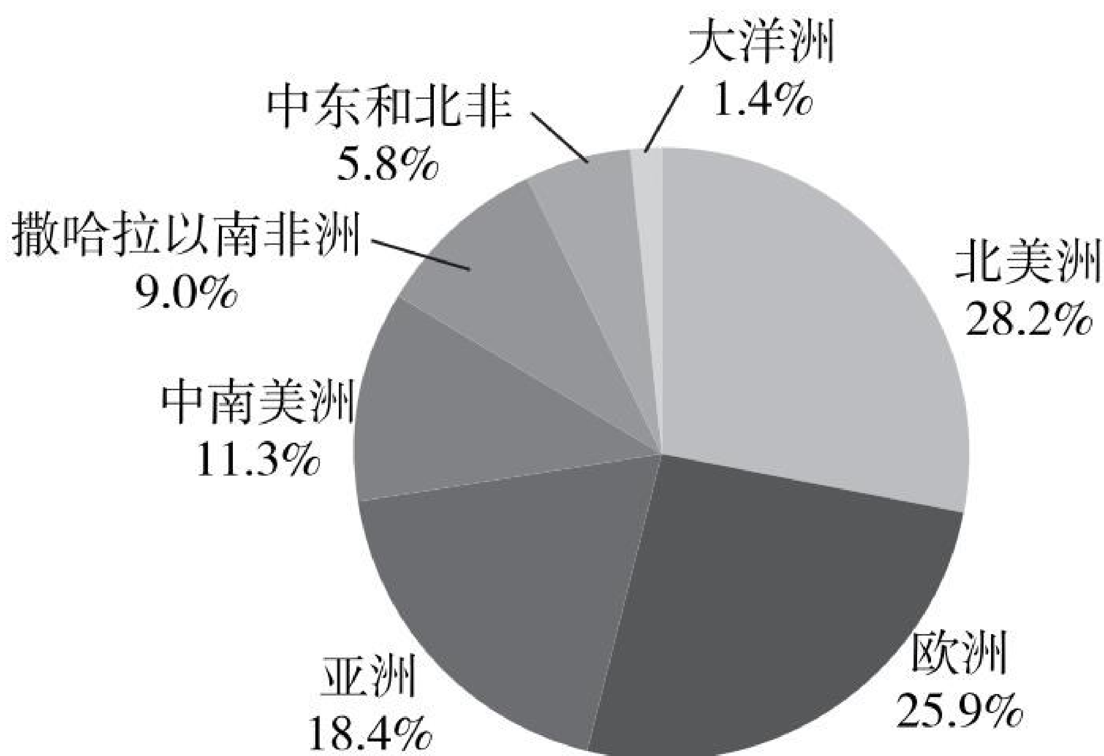


图1.1 2015年全球智库区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根据《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截至2015年12月，全球智库数量达到6846家，较2014年增加了228家。分区域观察，比较前后两年数据可以有如下发现。

北美洲和欧洲仍牢牢占据着传统智库大国的地位。2015年，两大洲在智库数量上虽有所下降，不过下降幅度都在2个百分点左右，属于正常的自然波动。

亚洲、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等全球大部分区域，智库数量都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上升幅度分别达到14.1%、14.84%、31.69%和146.15%（见图1.2）。大洋洲的智库之所以出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还要归功于澳大利亚。过去一年，澳大利亚的智库数量增加了34家，占大洋洲智库增长总数的59.6%。

唯一一个下降幅度较大的区域是中东和北非，下降幅度达到23.61%。分国家来看，这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智库数量下降的问题。智库数量下降超过15家的国家就有5个，分别是埃及（22家）、突尼斯（20家）、约旦（19家）、摩洛哥（18家）和巴勒斯坦（16家），这些国家智库数量下降可能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局势有一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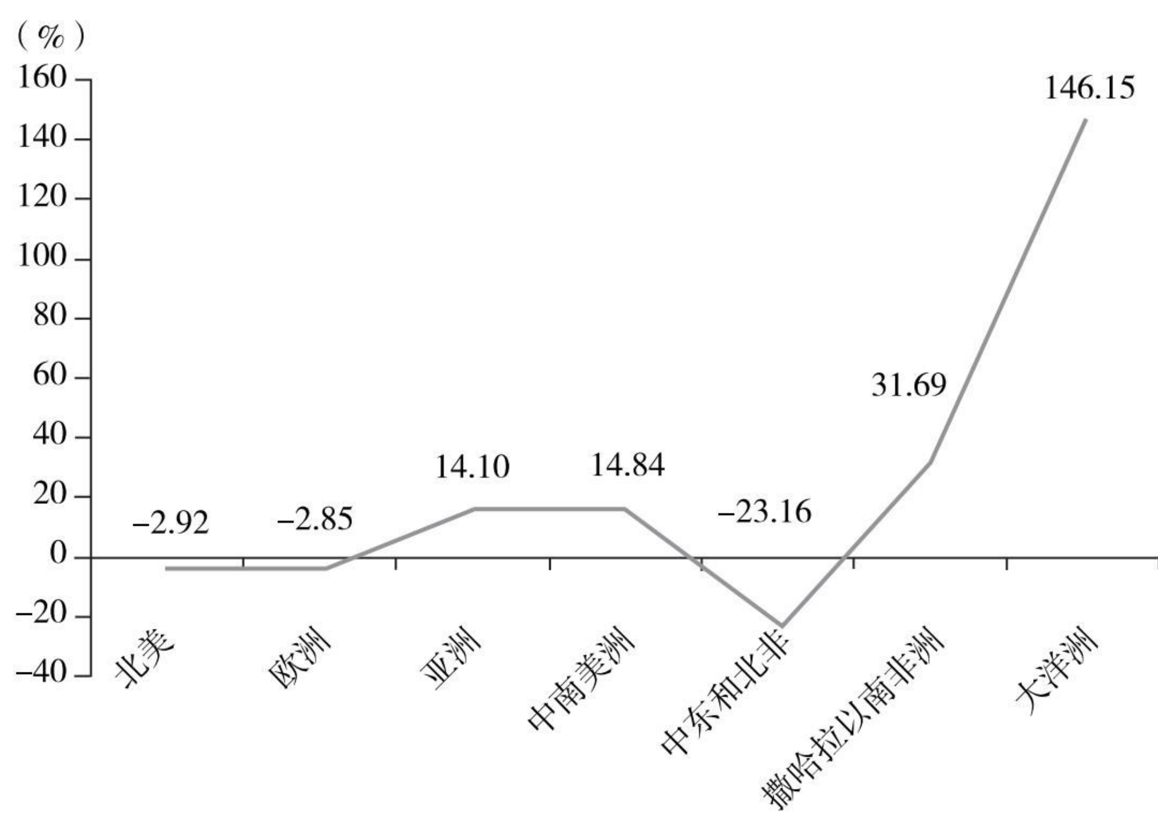


图1.2 2014～2015年全球各区域智库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如果将考察年限拓宽一下，考察对象集中在国家的层面上，我们发现，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基本为美国、中国、英国、印度、德国、法国、阿根廷、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智库数量近年来基本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唯一的例外是印度智库数量在2014年曾出现了大幅波动，下降幅度超过了20%，研究显示，虽然拥有智库的总数居全球第5位，但印度很多智库都是在最近十年中成立

的，大多仍然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印度智库规模都比较小，即使规模较大的在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PR），也只有16位常务研究员以及30位副研究员。大多数印度智库缺乏资金支持，难以有效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注)

我们认为，上述国家的智库数量之所以能稳居前十，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智库的重视程度是分不开的（见表1.1）。稳中有增的趋势充分说明智库的作用与价值在这些国家得到了认可，因此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表1.1 2012～2015年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及智库数量（单位：家）

年份 / 国家	2012②	2013	2014	2015
美国	1823	1828	1830	1835
中国	429	426	429	435
英国	288	287	287	288
印度	269	268	192	280
德国	194	194	194	195
法国	177	177	177	180
阿根廷	137	137	137	138
俄罗斯	122	122	122	122
日本	108	108	108	109
加拿大	96	96	99	99

(注)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时至今日，大国之间的角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智库“智慧”的博弈与比拼，这里的“智慧”包括研究议题的设置、研究成果的比拼、对

政策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均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从国内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治理到国防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全球卫生政策及国际化发展政策，美国智库几乎在所有研究领域都遥遥领先。英国智库则紧随其后，在相关领域也颇有建树，只是在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还暂时缺少顶尖领军智库。(注)德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瑞典、俄罗斯等国家的智库在部分研究领域也榜上有名（见图1.3）。在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研究领域，我们发现了一家中国智库的身影，那就是在该领域全球排名第六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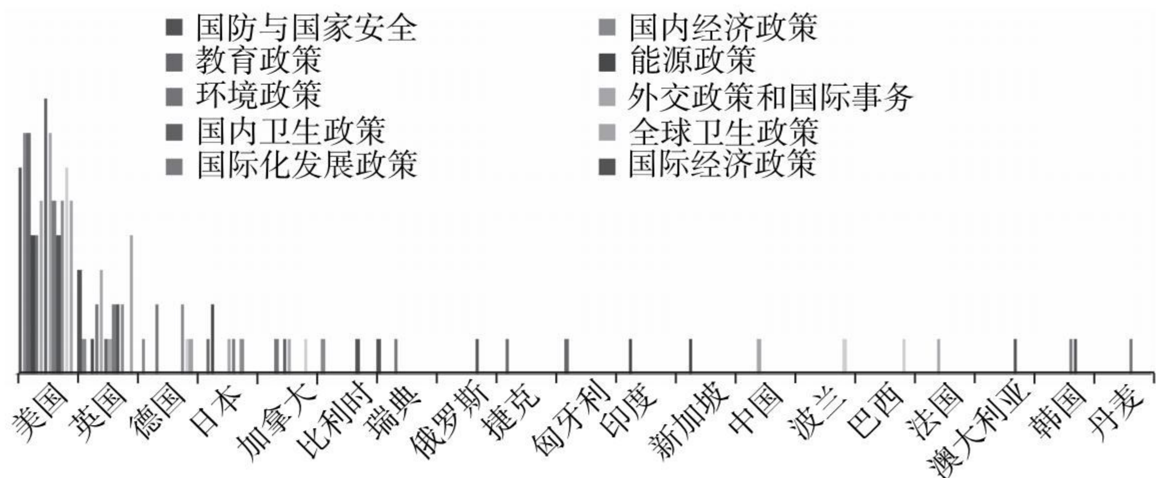


图1.3 主要研究领域顶尖智库的国家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翻开《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我们看到：

欧美国家的智库包揽了全球智库前十强。其中，美国智库独占六席，除了布鲁金斯学会多年蝉联全球第一智库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兰德公司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分别排名第3、第4、第6、第8和第9位。英国智库表现也

很抢眼。在全球智库前十强中，查塔姆社、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大赦国际，分别排名第2、第7和第10位。前十强中仅剩的一席被比利时的布鲁盖尔研究所占据（见表1.2）。

表1.2 2015年全球前十大智库

排名	智库名称	国家
1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
2	查塔姆社	英国
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美国
4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美国
5	布鲁盖尔研究所	比利时
6	外交关系协会	美国
7	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	英国
8	兰德公司	美国
9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美国
10	大赦国际	英国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全球智库11～50强中，欧美智库表现依然不俗，其中，美国、英国、德国三国智库数量占比达到40%。亚洲智库在这一分阶中开始崭露头角，比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15位。中国有4家智库榜上有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1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5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9位）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0位）。

全球智库51～100强中，英国以7家智库上榜成为该分阶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德两国则各有3家智库上榜。这个分阶中，我们同样找到

了来自中国的智库，分别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64位）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2位）（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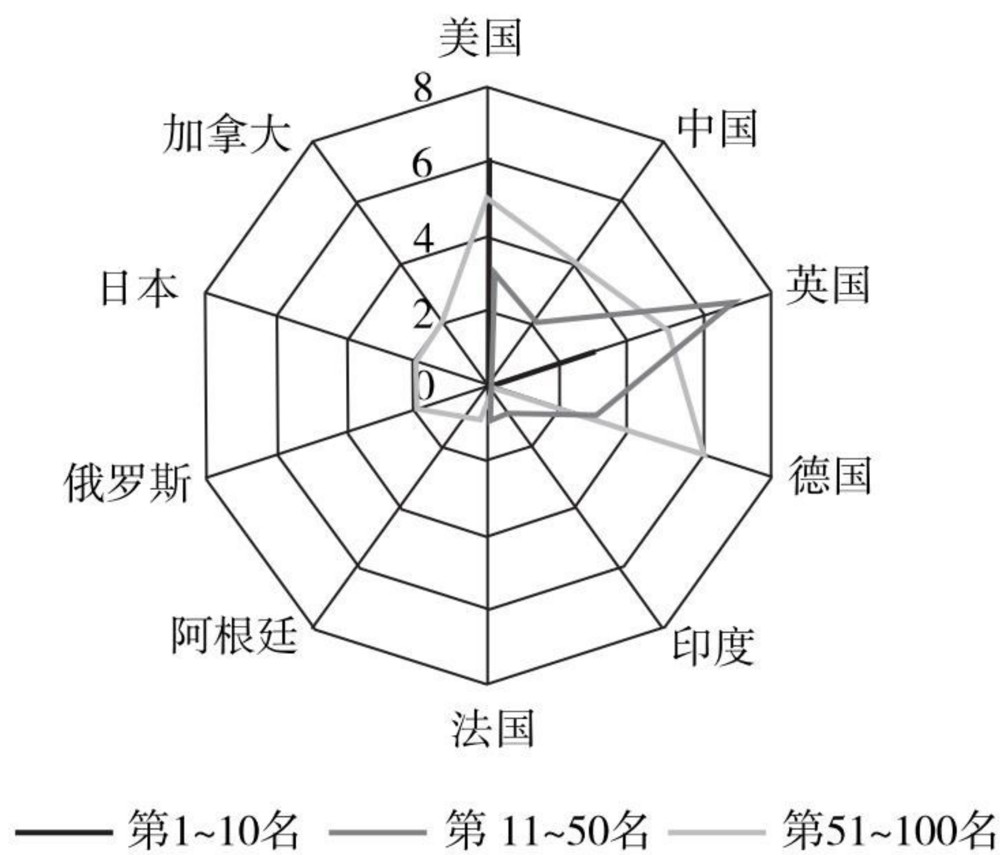


图1.4 智库百强的国家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社会智库发展迅猛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CCG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首次登上全球智库排名前175强的榜单。在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智库100强榜单中，CCG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等同时上榜（见表1.3）。

表1.3 2014～2015年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75强中国智库的排名

智库名称 \ 年份	2014	2015
中国社会科学院	27	3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36	3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40	3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8	50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61	64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71	72
天则经济研究所	—	103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	110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	150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挑战与未来

自“二战”以来，智库一直为各国政府官员所推崇，全球智库数量也发生了惊人的增长。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新建智库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迹象。2015年10月初，《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当今智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了评论，其中一篇来自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的文章《智库过时了吗？》(*Are Think Tanks Obsolete?*)更是将当今智库生存环境的脆弱暴露无遗。

全球智库面临哪些挑战?

· 全球思想市场的“僧多粥少”

飞速发展的科技、日益增加的政策分析需求……全球思想市场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媒体组织、政策游说团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都在通过相互竞争，赢得公共政策以及决策层的更多关注。这种“僧多粥少”的状况对于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 智库融资遭遇“短期化”现象

根据麦甘的研究，过去一小群“黄金捐赠人”为智库提供常年、大量资金支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今天，公众或私人更倾向于对智库的短期课题提供捐助，而不愿对智库的长期运营提供资金支持。智库在融资方面遭遇到的这种“短期化”现象，迫使智库需要不停地接触各种项目，从而才能筹集资金以保证智库的整体运营。于是，为了能够更快速地获得独立研究项目经费，并在市场里保持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智库逐渐转型为某个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

· 金融危机对智库产生负面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削减了公共政策研究的资金投入，这也对智库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2005年，学会顺应全球化趋势制定了新的战略：发展成为全球性智库。接下来的两年里，学会设立了布鲁金斯清华桑顿中国中心和布鲁金斯多哈中东中心。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学会的全球扩展计划被打断，直到2012年在印度新德里建立印度中心。

智库的未来在哪里？

很多智库研究学者都对智库的未来进行了探索，如戴安·斯通（Diane Stone）的《捕捉政治的想象力：智库和公共政策》（*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麦甘的《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产业的策略和结构》（*Th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 in the US*）等。他们认为，智库的未来，除了要保证有质量的研究，还需要重视市场营销与推广，才能应对资金来源、媒体曝光度以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

当大数据裹挟着各种版本的概念扑面而来的时候，当全新的公众参与方法不断涌现的时候，我们认为，智库需要五种力量的支撑以实现自己的竞争力，即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与政策影响力（见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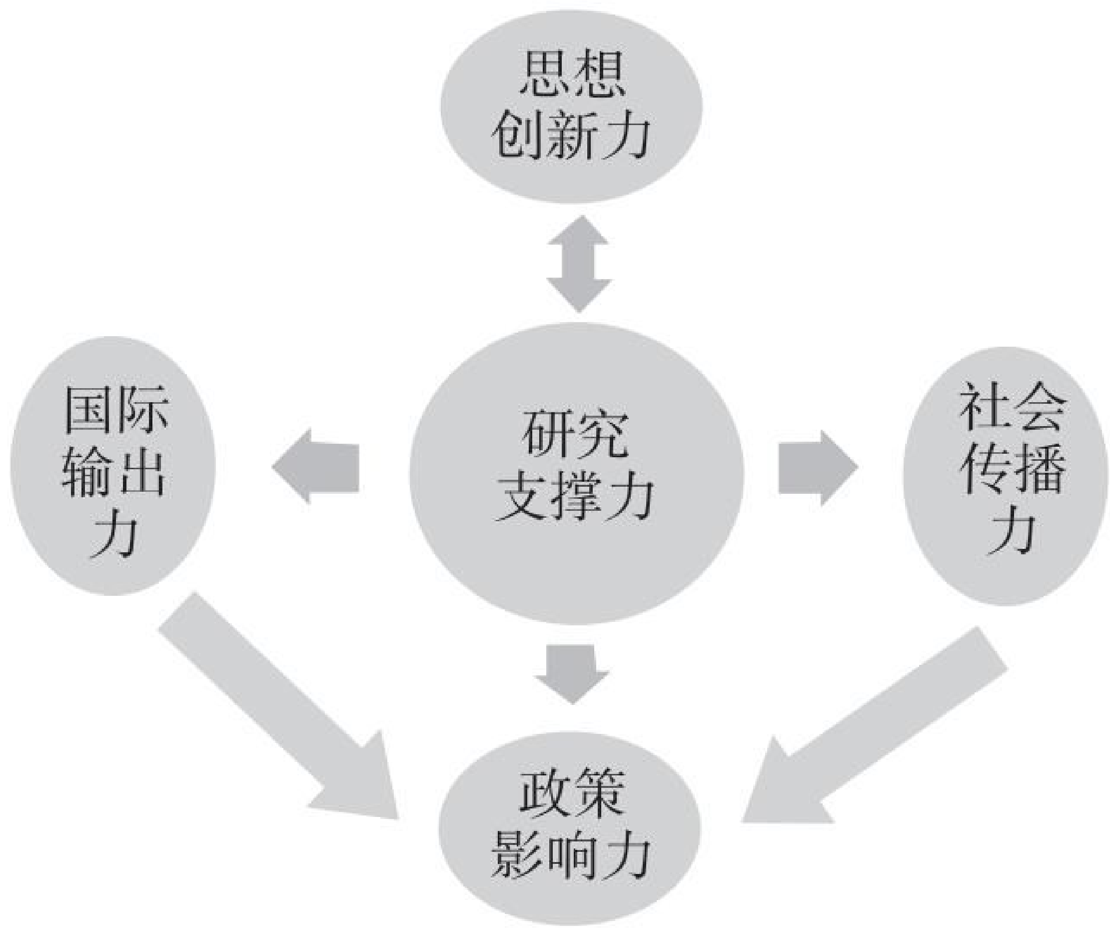


图1.5 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对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这就需要智库与各种媒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的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

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也是智库的最终目标，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

---

1. 李国强.印度智库发展状况概略[J].党政视野，2015(1).
2. 2012年，智库数量排名第十的国家是意大利，数量为107家。
3. 在《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在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两个领域，英国智库没有排进前十强。

第二章
中国步入智库时代

在世界智库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影响一国的世界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深化，智库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属于中国智库的时代已然来临，发展智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民营智库是搞活思想市场的关键力量！

大变革需要大智慧

> “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商品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尽管这些人只占总人口很小的比例，却起着关键的作用。如今中国还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一定会出现。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
>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10.42万亿美元[注]，紧随美国，牢牢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2015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3.3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同年，我国共有106家企业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连续三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数目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随着中国进入对外净投资时代，以中国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正在袭来……这一连串耀眼的数字和事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伟大成就的最好注解。

三十多年，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就是这短短的三十多年却让中国从积贫积弱发展到举世瞩目。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驱动着中国的飞速发展？追根溯源，笔者认为，那是一种思想的力量。

在中国当代发展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年份。在这一年的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了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进行发表，并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转发，这

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否定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的发展主轴才实现彻底扭转；正是有了“思想解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被写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被列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向纵深发展；正是有了“思想解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得以强调；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注]。

这一系列的思想解放是动态的，凝聚了“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几代国家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缔造今日之中国巨大的无形力量。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久远些，会发现思想的力量可谓与生俱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就萌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从春秋的老子、孔子到战国的诸子百家，活跃的思想市场带来的是民智的开发，成就了科技的盛世、文学的宝库和艺术的殿堂。《晋书·天文志上》有云：“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经。”其中，后人将甘德与石申著作合并而成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物理学上有《墨经》，文学上从《诗经》到《离骚》再到诸子散文……有一本书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四书五经铸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五霸开创了谋略计策的典范，战国七雄构建了现今中国版图的框架。”[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多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注)的名言来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无独有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连任演讲时也曾引用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注)，表示要将古人的智慧运用到工作中，推动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大时代。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深陷金融泥潭的各国纷纷力求自保，就连一向信奉市场信条的美国，也断然抛弃华盛顿共识，启动大规模政府干预，这场危机足以颠覆人们的固有认知。2008年的中国经济，同样感受到了这股金融寒流的瑟瑟寒意。(注)危机再一次将我们的政府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危境之下，政府伸出援手，一个史无前例的“4万亿”刺激举措(注)横空出世。尽管短期内，中国经济在全球呈现出了一枝独秀(注)。但是，我们对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更应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注)

目前，我国经济陷入了增速放缓与亟待转型的两难境地。飙高的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的高污染低技术制造业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老百姓感受最深的一项是雾霾笼罩严重影响健康，“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对中国来说，雾霾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环境灾难，更是对过往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告。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简政放权方能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削其手中权、去其部门利，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正所谓“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那么未来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真正做到不该管的不管、应该管的务必善为？如何打破权力寻租空间，铸造反腐利剑？

公平正义方能保社会长治久安。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注]为0.462，尽管实现了七连降，但仍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蛋糕做大的同时仍未实现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教育、养老、就业、医疗、户籍……一连串的矛盾就好像埋藏着的一颗颗危险种子，随时可能发芽[注]。

放眼国际，我们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

市场、资源、技术、管理、人才……一切都在全球中流动，也在全球中展开竞争。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迎接我们的是陌生的环境与激烈的全球舞台竞技。同时，为了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各国政府更是各出奇招。仅以人才争夺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各国都在人才争夺战中纷纷“亮剑”：人才移民、留学聚才、海外揽才，所有政策都在剑指全球人才。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学习与摸索中成长，然而，未来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可能并没有现成的参考答案。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新舞台上，如何提升中国的全球话语权？如何吸引并留住国际人才？如何成功开拓国际市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发展至今日，新一轮的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搭上持久高速增长的列车，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参与竞争和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注]（以下简称“深改组”），并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空前的高规格配置与定位，使深改组甫一出世，就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2014

年，短短一年间，习总书记前后主持召开了八次深改组会议，从战略层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而这一系列的改革与深化，都需要中国智库的支撑。

“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都很重要。”罗纳德·科斯的话语至今仍响彻耳畔。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度提及思想市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性。在2011年《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科斯发表致辞，他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惊人成绩的同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2013年1月，102岁高龄的他在接受中国某媒体采访时再次指出：“今天的中国还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一定会出现。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如果凝聚到一点，必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辉煌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还是“大国崛起”的序幕？我相信正在进行的改革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大变革需要大智慧。在中国政府大刀阔斧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丰富、活跃与竞争将有利于改革的探索、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毋庸置疑，思想市场将驱动中国未来！

---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万亿元，按照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折合为10.42万亿美元。

2. 理论创新主要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三个解放”；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及关于政府职能等八个方面的新论述。

3. 龙镇.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4. 引自《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5. 参见2011年6月21日，潘基文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誓连任后的发言。

6. 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大约有40%的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只有20%的企业受到了轻微的影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3亿中国农民工中，有超过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而失业返乡。

7. 2008年11月9日，我国宣布把经济增长重点从出口转向内需，并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廉租房、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8. 2012~2014年我国GDP增速依次为7.7%、7.7%、7.4%，同期世界GDP增速为2%左右。

9.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的发言。

10.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它是一个比值，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

11. 这里指因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12.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担任副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

> 智库是思想和创新的“催化剂”，对于一个像中国一样在经济上飞速发展并在国际上不断崭露头角的国家来说，求助于这些机构以帮助制定它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并不令人惊讶。智库和身在其中的学者们的贡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国际政策、重大战略和安全问题领域。[注]
>
> ——詹姆斯·麦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智慧。战国四君子中，孟尝君喜欢结交人才，并“舍业厚遇之，以至食客数千人”[注]。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亦是广招门客，网罗人才为各国服务。刘邦将张良、韩信与萧何招至麾下，开创了汉家江山……中国几千年来从不缺乏为君王将相服务的“智囊团”，此可谓智库雏形。

智库是国家的智囊，是进行思想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提供创新思想为其存在要义。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于19世纪，在欧美等国家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背景下才正式登台亮相的。时至今日，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小到儿童午餐、社区卫生，都能听到智库的声音。随着智库在全球事务中独特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彰显，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纷纷加强本国智库建设，全球正迈入一个全新的智库时代。

其实，在中国，智库更重要。

“第九大民主党”

同西方相比，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毋庸置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秘诀之一。然而，这种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决策不够科学，甚至错误，那么带来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甚至是灾难性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中国人民大学毛昭晖教授从国际视角分析认为，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约5%。世界银行也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了相关估计，认为我国“七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0亿～5000亿元。

公共决策是复杂的，而在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公共决策变得更为复杂。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的失误呢?

古人云，“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注]。我国政府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国家将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的报告，可谓十八大的重大历史贡献与理论创新。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作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重要形式，智库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使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更加民主。笔者想，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智库看作中国的“第九大民主党”，发展智库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发展智库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升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通过智库体系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民主协商；能够在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市场竞争，同时又能够有助于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有效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能帮助提升中国软实力，促进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出去”。

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重塑政府形象，许多西方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府再造”运动[注]，治理理论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理论家们提倡多元主体治理，在“政府”与“市场”二元观点中，加入了“社会”这一新单元，开启了一个新的管理模式。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就像鲍勃·杰索普在《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中所说，“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败”。

国际上，治理理论主要有以市场、网络和国家为中心的三种不同研究视角。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学派认为，治理就是指政府做事的方式，因此将国家作为中心应是探讨治理问题的最佳途径。他们将国家看作在变动的环境中稳定的治理结构和有规则的政策过程的主要把控者。[注]这种视角更加适用于现实中的中国。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何谓国家治理体系？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一整套国家制度。何谓国家治理能力？即运用上述一整套国家制度来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这其中涵盖了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一言以蔽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智库在其国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的国家治理研究几乎同时启动，并在过去近100年间影响着美国甚至世界的变迁。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智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情况，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注]作为公共政策有效供给的一个途径，中国的智库不但需要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需要对占全球1/5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若干重大问题找到答案。

打造国际话语权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国际话语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它应该包含对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对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是非曲直的评判权。“话语即权力。”[注]今天的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大多由西方主导，中国则常常扮演“被动防守”“疲于应付”的角色。归根结底，中国还是缺少能够在国际上准确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力量。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谋求相应的地位？我认为，国际话语权是一项极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顶层设计、生产、传播等诸多环节，而智库无疑是这项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过去几十年里，诸如“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等流行于国际的政治概念多出自大国智库之手，传播于世界各国之间，引领着全球思想大讨论。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很好地扮演了议题设定者与舆论引导者的双重角色，长期占据着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中国能否取得与国际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智库能否拿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等方面的前瞻性议题设计，能否做出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还几乎没有提出过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话语范式。[注]对于中国智库而言，打造国际话语权将是一场“持久战”。

民间外交的使者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美国前副国防部长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曾说，“智库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较于政府之间的“一轨”交流，国与国之间有时更需“1.5轨”“二轨”交流，因为这些交流方式更为灵活与自由，可以成为日后政策的“先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举办过长达8年之久的会议，召集南非各界人士，开展了在南非政治转型期间的首次对话。2004~2006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又聚集中美台三方外交领域的官员和学者，持续对话，从相关危机事件中吸取经验，探讨更好的危机解决办法，并将相关政策建议反馈到中美决策层中。[注]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组织了香格里拉对话，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了帮助以色列消弭宗教世俗分歧，推动希腊与土耳其对话……国际知名智库起到了外交“第二轨道”的作用，在双边、多边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

2011年10月，CCG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举办了中美投资论坛，针对美国国会当时正在辩论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倡议美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到美投资提供更多便利。2015年12月

初，巴黎气候大会落下帷幕。CCG在第一时间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为解决气候变化、环境挑战与健康问题建言献策。2016年7月，在美国总统大选激战犹酣之际，CCG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进行了一场中美智库之间的对话，我们邀请了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等多位国内外知名中美问题研究专家，共同围绕着“从总统大选看中美未来走向”的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火花，戴博认为，“如果希拉里当选下一任总统，她可能比奥巴马强势一点，基本的方向是深化和继续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未知性很多”。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戴博则认为，“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各方都需要冷静下来，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总的来讲，中美双边关系是很成熟的，中美应建立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共同管控危机”。

以何种身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非常关键，尤其是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政府间沟通不畅时，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作为第三方是担当“民间外交使者”的最佳人选。智库可以通过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做政府不便做或者难以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于中国尤为重要。

---

1. 詹姆斯·麦甘.美国智库是如何取得成功的？[EB/OL]. FT中文网，2015-09-22.
2. 引自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3. 引自《尹文子》。
4.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政府纷纷加大了对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随之不断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遭遇经济滞胀、石油危机后，社会经济衰退，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并最终陷入严重财政危机，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府形象大大受损，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在困境和危机面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角色与政府管理问题。
5.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6.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在“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7. 1970年，米歇尔·福柯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的著名论断。

8. 章玉贵.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N].上海证券报，2009-07-06.

9.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 1986~1991年，戴博在美国新闻总署任驻华外交官，开始了他的中美关系职业生涯。他曾担任过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2013年9月至今任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最佳机遇期

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习近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2015年春天，笔者与经济学家钱颖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等一起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有幸成为“政府智囊团”中的一员。国务院参事室距离中南海仅两公里，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议下于1949年设立的，主要职责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等。作为兼具统战性与咨询性的政府“智库”，国务院参事室在成立之初就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1949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遴选任命32位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参事至今，60多年来共有235位各领域的精英被聘为参事。国务院参事室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智库的正式诞生。自此，中国智库开始在历史的轨道上蹒跚前行，一路书写着自己的成长轨迹。60余年后，随着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接连出台，中国智库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最佳机遇期。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注]。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各大媒体持续聚焦“智

库”，“布鲁金斯”“兰德”等国际顶尖智库一时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对外交流等方面为中国智库指明了发展方向，拓宽了发展舞台。

2014年7月底8月初，《人民日报》连发三篇文章(注)，深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破题攻坚》[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一文，引用CCG观点，文章写道：“尽管发展机遇就在眼前，但是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智库运转中仍存在几个重要障碍，包括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及沟通渠道不畅，智库相关法律政策缺失，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以及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等，只有将这些障碍一一突破，才能实现智库的良性运转并发挥最大功效。”

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研究对象与宗旨进行了界定后，提出了八项基本衡量标准(注)。

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采访时，笔者曾就“中国特色”和“新型”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是基于与欧美智库的横向比较来说的，我国智库是服务于国家

战略与公共政策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最终目的的研究机构，智库之间只存在实力的竞争，应做出客观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新型”是相对于我国过去的智库发展状态的纵向比较而言的。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面临各种转型和挑战，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新型”智库就需要进行更前沿的研究，做出更具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推动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

令智库建设者们感到振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智库的作用和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他首先将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注]，继而将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外交的层面[注]，并将其纳入深改组讨论议题[注]。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从而将智库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

顶层设计层面给予中国智库的利好政策，可谓接踵而来，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情况进行的总结如表2.1所示。

表2.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情况

年份	政策内容
2012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2013	4 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做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首次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为我国智库指出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指出我国智库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求智库加强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4	3 月，习近平在对德国进行访问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应加强政府、政党、议会以及智库的交往。“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不断拿出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2015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3 月，习近平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希望党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智库。中央党校有发展智库的很多资源，学科设置比较完备，专家学者较多，特别是来自各地区各部门的学员资源丰富，可以形成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共生多赢的优势。党中央已经把中央党校列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名单，要抓住这个机遇，在智库建设上取得新成绩”
2016	5 月，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当今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各国政府的决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政策评估及国际经验与日俱增，只有扩大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增强决策的信息透明度，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我国政府将对智库的重视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说明顶层决策机制将更加民主化与科学化。我们深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 分别是《中国智库，迎来春天》[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破题攻坚》[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特色、新型中国智库的必然选择》[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3)]。
3.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八项基本衡量标准分别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
4. 2013年，习近平同志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详见表2.1。
5. 2014年3月，习近平访问德国时提出观点，详见表2.1。
6. 2014年10月，深改组第六次会议提出，详见表2.1。

智库热的冷思考

智库，其核心是“智”，“有库无智”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

——郑永平[注]

自1949年11月政务院参事室成立至今，中国智库历经六十余年发展，从智库数量上来说，我国已称得上全球“智库大国”，欣喜之余，我们也看到，中国智库发展远未成熟，国内各类智库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境，我国智库在发展格局、专业性、传播力、国际化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诸多差距，要由“智库大国”变成“智库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思想市场的“百花齐放”尚待时日

曾与科斯合著过《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的王宁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变革的力量源于两点：一是来源于北京，二是根植于民间基层。我想，如同民营企业的发展活跃了中国经济，民营智库的蓬勃也终将激活中国的思想市场。然而，中国的民间智库虽然与市场经济几乎同时起步，却没有走出与市场经济相似的成长轨迹，无论是智库数量还是影响力，以官方智库为代表的“体制内”智库依然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民间智库则处在尴尬的边缘位置。

“智库作为社会各行业中专业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如果缺乏民间性以及第三方的公共沟通性，很可能会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民意就会在

政策制定中被疏漏。”这样一来，“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与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注中国思想市场目前的这种“失衡状态”严重限制了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力，更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我们需要大力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发展，激活政策研究市场和思想市场，加强不同智库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和优化的机会。

·智库之间的交流共享有待加强

智库要为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会聚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运用集体的智慧为决策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智库应该是一个研究共享平台，“开放”应是打造高质量有国际影响力智库的关键词。

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中国的官方智库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联系网络，更不用说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共享了；地方层面上基本呈现以各省市的研究中心为主导，相对封闭的局面。国内智库需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真正相互联系的网络，同时也要和国际上的智库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联系机制，这种联系机制可以是紧密型的，也可以是松散型的，可以是组织结构层面的，也可以是具体项目层面的，如此才能在多元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中找到更好的答案。注

·新媒体传播力亟待提升

与欧美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依然落后。

以智库网站为例，詹姆斯·麦甘曾将大多中国智库的运营比作“黑洞”，因为这些智库没有网站或者网站更新速度太慢，有双语网站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我们的欧美同行则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布鲁金斯学会

网站约一半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布鲁金斯学会还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受众需求的改变，对新媒体传播策略进行动态调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为了激发公众对重要议题的参与和探讨，2013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仿照《纽约时报》的“雪崩”（Snow Fall）传播模式[注]，在自己网站上制作了数字化专题，专题推出后，网页的停留时间提高了125％，其中72％为首次访问者。

网站、推特、Facebook、Youtube、Vimeo……为了将研究成果以创新的方式展现给公众，欧美各大智库着实做了“不少功课”。相比之下，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还需“快马加鞭”。

其实不仅仅是新媒体传播，很多中国智库都缺乏宣传推广的意识。这与很多智库具有官方背景，不存在研究经费问题，不需要通过研究成果的传播获得社会资助有很大关系。另外，很多智库是由学术科研机构转型而来，智库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在自己的圈子内部进行交流，缺乏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的意识。

·国际化之路任重道远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外顶级智库不但将研究课题从国内延展到国际，牢牢把握全球话语权，更有许多智库直接将触角伸到国外，“洋智库”来中国“抢生意”之事不绝于耳。反观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论调此起彼伏，这些对中国崛起的扭曲与误读，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缺少能够在国际上准确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力量。

大国崛起，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这方面，中国智库责无旁贷。我们看到，国内一些智库已开始国际化实践，如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包括我们自身都在积极进行着国际化的探索和努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

智库国际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还远远满足不了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关系的需要。绝大多数国内智库的研究还囿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

作为智库从业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智库可以很好地充当“宣传和交流大使”，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国创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与政治影响力。国内智库需要加快国际化步伐，从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人才队伍到传播方式及影响力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警惕“跟风”现象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在媒体的强势传播下，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发展现象之一。有关机构统计，仅2014～2015年，中国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就达到了5000家左右。社会智库发展大有“一哄而上”的态势。各类机构都在建立附属于或独立于自身机构的研究部门/机构，而且都被冠名为“智库”，如一些行业协会找几个专家写几篇文章号称智库；一些咨询公司和公关公司名字变成了“智库”；一些媒体利用信息资源和专家资源优势建立的智库；一些企业下属的研究机构更名为“智库”；一些高校建立独立政策研究所，响应智库发展的号召。但是，根据严格的独立性、政策性、公益性的定义，如今的很多智库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库。[注]

《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我们首先应依据《意见》提出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资金来源、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等八项基本标准来辨析当下的各类机构是否属于真正的智库。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以党和政府的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非其他研究目的，同时应注

意，必须是非营利性的研究咨询机构。在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某智库或者决定某机构是否要智库化转型的最关键标准，是其研究领域和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及其研究优势。

·客观认识智库排名

在智库体系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对智库进行排名和评价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有利于不同智库科学认识自身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国际上权威的智库排名和评价，有助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智库与国际上的知名智库进行比较，学习国际领先智库在研究、运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完善运营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的研究质量，共同促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同时还可以通过权威评价的认可，从而增强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一拥而上、重复泛滥的智库评价排名，特别是要避免智库、咨询公司等相关机构进行智库排名，防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影响公信力的现象产生。

对智库的评价，应该由智库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科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以真实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并系统总结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发展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应尽早建立中国智库的行业标准，提供全面、系统的智库评价依据，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促进我国智库体系健康发展。

---

1. 郑永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 牧歌.探索中国智库发展的成功之路——写在2009年首届全球智库峰会闭幕之际[J].今日中国论坛，2009(8).
3. 龙永图在智库创新峰会上的发言。

4. 2012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上线了一个全新形式的数字化专题报道“Snow Fall”（雪崩），一周内创造了350万点击量和290万访客的纪录，其中，有接近1/3的人是首次访问《纽约时报》的网站。

5. 王辉耀，苗绿.中国社会智库的运营创新探析[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2).

第三章
智库创新运营三要素

智库最宝贵的资产是人的大脑，一流智库建设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流的人才；独立性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财务独立更容易保障思想独立；影响力是智库存在的理由，也是智库建设中应着力锻造的无形要素。

智力资本

智库的声誉与研究质量有赖于智库能够吸引到的董事会成员、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等智力资本。

——安德鲁·西雷（Andrew Selee）㊟

智库是知识精英的港湾、学术建议的源泉，全球“智慧大脑”碰撞与交流的国际平台，常被形容为一个国家的“智商”，而智库的核心资本就是智力资本。

会聚有智慧的人

智库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正所谓“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这一点在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运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着“白宫第一智囊”“超级智库”“大脑集中营”等诸多标签的兰德，可谓人才济济。这一点单从兰德理事会成员名单中就可见一斑，截至2015年5月，兰德理事会成员共有28人，其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前美国劳工部部长安·麦克拉夫林·考罗劳格斯（Ann McLaughlin Korologos）、前克林顿政府海军部部长理查德·丹泽格(Richard J. Danzig)、前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Bildt)等众多政界名人。“有过政府工作经历的人，往往较之高学历研究人员对政策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这大概就是兰德选择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离职高官与专家的重要原因吧。兰德的研究团队往往以名校出身

的年轻博士作为“新鲜血液”，与此同时，兰德还充分利用美国智库体系研究人员高度流动的特点，延揽各大智库著名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向来都是美国政商两界重量级人物的云集之地。从小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到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再到尼克松政府与福特政府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到比尔·克林顿……外交关系协会的4000多名终身会员都是在美国外交界和商界取得过杰出成绩的重量级人物。

“尽你所能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这是里斯本委员会（The Lisbon Council）的工作原则。长久以来，这家智库会为每个项目寻找最好的人才，这使得他们有机会与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一起工作，比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负责人、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创始主任、顶级经济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负责人、总统经济建言顾问等。

智库依靠人才生产思想，知道如何发掘人力资本是智库最重要的技能之一。那么，智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对智库来说，发展人力资本不仅是一个吸引最好的研究人才的问题，而是牵涉从研究人员到执行推广再到财务行政的整个组织的问题。实际上，智库的资金筹集、推广和行政都是保证研究高质量地产出与传播的关键。我认为，智库的“高级人才库”主要由四类人才组成：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见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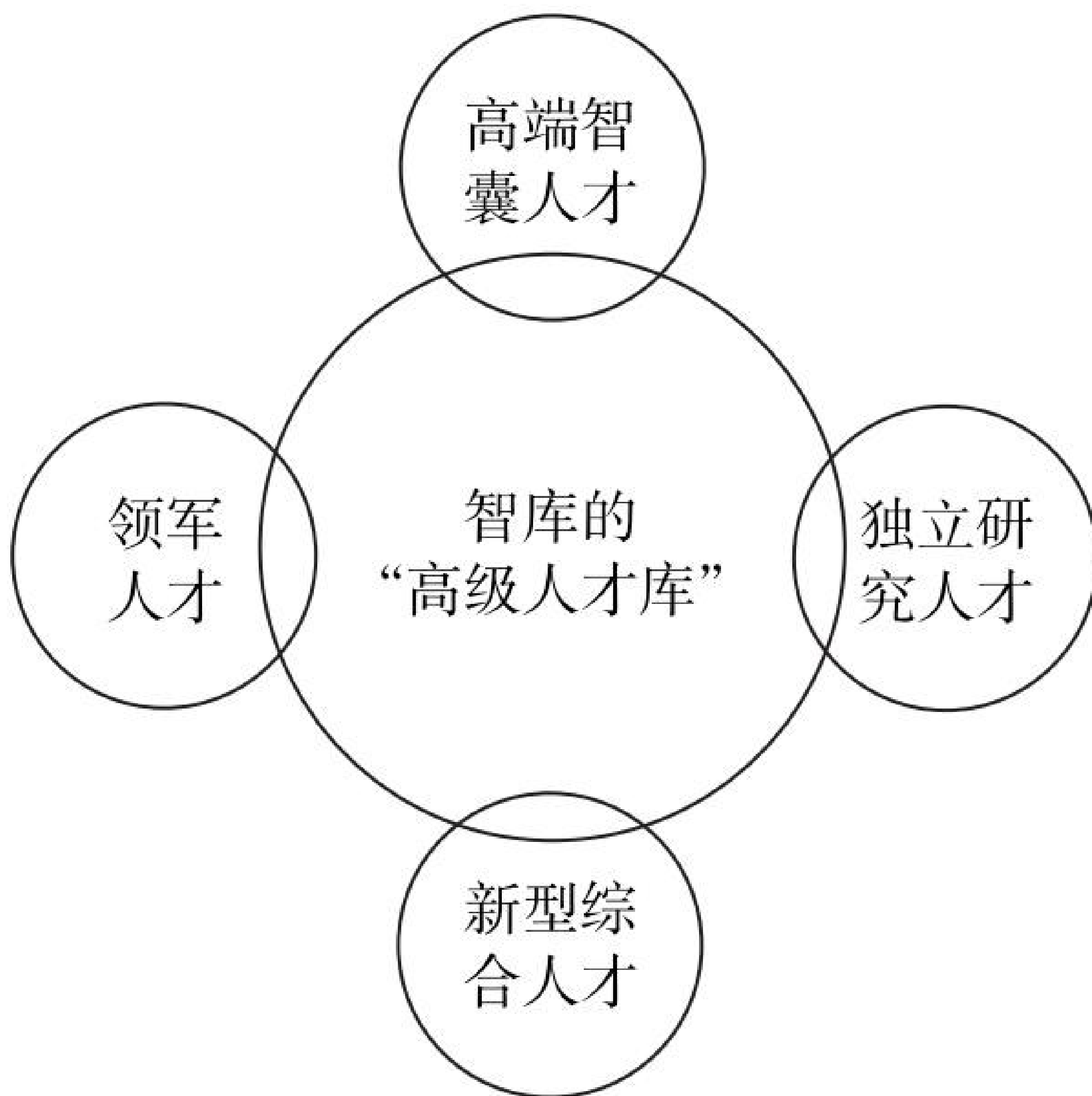


图3.1 智库人才清单

·领军人才

“智库最关键的就是要靠领军人才，领军人才是人才中的人才，是决定一个智库研究水准高低的关键因素。”注智库领军人才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人才本身，更重要的是领军人才可以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吸引和凝聚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整合包括智力资源在内的多种资

源。某种程度上，领军人才的视野和影响力决定了一家智库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最终能走多远。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福尔纳所言，“如果传统基金会没有一个合适的领导者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

国际知名智库的领军人才大多由知名人士担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创始人C. 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在创立研究所之前，他曾先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任职。(注)

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由克林顿夫妇的密友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担当，塔尔伯特同样是一位横跨媒体、政府、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他曾在《时代》杂志工作21年，后进入美国国务院，历任美国巡回大使、国务卿特别助理和副国务卿等职。2014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迎来了一位华裔主任，他就是笔者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时的同事李成。李成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尤其是他对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与现实影响。

CCG的联席主席陈启宗是香港恒隆集团主席，也是国际著名智库亚洲协会的联席主席。被誉为香港商界最国际化的领军人物。陈启宗先生一直关注与支持公益慈善事业，捐助了众多智库、基金会与大学，他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友好发展，被称为中美“民间外交大使”。陈启宗先生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智库的建言献策与发挥民间外交的桥梁作用。

智库的领军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约翰·金登(John W.Kingdon)认为，智库的领导者“与众不同的特质类似于企业创业人士的特点，他们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名誉、金钱等资源，寻求一种未来的回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促成公共政策”[注]。

詹姆斯·麦甘教授提出：“一个成功的智库领导者需要具备三种素质：优秀的领导能力与沟通能力；充分了解政策制定者及政策制定过程；具备筹款和财务管理等能力。”

长期活跃于公共政策领域，曾任美国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的约翰·K.安德鲁新（John K. Andrews, Jr.）认为，智库的领军人才应该是个多面手，需要懂管理、懂政治、懂研究、懂写作、懂编辑、懂市场、懂销售、懂筹资、懂演讲……同时每周还可以在工作上至少投入60小时。

在我看来，智库的领军人才应该具备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眼光，能够对机构进行准确的定位，把握好前进的大方向，可以对风险与机遇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最好具备政产学等跨界多元的工作阅历，在具有深厚研究功底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决策经验与建言献策渠道以及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能够对政府、媒体、公众进行思想传播，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 高端智囊人才

很久以来，笔者一直有阅读《外交》杂志的习惯，对其主办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也早有耳闻。这家诞生了近百年的智库始终会聚了美国政商两界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国防部原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原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等。如此看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被《新闻周刊》称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也并不为过。

高端智囊人才需要拥有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能通过著书立说传播思想、影响决策。这类人才来源于前政府高官以及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要吸纳这类人才，除了智库本身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外，还有赖于“旋转门”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其实，目前国内不少智库都意识到“旋转门”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延揽有影响力的离退休官员到智库任职，比如盘古智库的学术委员会就拥有不少政界学术委员。很多社会智库的负责人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就使得社会智库已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式“旋转门”的主要承载体。CCG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打造出一支由高端智囊人才组成的顾问委员会队伍，成员包括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原铁道部部长、原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傅志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亚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人社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原商务部副部长张祥，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等国内有多年资深政府经验的领导人士。他们丰富的政府工作阅历与政策制定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CCG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

·独立研究人才

布鲁金斯学会被誉为“没有学生的大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会的研究人员具有极强的学术积淀，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透露，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名校非常相近，学会要求研究员应是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兰德的研究员在社会上有“兰德学派”之称，仅诺贝尔奖得主就不下5位[注]。卡托研究所同样汇集了爱德华·克里恩（Edward Crane）、汤姆· G.帕尔默（Tom G. Palmer）、罗杰·皮隆（Roger Pilon）等知名学者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

弗农·史密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在研究人员的配置和要求上“煞费苦心”，才成就了智库的学术影响力。

一般来说，欧美智库的研究人员分为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以合同形式聘用的项目研究人员以及访问学者等几种类型。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协会等智库拥有一定数量的内部研究人员，这些高级研究员或者具备长期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或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或者两者兼备。当然，这些智库还为高级研究员们配备了大量的研究助理。除了常驻研究人员，大多欧美智库都会充分利用访问学者以及非常驻研究人员。

目前，中国智库各种名头响亮的“权威”和“专家”并不少，但真正潜心做研究的独立研究人才严重匮乏。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还有赖于知识精英阶层的培育、智库独立性的加强以及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新型综合人才

詹姆斯·麦甘认为，如今的智库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与之前已大不相同。单纯的学者型人才并不能满足智库的需求，智库还需要具备管理能力、筹集资金能力、与媒体和大众有效沟通能力的人才。对此，我也有同感，几年前，我们在吸纳人才的时候，主要强调人才的研究能力，今天，我们不但看重个人的研究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样强调管理能力，尤其是懂得非营利机构运营管理，能够使智库内部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提高智库运营效率的人才，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缔造“高级人才库”

了解了智库的“人才清单”，下一步就需要根据清单打造与维护“高级人才库”了。那么，智库人才的“招、用、育、留”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研究发现，智库的人才，不仅要强调专业性与多元化，还需要注重人员搭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可以说，人才资源管理是智库赢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录人守则

人才招聘是缔造“高级人才库”的第一步。不同智库在招聘人才时强调的标准有所差异。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对人才的教育背景有硬性要求，这也是该智库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自名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一些智库会综合考虑人才的发展潜力，比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就会要求研究人员头脑灵活、具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洞察力、合作能力、服务能力等。

如果从世界顶尖智库研究人员的背景出发，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化”。比如兰德，2015年这家智库的雇员总数达到了1875人，他们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共掌握了世界上75种语言，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双语者或多语者。他们的专业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生命科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工程学、行为科学、数学、运筹学及统计学等近20个专业，而且专业分布比例较为平均，其中社会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占比分别为13%、12%、10%，属于占比较高的3个专业，其他各专业所占比率大多为10%以下（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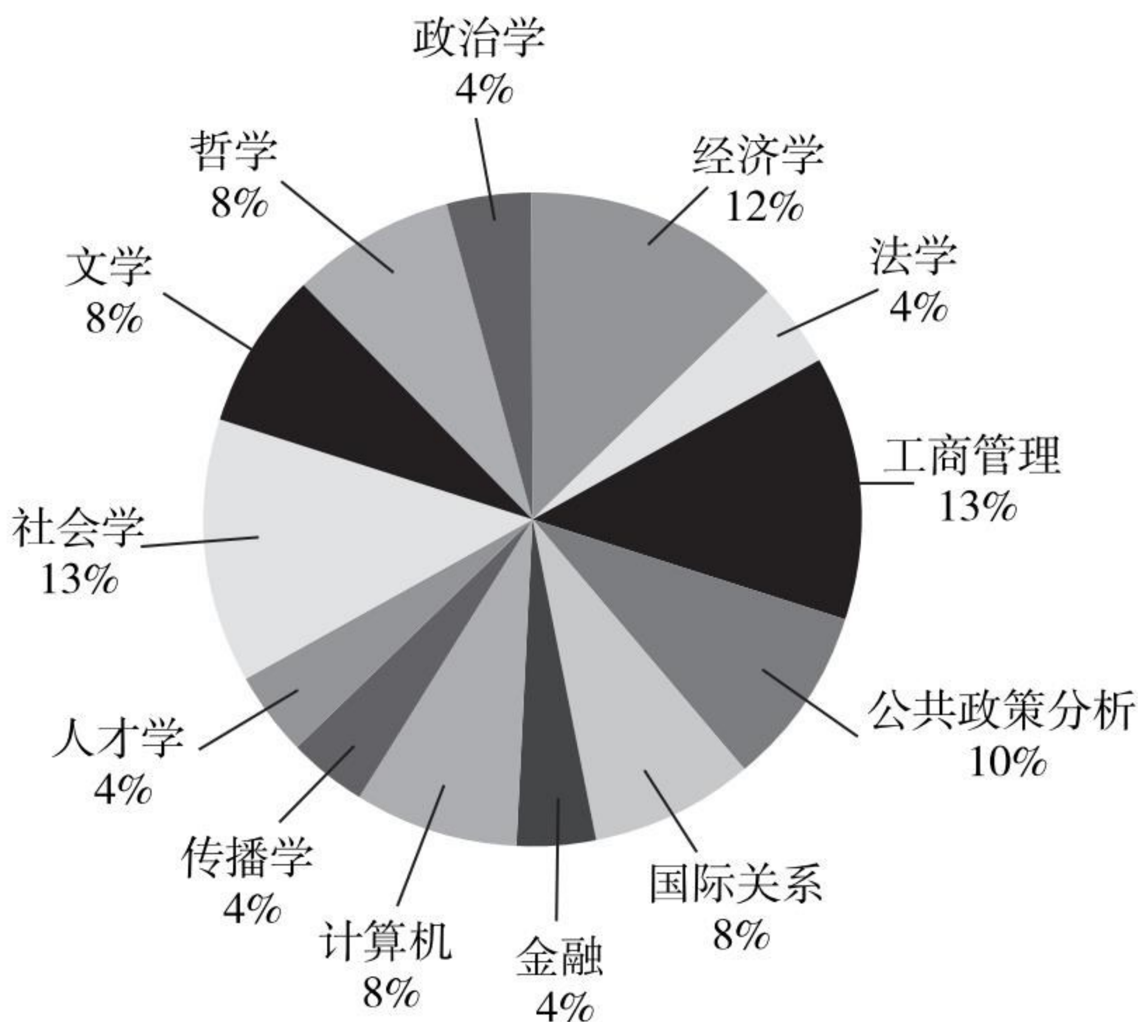


图3.2 兰德公司专职研究人员专业分布（2015年）

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认为，“相似教育背景下出来的人往往想法雷同，从而很难产生差异较大的思想”。不断的思想创新是给养智库生命的源头活水，如果源头枯竭，智库生命自然危在旦夕。所以，从智库发展的长远考虑，多元的文化背景与专业背景应该成为智库选择人才时重要的参考标准。

CCG在人才招聘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专业水平相差无几的一些应聘者，这时，我们会优先考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应聘者。一个团队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对于智库事业的那份情怀与执着，

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智库这类非营利机构来说，引导人才去完成机构的目标与使命，才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CCG智库拥有百余名专职研究人员，他们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以及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国内外名校；他们有着跨学科的协同研究能力，研究人员的专业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企业管理、法学、计算机、国际关系、政策分析等约20个专业；他们有着很高的学历背景，其中博士占比约37%，双硕士、硕士分别占比9%、54%（见图3.3）。除了专职研究人员，还有一支重量级的特邀高级研究员团队以及一支兼职研究员团队：在特邀高级研究员团队中，博士占比将近90%；在兼职研究员团队中，博士占比也将近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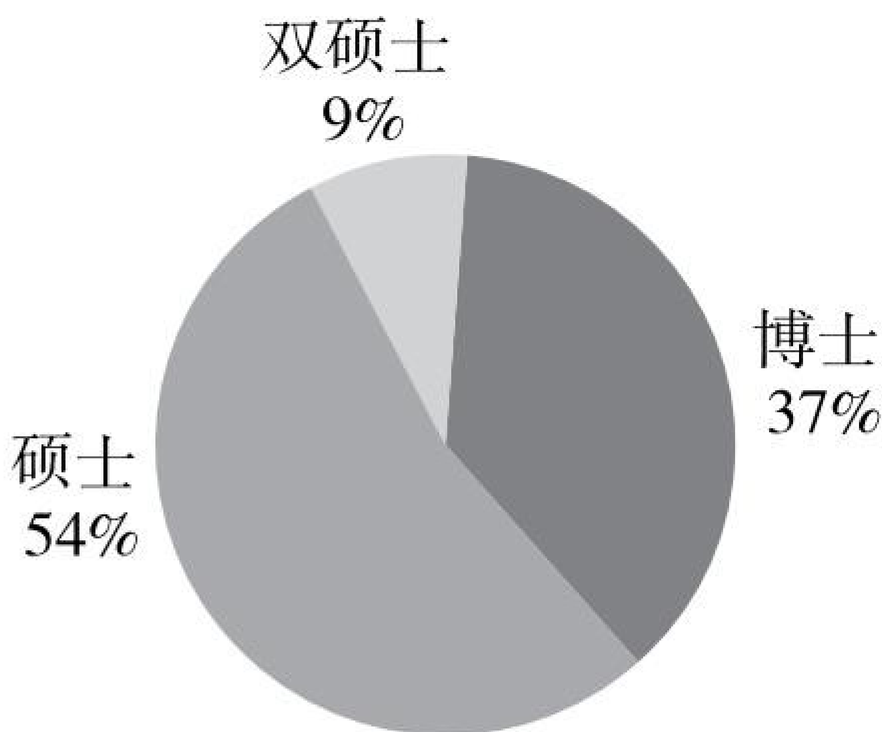


图3.3 CCG专职研究人员学历分布（2015年）

·人才培养

智库要缔造“高级人才库”，不但要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这就要求智库注重人才的培养。兰德公司早在1970年，就成立了兰德研究院（Rand Academy），专门培养政策分析方面的人才。兰德研究院他们采用了“在职法”（On-the-job）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成为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

员工培训是留住人才的重要法宝，更是智库生产力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那些获得了新知识与新技能的员工，会产生更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就大大提振了员工的士气，更有利于留住优秀员工，而且一个有着优秀培训声誉的智库在招聘员工时也会更有优势。

我们这里所说的，需要进行培训的研究人员主要是指，有较高的学历背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初级、中级研究人员。在研究人员真正开始投身课题之前，需要对机构的目标与理念、工作方式、工作规则、工作作风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把握，当然，这一点对行政人员同样重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行政人员，对“工具”的熟练掌握，通常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对行政人员来说，这些工具包括文档编辑软件、电子邮件等基本的办公软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工具的种类更多一些，复杂程度也更高一些，他们还需要根据智库的工作内容掌握更多的工具，比如SPSS、SAS等统计软件。

智库的目标决定了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公共政策分析能力，包括如何撰写出高质量的书面政策建议、如何进行项目评估等。这一点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研究人员尤其重要。

智库的结构决定了培训的具体内容，如果想提升智库的人力资本，那就从制订一个全面的培训计划开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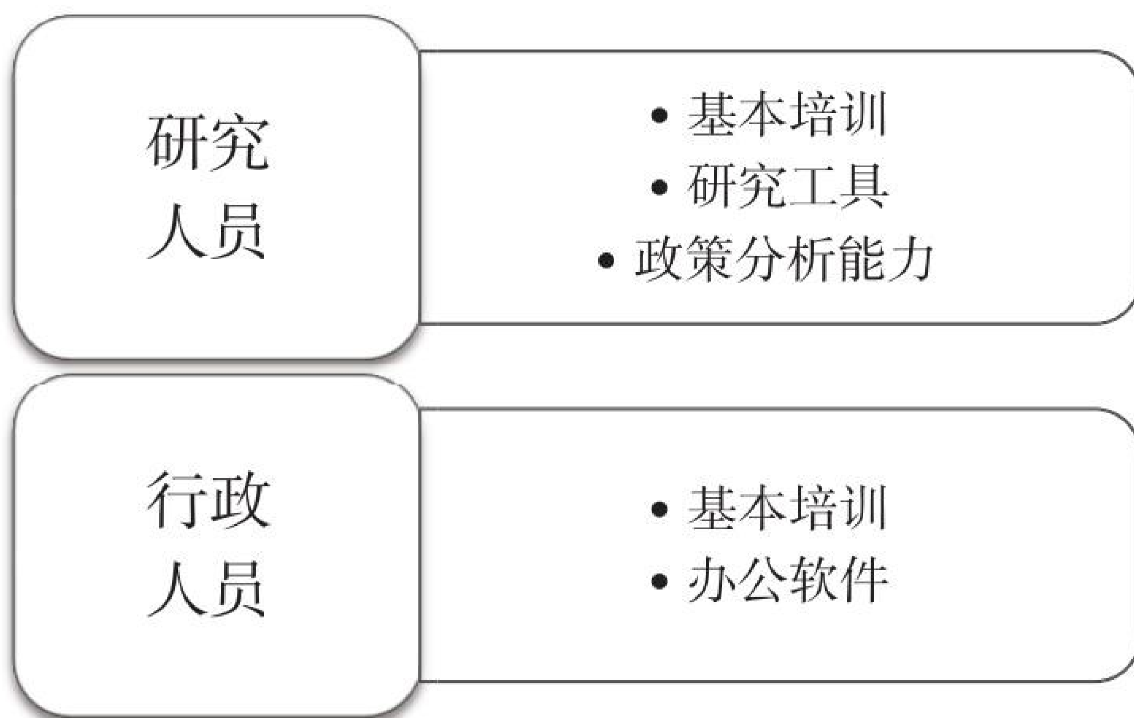


图3.4 智库员工培训类型

资料来源：参考《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有改动

·人员考核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每年都会要求员工进行自评，制定来年的工作目标和个人发展规划，再由员工的直接领导为下属提供正式的面对面的反馈。(注)

亚当·斯密研究所认为智力是很难评价的，更难以数量化，因此亚当·斯密研究所更依赖研究带头人对研究人员的评价，并据此优“升”劣汰。

兰德对研究人员的考评，主要看其研究报告的完成数量与质量，如果研究人员在一年内既未能主动向政府或基金会申请到课题，又没有被其他课题项目所聘用，那就只好离开兰德另谋出路了。(注)

智库采用一套严格的、非官僚化的业绩评价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为达到坦诚、透明和公平的效果，智库可以将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主管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以及研究人员的自我评价三者综合考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评估与激励应进行很好地结合，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日后的职位升迁、薪资调整以及是否继续聘用的重要参照。

·员工激励

关于激励的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激励，主要是靠物质激励；另一类是内在激励。对于智库来说，哪些激励因素最为有效呢?

人力资源经理们普遍认为，充足的底薪是最基本的激励因素，这一点无论对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都同样适用。不过，要起到长久的激励作用，仅仅依靠底薪还远远不够，年终奖或一年中因具体贡献而颁发的奖金形式对于激励员工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专长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学会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不做硬性规定。分析师对研究内容的兴趣越大，对个人的激励也就越大。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ORF）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这家来自印度的智库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通不同研究中心之间的“墙”，取而代之的是有共同研究兴趣的专家们的一个个相对松散的组合，这种新型组织结构可以保证跨学科的研究专家们一起应对智库日益扩展的研究议题。

当职业阶梯比较明确的时候，晋升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因素。当然，在一些比较小的智库中，智库的职业层级越少，成长空间就会越模糊，对于这些智库，领导层应该清晰界定工作程序与工作责任，比如在项目中，为研究人员配备助手，或允许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预留更多自由交流的空间。(注)

不同的智库需要根据各自的预算范围，综合运用物质奖励与非物质奖励（见图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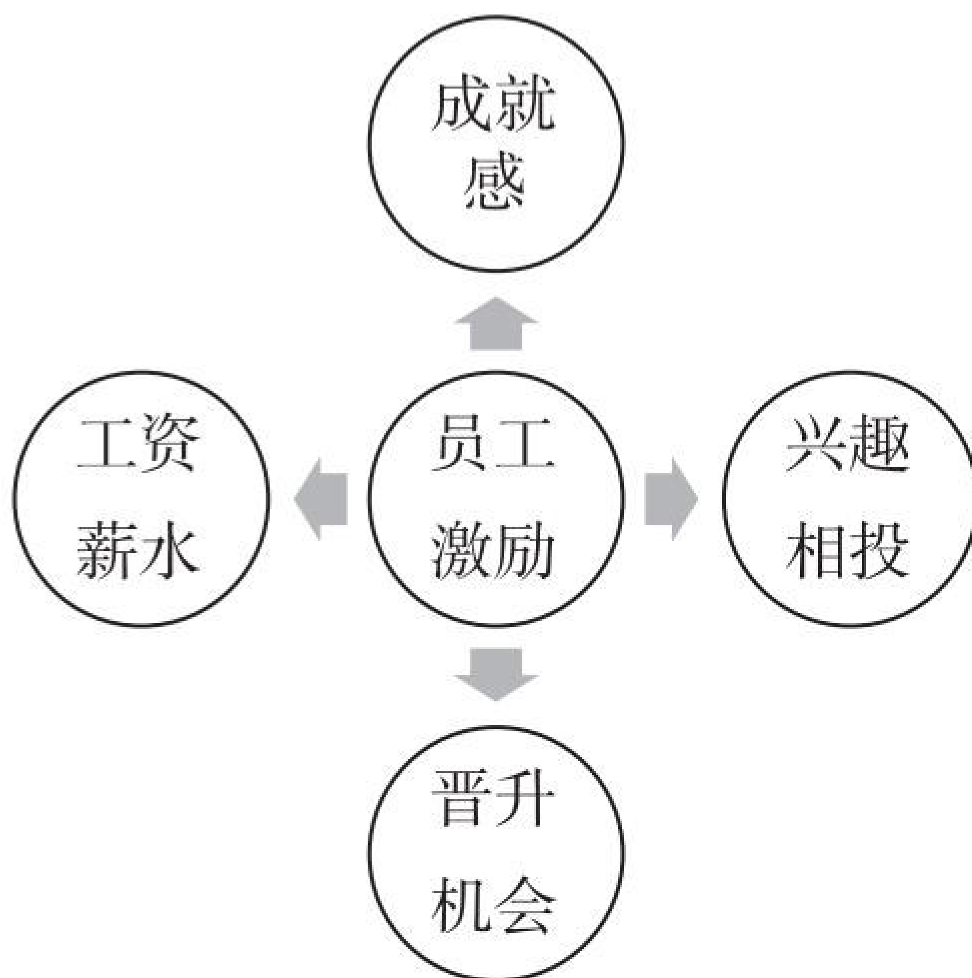


图3.5 员工激励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有改动

·搭建灵活的用人机制

在众多国际智库中，除了兰德，其他智库的常规人员规模都不是很大，个别在300人以下，大部分不到100人。对于智库这类非营利机构，充分利用“外脑”，搭建灵活的用人机制，在人员结构上进行合理布局十分重要。

在传统基金会，固定员工约占2/3，其余1/3均为实习生以及志愿者，同时，该智库还根据课题的情况临时聘请项目人才。例如，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通常招收大量的实习生，并为表现优异者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同时还支持他们学成归国后进入政府部门。实习生同样是CCG人才队伍中重要的一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国外知名高校如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纽约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以及中国的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其中很多人是在华留学生，虽然不是正式员工，但CCG非常重视对实习生的培养，给予他们同样的培训学习、参与重要课题的机会。实习结束后，还与实习生保持定期的联系与沟通，并将其纳入CCG人才库。

作为智力密集型组织，智库一般要求中高级研究人员占较大比重，为研究人员配备助手，由研究助理承担后勤保障，是很多智库的做法。国际知名智库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很多经验，比如兰德公司的经验是“两个研究员不如一个研究员加半个秘书的效率高”。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员与辅助人员（秘书和研究助手等）的配置比例是1∶2。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专职研究员与辅助人员配比为1∶2.5。一个恰当的研究与辅助人员配比，可以为研究人员节约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而大大提高智库效率。

·人员流动为智库“保鲜”

在英国，很多智库通过保持研究人员的合理流动性，为智库“保鲜”，比如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在研究所的工作时间约为5年，人才流动率达20%左右。在美国，为保持研究人员的流动性，避免出现人员和思想的固化，智库大多通过合同制和聘任制的方式录用研究人员。智库的这种人员流动不局限于一般员工，少数骨干也会流动，一般是到其他研究机构交流一段时间，比如兰德就会给研究人员

提供外出兼职、当访问学者甚至进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的机会。在一些美国智库中，即使是业务主管或所长也会定期轮换。㊟

组织与管理

“几百名音乐家能与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一起演奏，是因为大家共同使用着同一张总谱。”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以一个形象的比喻体现了扁平化的鲜明优势。对于智库来说，减少管理层次、权力下放，可以切实提高组织效率，实现智库的高效运转。美国智库是扁平化组织结构的积极践行者，这些智库的内部层级设置较少、人事关系与权责比较清晰。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智库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趋于平坦化，呈现出一种平等、彼此支持的关系（见图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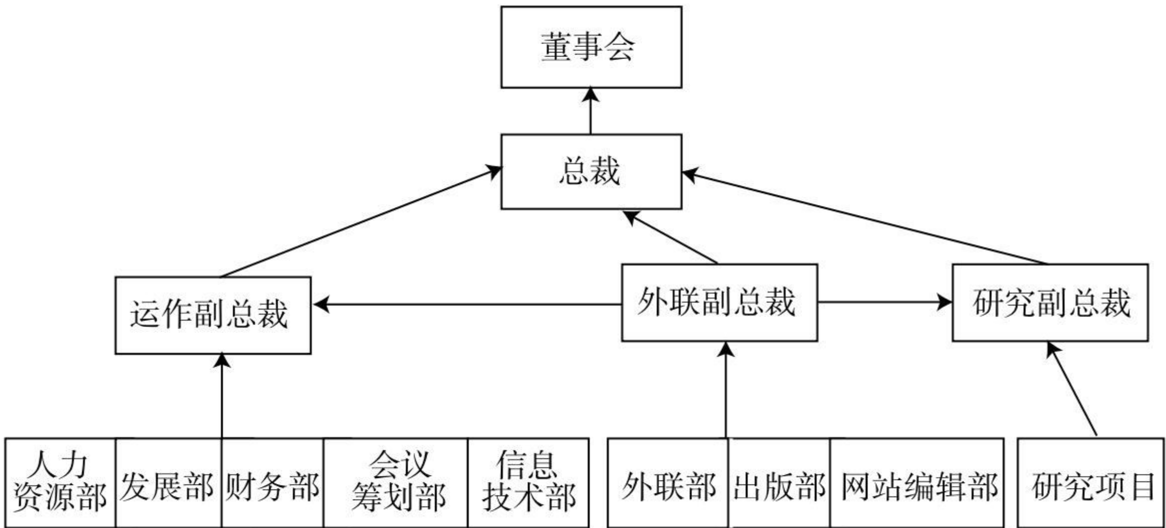


图3.6 美国智库基本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

·董事会

董事会是机构治理的主体和最高权威，其成员扮演着“治理者”“捐赠者”“外交家”“参谋”等多重角色㊟，一般由有影响的政界、商界、学

界、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组成。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曾担任高盛公司总裁，他与中国政界高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等各国政商界领导人关系密切。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成员之一，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肯奈斯·达博斯坦，是美国著名的舆论领袖之一，他还是波音公司、飞利浦公司、哈佛大学等多所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访谈节目中。

有策略地选择董事会成员是发展有效董事会的关键。智库等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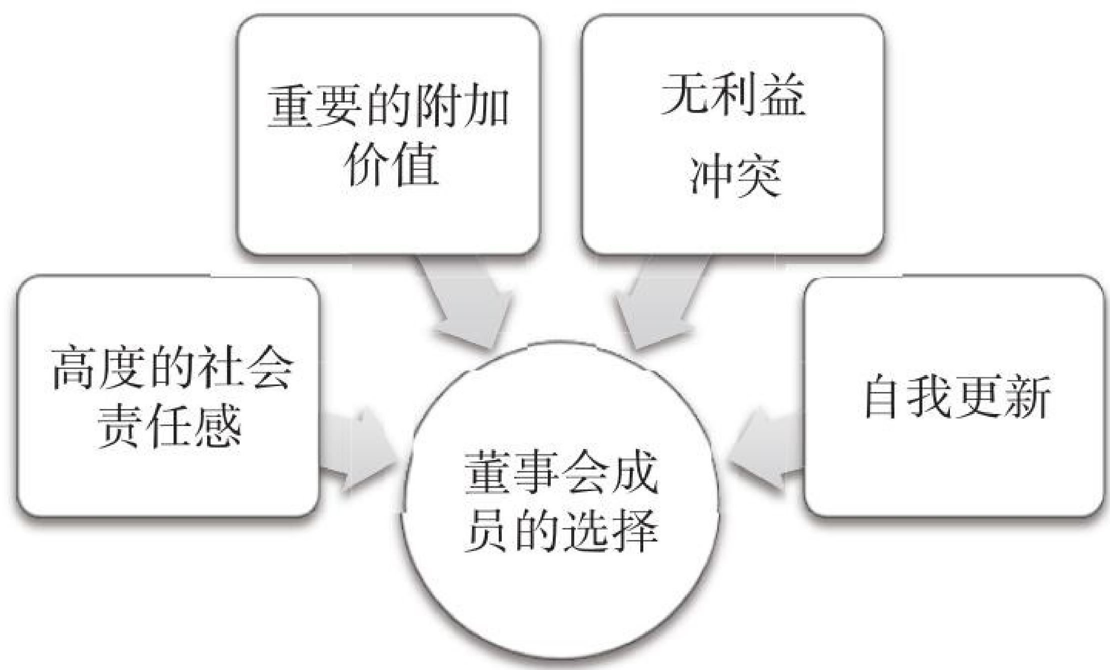


图3.7 选择董事会成员应注意的事项

资料来源：参考《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有改动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智库等非营利机构的资源有限，同时又以公益为目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董事会成员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智库服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在贡献社会的同时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重要的附加价值。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劳伦斯·W.里德（Lawrence W.Reed）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能够为智库带来资金，就盲目选择他们加入董事会。理想的董事会成员应该是那些有能力为智库带来声望、支持、尊重以及有价值的指导的人。有名望的董事会成员，有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形象，增加对未来捐赠者及其他支持者的吸引力；具备金融、法律、公关、营销等专业背景的董事会成员，可以成为智库的天然“智囊团”，这对于智库这类非营利机构的良性运转是非常关键的。

无利益冲突。智库间有时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让另一个智库的总裁担任本智库的董事，作为董事，难免了解智库未来的发展战略，如果两家智库之间存在潜在竞争关系，董事本人将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注)

自我更新。董事会是智库治理的中心力量，一个生机勃勃的董事会，是智库健康运转的重要保证，这就需要董事会具备自我更新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美国，非营利机构的实际操作中，主要通过规定董事会成员的任期以及设立任命委员会等方式实现董事会的“更新换代”。比如在布鲁金斯学会，董事的任期为三年一届。董事会实行交错任期制，每年有1/3成员被取代，这意味着，董事会中有2/3的成员熟悉机构运作，可以为新人提供指导，同时，又有1/3的新生力量为智库带来新能量。(注)

·外联部与发展部

智库作为非营利机构，面对着多个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好这些关系，有两个部门在智库里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分别是负责与政府、媒体及公众联络的外联部，负责筹款和维系与捐赠者关系的发展部。

CCG在管理模式上同样实行“扁平化”管理，这种组织结构成为智库决策高效性、机制灵活性的重要保证。在具体职能部门的设置上，为了保证思想的独立性，我们在机构设置上以研究部为智库的核心部门，同时设置了对外合作部、媒体与公共关系部、战略策划部、行政部等。其中，研究部、媒体与公共关系部分别负责智库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行政部小而精干，省去了所有的官僚行政手续，直接为智库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提供极为便利的服务，大家各司其职，共同维系着智库的良性运转。

---

1. 安德鲁·西雷，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项目副主任。
2. 李慧莲.开创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N].中国经济时报，2015-02-26.
3. C. 弗雷德·伯格斯滕曾在1969～1971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方面的助手，在1977～198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助理秘书。
4. 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5.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http://www.cnss.sjtu.edu.cn/znhz.asp?id=363。
6.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 王继承.兰德公司的成功奥秘[N].中国经济时报，2012-10-19.
8. ［美］斯特鲁伊克.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M].李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9.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 ［美］斯特鲁伊克.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M].李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12. 美国非营利机构董事会实行交错任期制。

独立性

智库是独立的、没有利益倾向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提供专业知识或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影响决策过程。

——安德鲁·里奇(注)

独立性：智库价值观

独立与专业是智库的思想产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与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说："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会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这样一来，寻找我们帮助的人会知道，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在布鲁金斯学会著名的"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价值信条中，独立性是其最为珍视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认为："独立性意味着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都认真对待布鲁金斯学会的观点与思想，都看重学会的独立分析。不仅如此，独立性还让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聚集起来进行理性和坦率的辩论成为可能。"(注)

在众多国际智库掌门人眼中，对智库独立性的重要程度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正是凭借着独立性这一特性，智库才在经济、社会、军

事、外交等领域对各国决策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情况如何？细数对中国智库的诸多评价中，“缺乏独立性”也许是最常见的批评声音。原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表示，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多是被“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也指出了“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认为，现在中央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智库就研究某个问题，这种浮躁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真正定位的独立性。注

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种声音，有一种声音说，“只有批评政府，与政府唱反调才能保持独立性”；也有声音说，“保持智库的独立性与帮助政府是互相矛盾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发现，在法国，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等独立智库的影响力非常大，它们在法国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些独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却很密切。同样，在美国，智库和政府也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吸引了不少政府机构卸任人员。美国智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制于政府。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智库的工作与政府决策密切相关，这要求智库及时了解决策部门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既要“急政府之所急”，也要“想政府之未想”，唯有如此，智库的思想产品才能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所以不论是每天跟在政府后面，一味迎合政府，成为政策的解读者或辩护者，还是每天都在批评政府，却无建设性建议，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智库的独立之道

·多元筹资渠道：研究独立的基本保证

资金是智库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为了保证智库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所左右，构建多元而丰富的筹资渠道成为国内外智库的共同选择。

兰德的经费来源包括政府项目收入、慈善机构、基金会、私人部门和个人的捐赠等10多种渠道（见图3.8）。虽然来源多样化，不过，我们也发现，兰德的大部分收入仍来自政府部门，比如2015年，兰德收入中就有将近80%来自美国政府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兰德如何保证自己的研究不受某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呢？其办法就是同时为空军、陆军、国防部长办公室等众多政府部门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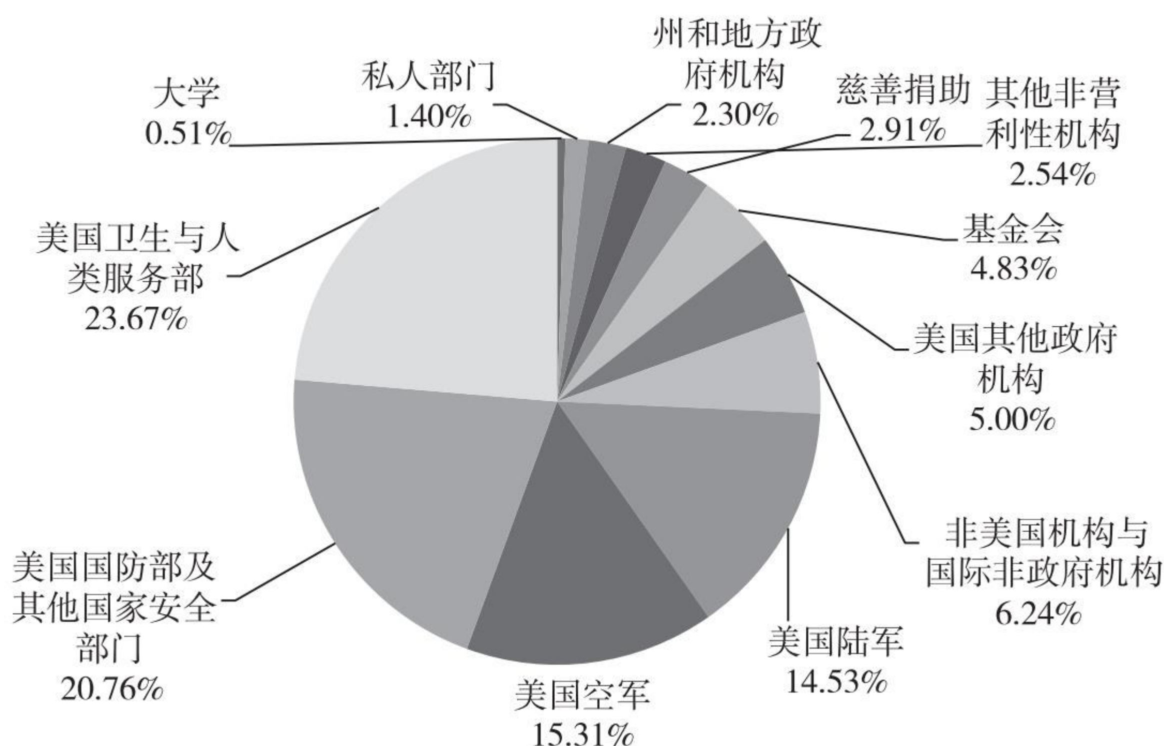


图3.8 兰德公司收入来源结构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2015年年报

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款、培训以及出版物收入。学会每年预算9100万～1亿美元，其中

80%来自捐助，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10%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在捐助资金中，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美国、阿联酋、丹麦等国政府。注这些运作资金由布鲁金斯学会的财务部门进行专门管理，并在其官网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查塔姆社的经费来源主要为会员费、赞助费、信托机构的慈善捐款、基金会收入等。为了保持独立性，该智库不接受政府拨款，但接受政府对具体研究项目的经费资助。查塔姆社2014年的收入来源中，委托项目、企业与个人会员费、活动和会议费、慈善捐助、出版物收入分别占比59%、16%、11%、6%、4%。有超过13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通过赞助经费支持其研究活动，有350家企业会员和3000多名个人会员为其提供会员费。这些都保证了查塔姆社可以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不受制于任何组织和个人。

同样，对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来说，大部分入选巴黎指数的法国大公司和欧美大公司都对其进行了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的相对独立性。

表3.1 美国智库经费来源渠道

智库名称	经费来源渠道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政府项目收入、慈善机构、基金会、私人部门和个人的捐赠等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罗伯特·布鲁金斯专项基金、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出版物收入等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企业、基金会、个人赞助以及其出版物和研究成果的收入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非政府基金会提供的不动基金的数百万美元的利息收入；每年募集 3000 万美元左右的捐款，其中企业与个人的捐款比例大约为 3∶7；销售刊物所得的部分收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除本身的基金外，还接受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此外，基金会还会收到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资助的资金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洛克菲勒、摩根等基金会和财团。同时，还有个人成员会费、公司成员会费、出版物、投资和出租收入等

智库名称	经费来源渠道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基金会捐助资金、公司和个人捐赠。其中以洛克菲勒为首的四十多个石油财团是它较为固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慈善机构、私人企业、个人以及研究所的出版收入和投资基金收益等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	基金会、公司、个人的捐款，也有部分来自内部出版物等其他方面的收益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我们考察的几十家智库中，它们的经费来源大多为基金会、企业与个人的捐款以及政府合同等方面。其中基金会通常占的比例最大，堪称众多智库的“种子基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曾说过：“我们拥有相对充足的基金，我们在研究选题上就可以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研究上，而不是用于寻找资金上。”可见，对于智库来说，拥有一笔稳固的基金是多么重要。而诸如传统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这类会员制智库，通常个人与企业的捐赠会占到一定比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很多智库为了保持独立性，纷纷探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这就大大扩充了利益相关方的数量，有助于缓和因某一筹资渠道不畅而造成的项目“流产”，为项目的高质量运作提供了保障。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也为智库自身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支撑，使智库有能力在基础设施、科技平台、员工培养等方面进行投资。

·附条件的资助机制：研究独立的关键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公益理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所接受，未来中国捐助智库的企业家会不断增加。对于智库来说，就有必要制定严格的捐赠规则，从制度上将捐助者与研究工作分离，使研究在不受到任何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进行。

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做出了明确规定：资助者不能对学会的研究项目与研究结论进行干预。“资助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非常关键，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学会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注]布鲁金斯学会还对政府的资助实行限制，规定政府的资助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0%。此外，学会也不接受政府的秘密研究，以避免沦为政府的附庸。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慈善机构、私人企业、个人以及研究所的出版收入和投资基金收益等。为了维持客观性宗旨，该研究所不接受具体研究项目的赞助，只接受对研究所整体研究的赞助，这一点在美国智库中很是常见。

为了防止课题研究成果受到课题资助者的影响，国外某些智库甚至规定了每个资助者的最高资助金额，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就规定：“每个企业捐赠者每年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

·包容、自由的思想环境：研究独立的土壤

“选择在这里工作，因为我能够在此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由表达观点，这是我在财政部或央行工作时难以做到的。当然，观点的表达还需要谨慎客观，要结合政治环境，同时要经过充分的政治讨论。”[注]说这番话的人，名叫安姆斯特朗，现在是英国全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部的主管，来这家智库之前，他曾先后任职于德意志银行、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财政部。

如果把智库的研究比作一粒种子，那么，包容与自由的思想环境就是能使这粒种子发芽、开花并结果的土壤。布鲁金斯学会为了使这片土壤更加肥沃，做了以下几件事：

①课题选择。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不做硬性规定。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专长自由选择，独立研究。

②研究过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多元声音争鸣的平台，对不同的观点持尊重与包容的态度。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最终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③成果考核。对研究人员没有硬性的数量指标要求。

布鲁金斯学会为研究人员创造的自由与包容的研究环境，其实是对思想独立性的一种鼓励和保护，这就为研究人员免受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干扰设置了防火墙，从根本上保证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智库的筹款战略

从运营角度来看，智库作为非营利机构，同商业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经费来源不同。商业公司的经费主要来自投资者的投资、产品与服务所产生的利润等途径，非营利机构的经费主要通过筹款以及为社会提供服务等方式来获取。因此，筹款无疑是维持智库等非营利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作为民营智库的创办者与运营者，筹款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成功筹款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智库的筹款需要一定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建立在对智库的准确定位与对捐赠者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智库与捐赠者之间应建立起长远

的发展关系。成功的筹款需要在筹款理由、关键捐款人、捐赠者前景研究以及筹款计划等方面做足功课（见图3.9）。



图3.9 成功筹款的四大关键要素

资料来源：参考《公益筹款》，有改动

· 筹款理由

在很多时候，捐赠的兴趣始于人们对筹款理由中提出的社会问题的情感反应。因此，筹款理由非常关键，它应该超越眼前的资金需求本身，它应该传递出能使捐赠者产生共鸣的价值观，激发起捐赠者的社会责任感与认同感。正如安德鲁·西雷所言："筹款是寻找可以为智库提供支持、帮助智库将其使命向前推进的利益相关者，并且在共同的努力中成为彼此真正的伙伴。"

·关键捐款人

在大多数情形下，智库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少部分捐赠者，又被称为“关键捐款人”。成功筹款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就是找到这些“关键捐款人”（见图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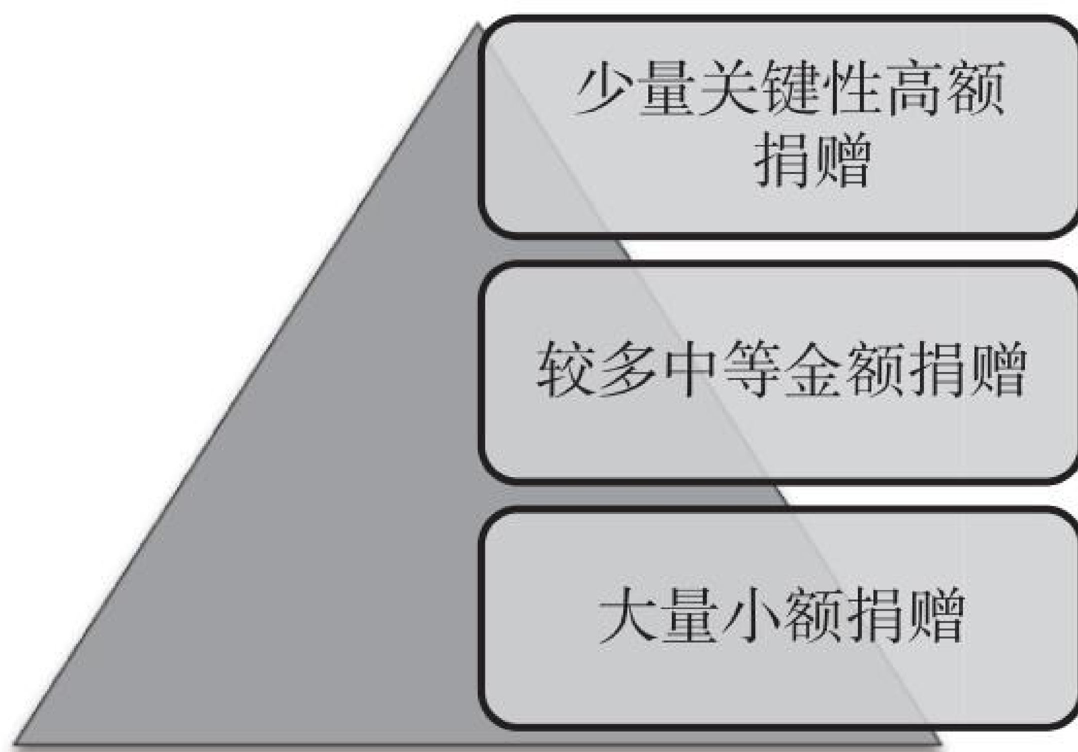


图3.10 捐赠人金字塔理论

在美国，对董事会的职责有一个形象说法，叫作“捐得出钱，募得到钱，否则就下台”（give，get，or get off）。董事会是筹款者可以充分利用的“关键捐款人”资源，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吉姆斯·约翰逊就是学会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如果董事会成员能够提供高额捐赠或是为智库引荐捐赠者，就会起到强大的示范作用，这会在无形中增加人们对这家机构的信任与信心，同时驱动人们采取和“关键捐款人”一样的行动。

其实，如何建立、发展和运作一个善于筹款的董事会，让董事会成员们能够在筹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关键捐款人”，始终是每一家非营利机构管理者最关注的问题与挑战之一。培养董事会的筹款能力应当从选择董事会成员开始。一般认为，“三分之一”法则是比较符合机构利益的董事会构成方式，如图3.11所示。



图3.11 董事会构成方式的“三分之一”法则

· 捐赠者前景研究

虽然机构筹款中的80%可能来自20%的捐赠者，但是著名的高校募捐金字塔理论的提出者（Worth）认为，募款工作千万不能忽视金字塔底部捐赠者的作用，尽管他们捐款数额最小，但涉及的对象范围却极为广泛。因此，智库不但需要抓住“关键捐款人”，还需要研究可能的捐赠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潜在捐赠者群体进行一个“摸底”，成功的筹款者往往花很大精力来完成这项准备工作。

捐赠者前景研究一般包括：机构以往或现有的捐赠者是否有可能增加捐助额？哪些基金会经常资助类似项目？捐赠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潜在捐赠者在支持类似项目时通常提供的赞助额是多少……(注)筹款者需要通过收集信息确认哪些人是可能的捐赠者群体。“合格”的可能捐赠者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标准：与机构有关联、有提供所需资金的捐赠能力、对机构从事的工作有兴趣。(注)

· 筹款计划

作为非营利机构，智库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也面临同行之间对资源与客户的激烈竞争，为了保证筹款的成功，智库还需要对筹款进行专业管理与运作。当管理者对捐赠者群体有了详细了解后，智库就需要制订筹款计划了，这个计划包括确定筹款目标与对象、制定筹款时间表、明确分工专人负责以及估算筹款成本。



图3.12 非营利机构的筹款计划

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从而形成了“富人捐大钱、平民捐小钱”的社会文化。所以，在美国，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属于智库或非政府组织，不仅能找到资金，而且能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得到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反观国内，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还多聚焦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领域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社会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不过，未来这种局面将有所改观。2015年1月20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这条意见对中国捐赠文化的形成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广大民营智库而言，可谓“源头活水”。中央层面的重视无疑将为智库经费来源多样化创造一种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

1. 安德鲁·里奇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
2. 刘昌乾.世界一流智库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
3. 中国智库如何参与决策？官方智库被指缺乏独立性[N].北京青年报,2013-11-12.
4. 引自宋晓梧在2014年6月25～26日“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5. 美国全球知名智库发展现状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6-08-10.
6.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
7. 参见《英国经济智库的独立之道》，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4/12/c_1114939420.htm。
8.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9. 卢咏.公益筹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影响力

智库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推广其知识产品从而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展开。

——唐纳德·E.埃布尔森[注]

人才与资金是智库运营必需的两大要素，其实，还有一个要素，对于智库的成功运营同样重要，那就是智库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智库能否获得人才的青睐、能否获得研究合同、能否获得社会捐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的影响力。这里，我们把智库的影响力分为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政策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

1968年4月，在罗马近郊的山猫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来自意大利的著名实业家、学者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与来自英国的科学家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组织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会议，邀请了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参与讨论。会后，两人组建了一个“持续委员会”，并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注]四年后，该智库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报告，

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做出了成功预测，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人类无限制增长将导致地球灾难的担忧，在全球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该报告成为迄今为止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卖出了3000万册。

无独有偶，1994年，美国地球观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同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长期讨论。

这些真实的故事形象地说明，很多时候，智库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要比具体的政策建议长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与观点是智库学术影响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个智库如果没有提出独立的思想与理论，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观点没有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即使它的规模再大、经费再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智库。美国智库从20世纪初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四代[注]，其中第一代智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研究型大学”，这代智库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这代智库的创始者们十分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与科学性，智库的运作模式更接近于研究型的大学，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至今仍是最有声望的一批。

社会影响力

“智库的思想或见解本身不是舆论，但智库的产品之所以不同于大众化的感性认识，就在于它运用一定的概念体系和抽象的推理过程，系统地阐明政策观点，形成某种思想或政策的理论依据。”[注]“当理论充分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回答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时，理论传播就成为一种舆论形态。”[注]智库的思想产品所坚持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公

益能在多大深度与广度上整合社会公众群体，决定了智库所具有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决定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小。㊟简言之，社会公众如果认可智库的观点与主张，智库就能够发挥塑造舆论与引导舆论的作用。在智库与社会舆论的互动中，如果智库的观点是基于专业性、独立性与战略性基础之上，那么就会相对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信任，从而实现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智库产品的传播推广能力是构成智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根据传播学理论，理论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品质”，而且还与产品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密切相关。系统、顺畅的传播渠道与机制能为智库发挥社会影响力提供广阔的平台，从而有效扩大智库理论产品的传播规模与宣传效应。因此，智库需要积极利用现代传播工具，在立足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注重对产品进行有效的包装，通过多种传播工具进行推广。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利用苹果（Apple）产品的崛起，成为第一个通过iTunes播客（Podcast）发布讲座及讨论的智库。这种对科技发展的有力把握，对于智库的品牌宣传十分关键。

关系网络是智库可以利用的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资源。通过这种网络智库可以进行研究分析、传播研究成果，并与关键的个人或团体建立联系。正如莱斯利·菲尔德与希瑟·麦克里奥德·格兰特（Leslie R.Crutchfreld and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喜的力量》（*Force Good*）一书中所言，想要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联盟网络，并作为改变的引擎。

当威尔逊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决定关注美墨边境的未来时，它和三个机构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北部边境大学（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对于威尔逊中

心而言，COLEF与NACTS为其提供了详细的边境知识和边境地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CSG则为威尔逊中心提供了与美国州政府和州立法机关的紧密关系。威尔逊中心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项目，并且对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PGV)是一家来自巴西的智库，它致力于通过研究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来提升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十年来，PGV通过建立贯穿整个巴西的伙伴关系网络，使其教育管理项目得到加强，也利用伙伴关系网扩展了自身的影响力。

政策影响力

美国进步中心成立于2003年，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进步中心为克林顿政府设计的《变革方案》，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国防预算草案中，要求国会削减“未来作战系统”的经费开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驱逐舰项目，停止F-22战机生产，同时加大对情报和人力方面的投入。这些建议早就被写在美国进步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报告《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朝着一种新的改良型国防战略迈进》中了。2012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美国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注]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样能够在美国进步中心关于《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中寻到踪迹。难怪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美国进步中心，“在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与其相媲美”。

智库，为影响政策而生。在政策影响力方面，美国智库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究其原因，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艾格特梅尔（Antoine Van Agtmael）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与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资金，这就是美国智库繁荣发展和产生影响力的原因”(注)（见图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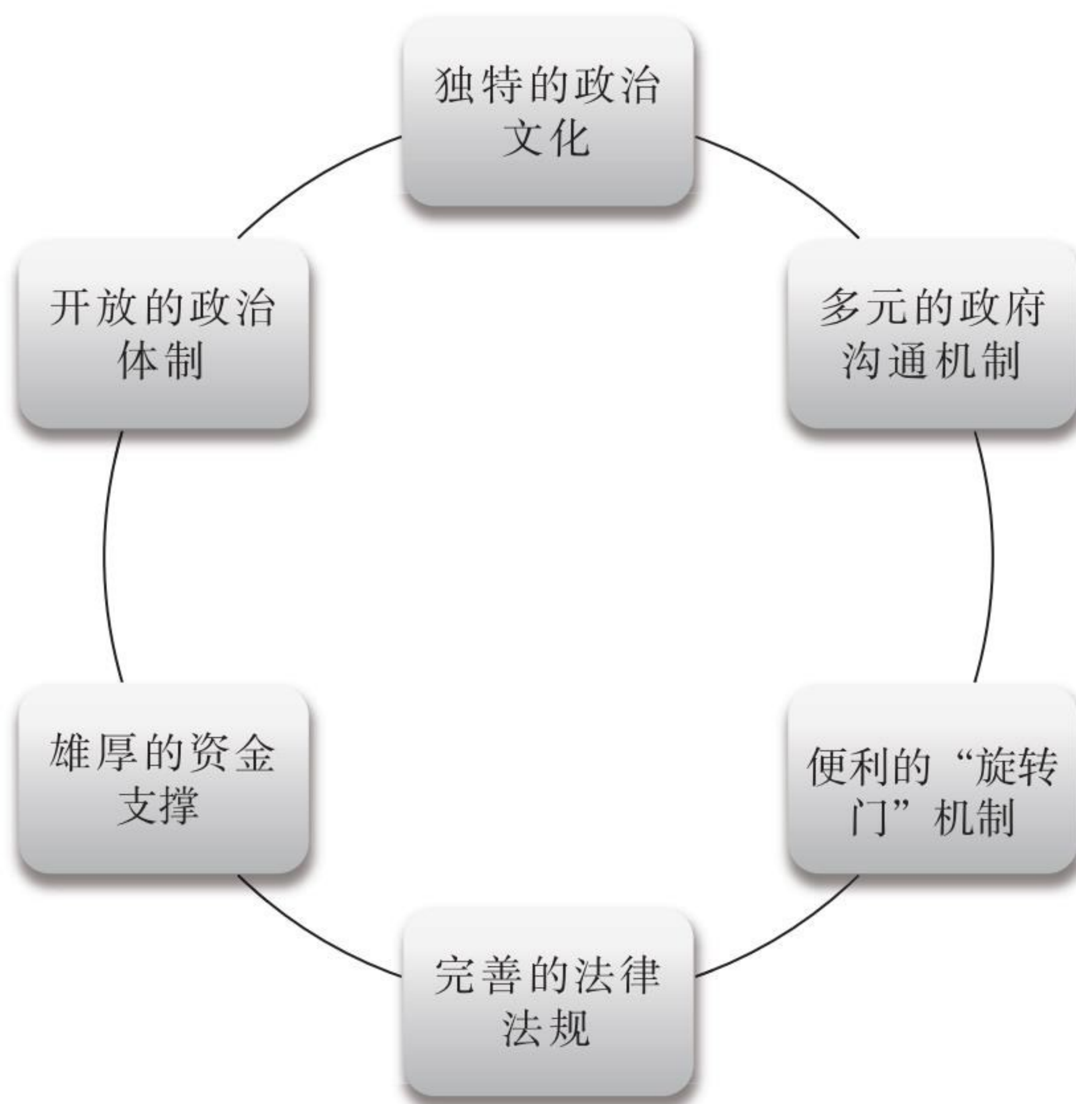


图3.13 美国智库政策影响力的推动因素

独特的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注]任何政治体系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它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也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功能。[注]美国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不信任政府，这为美国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空间。

开放的政治体制。美国属于两党制国家，两大政党通过总统与议会竞选轮流执政。两党议员以及总统候选人为赢得竞选，需要研究机构来充当智囊，但两党缺乏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注]，这就促使它们寻求智库的专业意见。

雄厚的资金支撑。曾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影响美国智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注]雄厚的资金为美国智库实现影响力提供了支撑。

完善的法律法规。在美国，智库在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后，只需要成立一个以宣传各种政策为内容的教育组织，就可以取得非营利机构的法定资格，并在税收制度上获得免税的优惠待遇。

便利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人员之间的双向流动，有利于提高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在美国，智库和政府的交流方式众多，智库通过派人参加政府的听证会和国会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同时，智库还举办各种培训会，对政府人员进行培训，或邀请政府人员与智库成员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政府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既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同时也提高了智库自身的影响力，提升了政府人员的理论水平。[注]

1. Donald E. 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2. 朱瑞博，刘芸.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3).
3. 根据《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美国智库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为1900～1945年、1946～1970年、1971～1994年以及1995年至今。
4. 纪忠慧.美国思想库的舆论扩散[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2).
5. 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 李安方等.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7. 美国白宫，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InnovationStrategy.pdf, 2011-02。
8.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9. [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 Michael Kramer.The Brains Behind Clinton,Time,1992, Vol.139（18）：45.
12.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智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13.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第四章 智库的思想创新力

在笔者所著的《大国智库》一书中，提出智库本质上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必须有独立的“思想产品”。真正的大国智库应该是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创新是智库的生命线，创新思想则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新思想引领国家决策

在决策者看来，智库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产生新思想并以此来改变决策者对世界的认知与反应。新颖的观点可以改变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政策优先排列顺序，影响规章制度的制定。(注)

——里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如果说在政策世界中，有一件事对智库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在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意识到议题的重要性之前，找到它，并使其进入公共讨论的范围。(注)

全球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主席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认为，智库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议题变得重要之前产生大量的思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则一再强调，“我们要为一年、两年、三年后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预先的周密思考”。

产生新的想法始终是智库最重要的任务，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20世纪40年代，当火箭科学还在初级研究阶段，当第一颗人造卫星尚未诞生之时，兰德的《试验绕地飞船的初步构想》就横空出世并前瞻性地提出了绕地空间站的革命性构想。1955年，一位名叫保罗·贝恩的青年工程师从休斯航空公司跳槽到了兰德，为了研制出一套军事命令与控制系统，他将信息分散，然后使用标准化的数据模块分节点传输，这样的数字空间简直超出了当时世界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

这可以看作互联网数字科技的灵感起源。兰德对通信系统的研究派生出互联网的构想，不但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成立于2007年，虽属美国智库中的“年轻一员”，其政策影响力却不可小觑。该中心联合创始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等曾于2008年6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平衡权力：美国在亚洲》，认为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虽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果，但缺乏一个成功的全面战略。美国战略因偏重于伊拉克与阿富汗，而牵制了其向亚太地区进行重大权力转移的能力，这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平衡权力的作用构成了巨大挑战。大概半年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将库尔特·坎贝尔纳入麾下(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认真思考自己的亚太战略，并于2010年做出亚太政策调整，这样看来，“战略再平衡”政策的出台与CNAS分析报告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布鲁金斯学会、斯坦福研究所、罗马俱乐部、野村综合研究所……可以说，国际上这些著名智库的崛起无一不是凭借着新思想、新观点与新理论。

《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以435家智库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从数量上，中国可谓名副其实的“智库大国”，然而，中国的智库却极少提出过有世界影响力的观点，更没有出现像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之类的世界知名智库。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深有感触：“很多国内智库做出来的东西只是现有观点的拼盘，往往一个观点谈不到点子上，很多时候只是点到而已，没有深度，中国智库具有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太少了。”(注)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智库缺乏思想创新力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的观点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他认为：“一方面，中国人从小缺乏开创性的思维，大家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太多；另一方

面，当今的应急任务非常多，大家疲于应付新任务、新课题，没有人长期深入做一些研究，当遇到问题需要对策时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能够比较超脱、客观地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多视角的思考，组织战略性、综合型与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研究，继而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全球智库的发展趋势，也是智库获得公信力和良好声誉的根本保障”。(注)智库要影响决策，必须具备前瞻意识，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着眼于长远和宏观的分析，关注战略性问题，为政府提供新思路。

2016年6月，中国提交了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函，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的信心与开放包容的精神。在此之前，CCG已经对国际移民政策等问题研究多年，并长期就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进行呼吁和建言，而笔者本人也是国际移民组织移民顾问理事会理事(注)。我们相信，加入IOM，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移民事务管理中把握先机，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移民问题不但包含国际移民，同样涵盖国内移民，包括2.6亿农民工在内的国内移民问题更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从长远来讲，这是牵涉国家稳定的大问题，作为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从业者，未来，我们还会就相关问题继续研究、建言与呼吁。

---

1. 里查德·哈斯.思想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个决策者的观点[J].国际论坛，2003(6).文章作者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和计划署主管。
2. Andrew D.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3. 库尔特·坎贝尔于2009~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引导和未来”研讨会。
5. 王希. 智库时代：中国奋起直追[J].半月谈，2009(14).
6. 其他理事会专家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吉尔吉斯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

缔造“头脑风暴中心”

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同时却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

激发内脑

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应该是一个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经常性的思想碰撞是产生新观点的必经之路，对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20世纪80年代，笔者正在北美读博士，还记得教授们常常组织午餐会，所谓午餐会，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午饭时间，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这种形式在北美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很是常见，笔者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期间，就经常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的Brown Bag Seminar[注]，这种午餐会每月举行一次，不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会聚在一起，一边吃着自带的午餐，一边分享着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可谓真正的“精神食粮”。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周都会举行“研究员会议”，每个研究员在会议上将阐述其论文的主要论点，其他人以此展开讨论。会议还会针对当下的热点问题开展头脑风暴；研究所每月还会举行几次“内部会议”，这些会议邀请各国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员、著名专家学者等做报告，内容涉及世界各地区、各领域的问题，从而帮助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熟悉世界的不同情况，将自己的专业与当前的世界形势相结合，开拓思路，激发灵感，不断产生新思想与新观点。

2015年初，CCG开启了“智库名家午餐会”和智库圆桌研讨会系列，围绕国内外重大政策变化、国际发展趋势、全球市场热点、行业最新创新等议题，邀请咨询委员会、学术专家委员会等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我们的首场午餐会邀请了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CCG副主任刘延宁、CCG首席战略研究专家段培君等三十多位专家以及多家主流媒体。大家围绕“中国如何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企业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如何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如何在‘走出去’中承担大国责任”等议题各抒己见。

每次智库名家午餐会都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使我们听到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智库的研究更“接地气”，更好地架起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桥梁，更好地为政府建言献策。除了固定的名家午餐会，智库内部员工的午餐会也实现了常态化，每周五中午，CCG的全体员工就会聚在一起，每周一位主讲人，大家分享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各自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员工午餐会这种形式的效果非常好，大家不但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在轻松的交流气氛中经常会迸发出很多新的思路，这对于需要持续思想创新的智库来说非常关键。

利用外脑

智库作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为了能不断地创造出新思想、新观念，知识的吸收和更新非常重要。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

国际知名智库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注重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思想碰撞的火花，增强自身的研究实力。

· 访问学者机制

加拿大佩米特理论物理研究所（Perimeter Institutefor Theoretical Physics），由RIM（享誉世界的黑莓智能手机的研发商）的联合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is）个人出资1亿加拿大元建成。这家智库提供访问项目，每年吸引百余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来访。其中，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每年夏天都会到这家智库工作一段时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中，有1/3属于访问学者，这些访问学者来自各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拥有约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来自各国的访问学者。

兰德公司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之间会定期互派访问学者，野村综合研究所与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

威尔逊中心、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移民政策研究所等国际智库都会充分利用访问学者。Abe Lowenthal[注]认为，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这些智库可能找到某个领域里全球最好的专家资源。

· 人员流动机制

思想在交流中产生。不同的工作环境造就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有过政府工作阅历尤其是有过高层决策经历的人员具有更为敏锐的政策思维与分析力，有着深厚学术研究功底的大学教授具备更为宽广的学

术视野……不同知识背景与工作阅历的人员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助于智库保持旺盛的思想创新力。这也是很多智库都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建立人员流动机制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有些智库会采用“派出研究员”的方式，接收从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派出的人员，在智库工作两三年后再回原单位工作。统计数据显示，43.2%的日本咨询机构都有这样的制度，其中80%的“派出研究员”来自企业。比如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的33位研究员中，只有3位是长期聘任人员。[注]

即使像兰德公司这种超级智库，也从社会上聘用了大约600位知名学者专家，作为自己的特约顾问，以保证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注]

·战略合作机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与全球三百多所大学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德国的柏林大学、中国的社会科学院与外交学院、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印度的政策研究中心、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意大利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等超过130家科研机构及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网络对智库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深有体会。自成立以来，CCG一直与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与交流。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国际移民组织、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德国劳动力研究所，等等。以国际移民组织（IOM）为例，它是世界移民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掌握着全球国际人才流动的重要数据和政策信息。2014年5月，CCG翻译出版了IOM的《世界移民报告》，这是其首次以中文版形式在全球面世，填补了这一权威研究成果在全球发行领域的空白。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2015年，CCG承担了IOM的三个研究课题，并主办了2015年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

坛。与IOM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对提升我们在国际人才方面的研究质量、提升我们在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安德鲁·西雷在他的著作*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中写的那样，“合作关系也许是最廉价的利用资源的途径，它会让组织的工作事半功倍”。

---

1. “Brown Bag Seminar”是指自带午餐的午餐研讨会，因为欧美人常用棕色的纸袋装午饭，由此得名。
2. 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Pacific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Policy）名誉主席。
3. 参见《世界智库比较研究》，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世界智库比较研究”课题组。
4. 金芳等.西方学者论智库[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跑赢“思想创新马拉松”

持续性的创新使智库成为某个议题的焦点所在，并使智库在影响政策和公共舆论方面独树一帜。

——安德鲁·西雷

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周期。很多智库都会利用这个重要时刻发表自己对美国政策的观点与看法。以胡佛研究所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货膨胀、高税收、日益频繁的政府干预、燃料缺乏、官僚主义等问题在美国社会一一浮现。胡佛研究所针对这些问题，邀请32位专家撰写了《80年代的美国》，为当时的美国提供可行的政策选择及行动方针。到了90年代，美国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胡佛研究所再一次撰写长卷《思考美利坚——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长卷共有四个部分，分别从世界各大区域及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美国有关的重要国际经济问题，美国的国内政策与目标，以及美国的未来发展四个角度，对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等领域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智库的思想创新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智库若想在这场“思想创新马拉松”中占得优势，就需要有前瞻性，于未发之时看清大势所趋，占得先机。当然，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占得先机之后还要时时创新保持先机。

十多年前，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还不像现在这般红火，很少有智库专门配置资源设立中国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管理层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设立中国项目。在随后不到三年里，就得到了

知名的华人政治学家裴敏欣（Minxin Pei）、亚洲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等众多中国研究专家的加盟，使得该项目成为全美阵容最为强大的且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声音。尽管在对中国研究上占得先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却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重要性不断提升，短短几年内，各大智库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此时的裴敏欣，已是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任，他发现，中国的政策界、知识界和新闻界等华语世界尚缺乏了解美国政治动向的窗口，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基金会创办了“卡内基中文网”和电子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Carnegie China Insight*）。月刊出版后，短短两年，订阅者增加到3000多人，并获得广泛好评。注

持续追求思想创新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能够取得不菲成绩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研究所引领时代潮流的能力。比如，1989年，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最流行的用语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研究所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率先提出“银行太大不能破产”的问题，为美国政府制定金融机构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思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研究所创始人伯格斯滕最早提出了中美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G2概念，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思想是智库的灵魂。对于处于弱势地位、蹒跚前行中的中国社会智库而言，坚持思想创新，不断提出前瞻性的思想，发出社会智库应有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虽然社会智库在数据获取、建言献策渠道等方面没有太多优势，但它们更“接地气”，对社会问题的接触面更广泛，可以获取更为准确的社会信息，提供更科学的政策分析。早在CCG成立之前，笔者就开始致力于对“海归”现象的研究。2004年，笔者主编的《海归时代》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是国内第一本全方位深度研究当代中国“海归”群体的书。虽然国内有学者曾对历史上的留学生

做过研究，但以当代中国第五代“海归”为研究背景的《海归时代》的出版，可以说开创了国内外系统研究“海归”现象的先河。此后，“海归”一词被使用得越发频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极富时代特色的热点词汇。2007年10月，笔者又主编了《海归推动中国》系列图书，《当代中国海归》《缤纷海归——110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魅力学者——10位海归教科文卫英才》《创业英雄——10位海归创业先锋》《财富裂变——10位海归风险投资翘楚》《资本推手——10位海归投资银行家》《叱咤华尔街——10位海归上市公司领袖》《巅峰职业——10位海归职业经理人》等系列丛书。在我们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09）》中，CCG在对调研得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新时期的中国“海归”是教科文卫领域的栋梁，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参与民间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着社团和公益的积极作用，是创业大潮中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主流，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手，也是跨国公司中国化的主力军，还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他们更带回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人才，带来了国际化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社会文化观念……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每年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

我们的一系列出版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社会开始关注“海归”这个独特的群体，同时也大大激发了“海归”回国创业的浪潮。今天，在中国，无论是国家对“海归”的重视，还是“海归”对中国的贡献，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也是令我倍感欣慰的一点。

在《当代中国海归》一书中，笔者提出了“海鸥”这个新概念。将“频繁往来于海内外，业务横跨东西方的跨国环流群体”称为“海鸥”，与“海归”相比，这个群体没有完全归来，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通过经商、讲座、教学等多种渠道为国服务。虽然他们不一定身在国内，却成为中国国际化的“先头部队”。在笔者看来，“海

鸥”群体的出现实质是全球人才的共享，如果充分利用好这个群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

笔者对“海鸥”概念的提出以及对此现象的探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2009年《北京青年报》曾就“海鸥”这一现象对笔者进行了专访。目前，“海鸥”这一概念已为国内外普遍接受。更令笔者欣慰的是，“海鸥”现象中所倡导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观也得到了认可与推广，今天的“海鸥”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施展个人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

2012年，我们在多年的研究和积累的基础上，首创《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相继推出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从“海归”到“海鸥”再到“海归学”，从国际人才到“国际人才学”，从“人才赤字”到“留学赤字”再到“移民赤字”……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CCG一直都在思想创新马拉松上奔跑着，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为了产生新观点而进行的研究投资是必要的，虽然这些研究可能并不会立刻或在较短时间内对政策产生影响，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新思想。㊟

---

1.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威尔逊中心科技创新项目主管David Rejeski。

第五章
智库的研究支撑力

智库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策略、新方法等研究成果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政府决策，这就需要智库能产生有价值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世界知名智库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研究定位、研究选题、研究基础对智库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至关重要。

研究定位

> 最成功的组织会明确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自己的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哪些以及如何有计划地实现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并实现最终目标。
>
> ——劳伦斯·W.里德[注]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各大知名智库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环境、健康、科技、经济等热点领域均被它们纳入研究范畴。倘若细看，我们又发现，这些智库均有各自专注的研究领域以及在该领域的话语权。例如，兰德的军事战略研究、布鲁金斯的中东政策研究、美国进步中心的公共政策研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政策研究、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项目、卡托研究所的自由主义与放松管制……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几大国际智库亦是如此，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下属的东亚研究所主要从事对中国的研究。

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和方向。智库应该如何定位呢？

兰德公司最初的人员配置主要来自“二战”时期为美国军方提供服务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战时，他们将运筹学运用于战争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战后，政府接受建议利用这批人员实施“兰德计划”。可见，兰德能成为军事战略研究领域的权威，与其最初的班底配置是密切相关的。

布鲁金斯学会以中东政策研究见长可谓顺应时代的需求。1916年“一战”进入胶着状态，欧洲各参战国对中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力量大大削弱。“一战”后，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先后兴起，这个鲜明的时代背景是布鲁金斯学会将研究领域定位于中东政策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壮大，对国际关系尤其是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美关系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

在智库研究者麦甘看来，智库需要清楚自身掌握了哪些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然后再划定研究范围。“蓝海战略”的提出者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认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资源是稀缺的，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是如此。即使像兰德这种“超级智库”，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笔者称其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应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然后坚持不懈地精心耕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产生核心竞争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以CCG为例，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国际化。因为我们非常熟悉“海归”、国际专家、海外的知名教授、智库学者等，所以可以将这些国际化的智力资本集合起来，组成国际化智库研究网络。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是目前我们的两个关键研究点。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迫在眉睫。与社会现实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人才制度的不够开放。制度障碍已成为中国吸引国际人才、高端人才的一大障碍。因此，我们致力于研究人

才国际化，剖析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与中国现行制度之间的差距。正如我提出的全球化四个浪潮中，人才的全球化将是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大势，这也是我们以国际人才为切入点的重要原因。企业全球化亦是如此，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企业全球化大潮正汹涌来袭。什么是国际人才？如何吸引并留住国际人才，如何让国际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企业“走出去”有哪些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哪些机遇与风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需要做好哪些功课？……如果能够将这些问题一一研究透彻，无疑将会为21世纪中国的全球化提供更多可行性与建设性的方案。

---

1. 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

研究选题

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与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能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提前对它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郑永平[注]

研究选题是研究的起点，关系到智库产品的理论高度与思想深度。兰德公司就非常重视研究选题，一般会安排10%左右的课题经费用于论证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

智库如何做选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是本与木、源与流的关系，基础研究为对策研究提供了理论土壤，智库要想前瞻性地提出政策思路，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否则，创新性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重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美国智库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传统基金会的一位行政主管曾说：“我们是在事件发生时立即讨论，准备向国会和国会工作人员的助理交付及时、可信、简洁的信息。”从中可见传统基金会对即时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如果单凭这一点，就认为其忽视基础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以大部头的书籍和长篇的政策理论研究作为输出产品。[注]

胡佛研究所会聚了很多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如专心从事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长期专注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的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ade Mesquita)……这些专家学者为研究所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基础理论研究更成为胡佛研究所品牌的重大支撑。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曾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注]其实，在美国，很多看上去和政治相去甚远的领域，比如在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经常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远远跨出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农民、工人、妇女、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许多的研究和结论经常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注]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往往成为各大智库专业人才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相较于美国智库的优势，基础研究恰恰是中国智库的一大短板。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引导和未来”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纷纷表达了这种忧虑，来自国务院参事室的张彦通司长举例说：“我国正在

大力建设的‘一带一路’，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以现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中东、中亚等地区的了解并不多。”如果智库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仅流于表面，不能对其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传统进行深入探析，就无法找到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更难以提出可行性的对策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李曙光院长提出：“要能够发现真的问题，就需要智库有中长期的战略研究。近年来，国内智库在研究选题上出现盲目跟风，对热点话题有一哄而上的苗头，对基础研究则有弱化倾向，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如果缺乏深入扎实的基础研究以及对现实的长期跟踪与调查研究，智库得出的所谓预测只能如空中楼阁。中国的智库应加强从学术界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

热点话题的正确切入方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研究选题上的一大特色就是高度聚焦于重大国际经济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引发的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到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十多个拉美国家，刚成立不久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紧紧抓住债务危机问题，通过一系列研究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研究所及时开展了全面的跟踪研究，并由此巩固了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进入21世纪，研究所再次跟踪热点，对中美经济关系、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国际热点进行了研究，并推出了《美元的未来》《为什么SDRs能够与美元竞争》《美元与赤字：美国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成果。

社会热点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吸引了社会大众的视线，智库如果能够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拿出“真知灼见”，往往能大大提高智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所以，智库需要有一定的洞察力与敏锐性。不过，智库想在热点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还需要在相关研究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功底，需要日积月累，唯有如此才能在热点话题“迸发之时”做到真正的“与众不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在热点问题上取得非同凡响的成绩，与其拥有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分不开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是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比如来自美联储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与埃德温·杜鲁门(Edwin Truman)，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这些经济学家深厚的知识积累与研究功底，才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关键时刻能与众不同的真实原因。

研究的前瞻性

“9·11”事件发生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布鲁金斯学会的保罗·皮勒(Paul Pillar)就出版了《恐怖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在对美国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及时深入的分析后，保罗·皮勒给出了应对策略，对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该书被誉为“制定和实行反恐政策的指导手册”[注]或许你认为这仅是一次巧合，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只是布鲁金斯学会前瞻性研究的一次具体体现。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大概会用60%的时间从事长期战略研究，其余40%的时间从事应急课题研究。环境污染、能源问题、中产阶级影响等一系列前瞻性课题都是他们的研究选题。

无独有偶，在兰德公司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倡导自由的研究精神和对前瞻性议题的研究，并成为宇宙飞船、系统分析法、计算机和互联网等领域的拓荒者。

“政府常常疲于应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去寻找方法解决一些可能、很可能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注]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智库需要做未雨绸缪的研究，并为政府设计解决方案，成为一个政府可以随时取要的方案库，帮助他们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注]。

不过，目前国内智库往往偏重于对当下具体问题的短期性研究，对热点问题往往“一窝蜂”，普遍缺乏前瞻性、战略性与储备性研究，真正能够对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起到作用的创新性思想成果并不多。我们知道，有些议题的重要性需要等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智库善于把握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坚持长期研究和积累，才有可能掌握某一问题或领域的制高点，更好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

1. 郑永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 引自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3. 参见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的《世界智库比较研究》。
4.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J].世界知识，2010.
5. 王希，姚平.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 在印度国防分析研究院（IDSA）成立42周年的庆祝仪式上，印度副总统哈米德·安萨里的观点。
8.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研究基础

强有力的拓展战略对影响力来说是重要的，但只有组织早已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有质量的研究进行了投资的时候才是有用的。

——安德鲁·西雷

如果把智库比作“知识工厂”，那么这个工厂的“设备”如何，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智库产品的品质。研究显示，国外智库非常重视对研究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多建有自己的图书馆，而且不少智库的馆藏量令人咋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这些智库还得到了本国政府的信息支持。

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

“与位于华盛顿特区之外的智库相比，华盛顿的智库一直是占绝对优势的执牛耳者，这不仅仅是因为运作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位置上的优势，这个优势可以帮助它们打造人际网络，强化与社会科学家、记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助手之间的关系网络。”[注]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原主席马歇尔·布顿（Marshall Bouton）曾说，“我们不在政治中心华盛顿，也不在国际大都市纽约，但我们依然在领先的商业城市，坐落于中心地区，这对发挥智库影响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布鲁盖尔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在成立不到三年即被评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智库”，2012年更是一举拔得西欧智库排名头筹，成为欧洲影

响力最大的智库。布鲁盖尔有如此上佳表现，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研究所位于有“欧洲心脏”之称的布鲁塞尔，处于欧洲事务的中心，能够及时获得第一手资料信息，建立与欧洲甚至世界要人的关系网。

对中国智库的地域分布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曾这样表述：“北京最为集中，共151个，占42％；上海共50个，占14％；其他地区160个，占44％。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智库90%集中在北京，10%在上海；而影响力一般和基本无影响力的智库80%在京沪以外地区。”注如果从数量和影响力两方面来权衡，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在智库发展方面发挥着何等重要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智库发展的起点和高度。

强大的图书馆

胡佛研究所创立初期，是以“战争资料图书馆”的性质存在，1946年开始逐渐延伸到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所最独特的优势就是拥有庞大的档案收藏，其图书档案馆分为美洲馆、非洲馆、东亚馆、东欧馆、中东馆、俄罗斯馆、西欧馆七大分馆，涵盖了自20世纪以来的众多珍稀史料。在东亚馆的中国收藏中，诸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个人日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和海报、毛泽东的密友尼姆·韦尔斯的个人文件等重要的档案都被囊括其中。

兰德的图书馆，拥有藏书53000本、报告30万余份、期刊3000种、各种比例尺的地图400张、大量缩微卡片。不过，兰德图书馆有一半为保密区，这里藏有大量外交、国防文件等国家机密。兰德图书馆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并可以通过检索其他图书馆的馆藏来满足研究人员的需要注。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从1968年起就为研究人员建立了图书馆，拥有书籍和杂志大约5万种，主要涉及国际安全、武器装备以及裁军等领域。研究所与世界上400多所研究所签订了交流协议，这使得其收藏的部分资料是独有的，在瑞典的其他图书馆是找不到的。㊟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拥有藏书20万余册、杂志1500种、报纸200多种。

大量的图书馆藏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雄厚而独特的研究基础，这对各国智库在国家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究数据的支撑

国际知名智库非常重视研究成果和研究数据的积累。

兰德公司开发了大量的特色数据库，比如统计数据库、案例库、调查数据库等。兰德还专门配备了一支由程序编制人员、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与操作员组成的技术队伍，大大提高了兰德的研究质量与工作效率。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国际关系与安全趋势数据库、军费支出数据库、军工业数据库、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以及武器转让数据库等在内的许多大型数据库。以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为例，该数据库提供了2000年至今所有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的和平行动信息，包括地点、部署日期、参与国家、参与人数、成本、死亡人数等。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建设有“武装冲突数据库”，可以查到1997年以来的冲突报告和数据。注

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但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国内外情报资料，还建立了涵盖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的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把信息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为项目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服务。

国际数据公司（IDC）研究显示，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超过40ZB，相当于4万亿GB。从奥巴马运用大数据分析选情到医疗机构利用大数据预知流感，可以说，大数据已经渗透了美国社会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并开始在全球蔓延。大数据具有实时性、客观性、时间序列性等特点，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可以有效克服传统数据资料收集方式所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客观性与说服力。如果能够对庞大数据资源进行潜在价值的深度挖掘，将有助于智库研究人员更好地把握现状与预测未来，从而大大提升智库产品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政府的信息支持

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智库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给予本国智库在信息上的扶助。比如英法一些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等取得有关国外项目的信息，通过国内有关部门传递给本国智库。美国拥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的80%，闻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十余个。这些“装备”为各大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着研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在中国，民间组织很难获取一些重要的官方数据，尤其是一些全局性的信息资料。这是目前中国智库建设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

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认为：“信息来源是目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智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和一个国家的信息开放度、数据开放度、资源公开度密切相关。”虽然早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开始在全国实施，不过，在具体的政策研究服务上，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为新型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权力。正如麦甘教授所言：“中国的智库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数据的可获取性需要得到彻底的保障。只有数据的来源透明化，才能提高中国智库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也只有做到科学研究和数据可获取这两点，中国智库才能走向全球，发挥影响力。”注

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

优秀的国际智库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开发，通常结合自身实践，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非兰德莫属。

兰德公司最早提出系统分析法，后逐渐变成兰德所有研究活动的核心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国防部还将这套方法运用于整个军事领域，并随之在各政府部门推广，形成了著名的“计划—规划—预算系统”（PPBS），之后又在民间得到推广和应用。

兰德公司在实践中发现，在集体讨论中，有时会出现屈从于权威或盲目服从多数的现象，于是其在20世纪中期，首次将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用于定性预测，由于这种方法将每位专家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分析问题比较全面，预测相对准确，得到了迅速传播，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域。

从提高研究成果的准确性考虑，兰德还发明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为博弈理论做出贡献的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和技术、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技术、数学建模及仿真的研究方法、网络理论、成本分析等研究方法。

针对需要调研访谈的研究项目，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覆盖率和抽样精确度，兰德会在项目之初就组建专门的抽样小组，协助课题研究小组进行调研访谈的实施工作。抽样小组通过电话采访终端来具体操作，而课题研究小组的专家则可以通过终端来了解实施进程和把控访谈质量。抽样小组的介入大大减轻了课题组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内部分工协作的研究方法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这些实用研究方法是智库在发展历程中结合自身实践与需求摸索出来的实用技能。对于正在摸索中发展的中国智库，这些研究方法是非常有益的借鉴。

质量控制：同行评审的意义

高质量是智库生存的根基，更是智库信誉的保证。在欧美国家，大多数智库都非常关注对研究成果质量的把控。

资源环境领域的国际顶尖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设有专门的“科学与研究部”，负责对研究成果的评审，以研究报告为例，其基本评审程序包括：出版计划—报告初稿—内部评审—外部评审—正式出版报告。整个评审过程一般需要6个月才能完成。(注)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的任何报告在向公众发布前，都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采

取内外部专家实名评审制度。

研究发现，采取同行评审是很多智库控制产品质量的共同做法。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就开始应用这种方法了，1665年这家智库首创聘请同行对其即将投寄给《哲学会刊》的文章进行评审。美国是第二个采用这种办法的国家。1804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要求美国哲学学会在发表路易斯（Lewis）与克拉克（Clark）远征探险的结果之前先进行评审。“二战”后，美国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某些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计划必须经同行评审。可见，同行评审作为一种美国科研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已深深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与立法之中了。

一般来说，同行评审过程涵盖以下几点：是否有评审制度、书面评审的准备工作、评审者的任命、评审报酬方式、评审者与作者存在分歧时的解决方法，以及内部研讨会是否作为评审的一部分。[注]

·是否有评审制度

尽管大多智库都认识到同行评审的重要性，不过鉴于自身能力，还有很多智库没有执行这种制度。

·书面评审的准备工作

对于已经具有同行评审制度的智库，是否采用书面审查也很关键。以书面政策声明形式来管理评审过程的优势在于，可以正式记录评论内容、降低在评审中产生误解的概率。

·评审者的任命与报酬

采用内部评审专家还是外部评审专家？以何种程序选择评审专家？评审是否有报酬？这些问题都是智库需要认真考虑的。

· 评审与作者的分歧解决办法

正如匈牙利智库社会研究所（TARKI）所言，“我们希望的不是评估，而是改善”。的确如此，同行评审不是为评估而评估，评估的目的是改善研究产品。因此，在解决评审者与作者之间的分歧方面，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及第三方，除非在主要观点上产生分歧时，才需要研究主管等第三方的介入。

· 内部研讨会是否作为评审的一部分

在项目进行期间，内部研讨会可以为项目人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向，其重要性不可小觑，为此，很多智库将内部研讨会作为唯一的评审方式。我认为，内部研讨会、外部评审都是智库把控质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种评审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智库的哪些产品需要评审呢？图5.1给出了我们对评审覆盖范围的一个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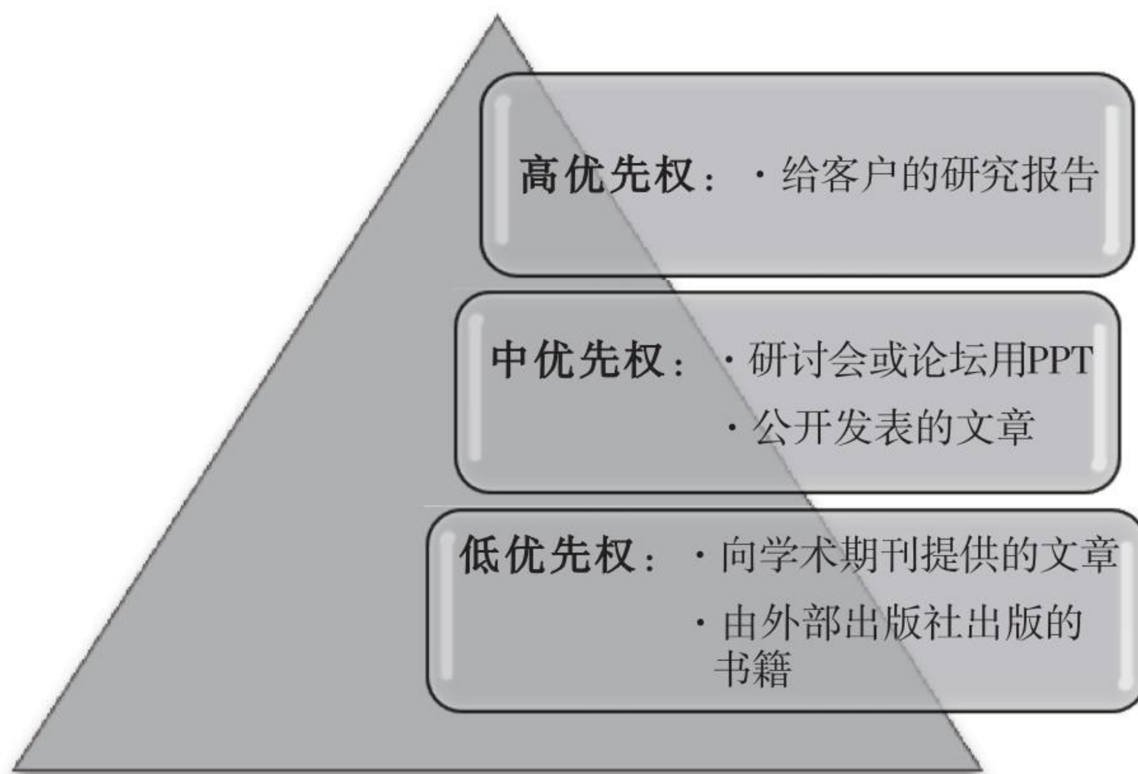


图5.1 智库产品同行评审类型及级别

从中不难看出，类似提交给学术期刊的论文、由外部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这类产品，由于其本身具有严格的评审程序，所以这部分产品的同行评审的级别就相对要低一些。而对于要提交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则是具有最高优先权的评审产品。

---

1. 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 杨谧.中国智库的现状与未来[N].光明日报，2015-09-09.
3. 金芳等.西方学者论智库[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 李轶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5. 张志强，苏娜.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智库理论与实践，2006(1).
6. 引自詹姆斯·麦甘教授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举办的智库圆桌会上的演讲。

7. 张志强,苏娜.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

8. Raymond J. Struyk.Managing Think Tanks: A Practical Guide for Maturing Organizations.

第六章
智库的社会传播力

智库的发声与公众的发声并不一样，它立足研究，声音更理性、更专业、更科学，为社会大众提供思想与观点，引导舆论，教育公众，服务公众，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沟通交流机制

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

——雷蒙德·J.斯特鲁伊克

智库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可以在公开场合阐述对政策问题的见解，这实际上是一个传播研究成果、为智库思想寻找舆论落点的传播过程。

举办会议是国际智库的“家常便饭”。这一点，笔者感触颇深，2010年笔者在华盛顿做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时，就曾在半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三场高品质的智库活动。还记得某天清早，笔者参加了一家名为Third Way的智库(注)在联合车站举行的演说会，演讲主题是“China:What's next?”演讲者是时任美国贸易副代表马兰提斯（Demetrios Marantis）和华盛顿州的国会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0点钟，笔者赶往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注)，参加那里举行的名为“China at Multiple Crossroad :The State and Trajec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的小型论坛。演讲者包括美国财政部前亚洲办公室主任盖保德（Albert Keidel）、前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主任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以及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大使杜大伟（David Dollar），会议由美国商会负责大中华区事务的高级主任王杰（Jeremie Waterman）主持。这天的午饭时间，笔者又参加了布鲁金斯的“Brown Bag Seminar”，坐在笔者身旁的是布鲁金斯的副总裁。这天的午餐会主要是学会研究外交政策的同人参加，会议的主持人是布鲁金斯研究员，他曾经连续十年被评为美国最优秀的时事评论员之一。其实笔者在布鲁金斯做访问研究员的时候，就经常参加这里的活动，

粗略算下来，一年下来两百多场[注]活动。普通公众如果注册为会员，就会得到很多这种活动信息，而且可以免费参加对公众开放的研讨活动。

真正的智库会议，一定是围绕智库定位举行。会前首先要对当下的宏微观环境和来自政策部门、企业界、专家学者的相关政策需求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创造性地选择、拟订合适的主题和议题，邀请恰当的人选，进行专业、深入、全面的讨论交流。与会者在活动中交流思想、碰撞智慧，激发出大量对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的观点。这本身也是一个定向、集中调查研究的渠道，为建言献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通过公共传播还可以启迪民智、影响舆论。这样就使智库兼顾了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统一。

“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威尔逊中心和其他智库成为关键地点，让人们可以聚集起来并倾听最优秀的对当下实践和政策的分析。”[注]这种传播方式对于营造舆论氛围非常有效，尤其是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智库就此以会议等形式将专家聚集在一起，发表观点，会在全社会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氛围。2016年中，“英国脱欧”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这股欧盟冲击波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中国与英国的合作将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地迎接挑战，深挖机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为此，CCG将2016年7月的名家午餐会主题定为“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午餐会吸引了新浪、和讯、FT中文网、人民网等大量中外媒体对专家观点进行报道。

沟通交流机制，是智库实现社会传播力的关键。智库如何实现有效沟通？科特勒（2000）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里，我们将其分为六步（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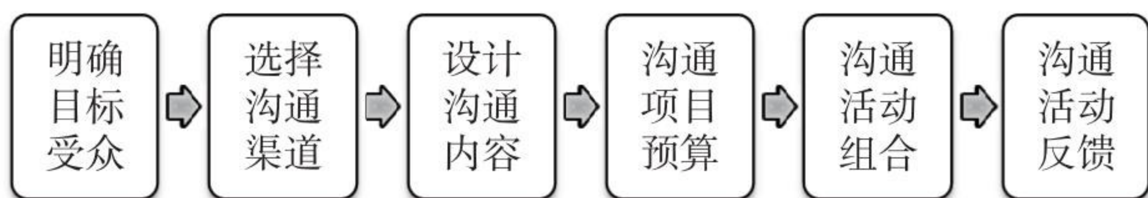


图6.1 有效沟通六步法

· 明确目标受众

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就需要明确目标受众，然后根据不同受众制定相应的拓展策略。如果目标受众是媒体，那么一场精彩的讨论可能会比单独的一场演讲效果好得多；如果目标受众是现有的或潜在的智库支持者，那么一场“高端范”的会议应该错不了。查塔姆社每年举行多达百场的国际会议，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邀请各国总理、部长等重量级人物来演讲。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杨洁篪分别于1995年和2007年在该所发表演讲，李克强总理也在访问英国时到该智库演讲。这种“高端范”无形中就为智库吸引到了很多新的支持者。CCG也吸引了很多国际上知名人士来CCG演讲，如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赖斯就于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当天在北京CCG发表了专题演讲。

当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智库在明确了目标受众后，可能会优先选择某些受众进行沟通与传播。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智库的会员享有优先权，不过，对外关系委员会也逐渐将目标受众拓展到媒体、国会议员。在传统基金会，国会与基层保守组织通常拥有优先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将目标受众定位于全球受众，基金会的网页现在使用四种语言，每一种在中东的出版物都同时使用了阿拉伯语和英语。

· 选择沟通渠道

为了扩大会议的影响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创新性地将会议开到决策者的“眼皮底下”。2006年开始，这家智库在国会山举办了为期13个月，以“重塑对华政策”（Reframing China Policy:Debate）为主题的系列辩论会。正如裴敏欣博士所言：“国会议员平时都很忙，没有时间总往智库跑，所以卡内基将辩论会‘送货上门’了。”一年多下来，相信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们早已耳濡目染了。

沟通渠道一般为多种形式的组合，而不仅限于单一的工具。智库需要根据受众特点，明确这些受众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介是什么，是书籍、研究报告、博客、微信、论坛，还是专栏，然后有的放矢地选择沟通渠道，最大化传播效果。

·设计沟通内容

实际上，很多研究者都会陷入所谓的“知识的诅咒”，正如奇普·希思（Chip Heath）与丹·希思（Dan Heath）在《创意黏力学》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某个话题上知识丰富的人有时会认为，其他人也具备同样的知识，而这可能产生严重的错误。研究者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非常熟悉，他们的研究对目标受众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超过了受众拥有的知识理解范围。因此，在沟通内容的设计上，需要考虑受众特点，比如专家需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信息，普通公众和非专家的媒体需要容易理解的，尤其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分析。

·沟通项目预算

政策研究项目成果沟通的最终预算是由确定策略、计算费用、调整策略、调整费用等一系列迭代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沟通项目预算应当具备一定的弹性，以方便日后的调整。

·沟通活动组合

什么样的沟通活动组合对智库是最佳组合呢?

不同的智库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活动组合的成本与收益是衡量是否为最佳组合的关键因素。以圆桌论坛为例，组织一场圆桌论坛，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涵盖以下几项：组织活动的工作时间成本，如准备和分发邀请函、邀请关键参会者等，参与活动的工作时间成本，活动场地的租借成本等。圆桌论坛的收益，可以用活动达到的效果加以衡量。其实不仅仅是圆桌论坛，智库发表的报刊文章、出版的著作、举办的研讨会这些活动都有其成本与收益，每个智库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根据自身需要和特点，进行不同的沟通活动组合，以最大化传播效果。

·沟通活动反馈

如果智库持续对过往的沟通活动进行效果观察与记录，那么下次沟通活动的方案一定会更加优秀，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同的沟通活动需要用不同的监控与追踪方法。比如新闻发布会的效果可以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量进行评估，以及新闻发布会所引发的后续传播和电视报道的数量；再比如圆桌会议或研讨会的效果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评估，这种调查问卷形式应力求简单，会议参与者只需一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毕。注

---

1. Third Way是一家年轻的智库，宣称自己是代表中间派，服务中产阶级的发展，主张强硬却灵活的安全政策以及清洁能源革命等。其前三任主席现在都在奥巴马团队中任高层，有担任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部长的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和内政部部长肯·萨拉查（Ken Salazar）等。
2. 大西洋理事会拥有50年的历史，创建人包括多位美国前国务卿和部长。大西洋理事会致力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其中近年来包括对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关系等多方面与中国相关的研究。
3.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年报，学会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共举办了226场公共活动。
4. 安德鲁·西雷。

5. ［美］斯特鲁伊克.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M].李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研究输出机制

40年前你可能会写一本书，把这本书放上书架就够了。但现在你必须把所有研究成果逐一分类，然后针对不同传播渠道的特性，用不同的故事去把你的研究成果传递出去。

——罗马俱乐部秘书长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

智库凭借高质量的研究影响国家政策。这种影响会借助出版物等形式产生，因为研究成果在面向社会发布的同时，也会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从而帮助塑造政策和引导公众对某些议题的思考。

著作出版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具备深厚的学术积淀，他们出版的著作常被业内奉为经典。比如约瑟夫·佩克曼（Joseph Pechman）所做的关于联邦税收政策的书，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帮助布鲁金斯学会确立了税收政策议程。[注]令笔者颇为感叹的是，布鲁金斯研究人员在撰写著作方面笔耕不辍，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著作诞生，比如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的《中国烟草的政治版图》、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的《未知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2015年学会出版社共出版著作38本，学会大楼内还设有书店，出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

“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一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同样有着浓厚的出书文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副主席吉姆·林赛（Jim

Lindsay）说，CFR鼓励智库的研究员们多写书。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也经常建议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努力做到写书与短期政策项目并行。

以书籍形式推出智库成果，着眼于长期、宏观的影响力塑造，属于长线产品，一般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少智库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不过，事实证明，书籍的舆论影响力可以跨越时空，这种形式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更为深远。

刊物

1970年，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无法自拔，国内反战声浪此起彼伏。来自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与其前哈佛同事沃伦·曼谢尔（Warren Demian Manshel）认识到，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再审视和再定义”的时间到了，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创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要使这份杂志“严肃而非学术化，活泼而不圆滑，批判但不消极”。很快，这份杂志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家园。197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为该杂志的所有者和发行人。1997年，委内瑞拉前经济部长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成为杂志主编，在这位经济学家的引领下，《外交政策》影响与日俱增，不但先后多次获得全国杂志奖，还发行了阿拉伯语、日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诸多版本。[注]

《外交》（*Foreign Affairs*）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著名刊物，自1922年创刊以来，该杂志已成为美国重大国际事务的权威观点的发源地。被称为“冷战”时期“遏制”理论之父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就曾署名“X先生”在《外交》上发表文章，为美国政府的对

苏“冷战”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外交》上的“文明的冲突”，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出版的《军事力量对比》《战略研究》等刊物名气也非常大，常被推崇为世界军事方面的权威。

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主导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旗舰刊物《外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与《国际问题》杂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这些学术刊物之外，意见杂志也成为诸多智库的选择。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Rand Review*）、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弗雷泽论坛》（*The Fraser Forum*）等。

知名智库多有国际公认的刊物与杂志，智库成果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得以发布与传播。可以说，通过创办刊物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基本成为知名智库的重要选择。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新的杂志将不断诞生，已有一段历史的杂志将呈现出出版周期缩短、出版频率增加、出版物数字化等发展趋势。

报告与论文

发表报告是智库经常采用的一种传播形式，比如兰德公司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与论文已超过13000篇。相对于著作的“费时费力”，报告形式相对灵活，对于增加智库的曝光率、赢得话语权，提供了一种可

行的渠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年度报告“RAMSES”发行量达到1万份，在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成为很多国际问题研究者观察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参考。

为了吸引工作忙碌的政策制定者的眼球，传统基金会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简捷的研究发布方式即政策简报。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还要归功于该智库的创办者，他们多在国会工作过，因此深谙“国会工作之道”：国会议员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每天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吸收思想，这就决定了能够概括现有研究的一篇文章可能比一本鸿篇巨制有用得多。尤其是在国会辩论期间到达的一篇分析报告比最终投票后才姗姗来迟的一本书更为有用。[注]

智库的报告如何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呢?

·发布时机很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率先就美国次贷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问题发表研究论文，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所长伯格斯滕的论文《美元与赤字：美国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更是引起全球轰动。

·研究领域很关键

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该智库主要通过“全球腐败指数”来评估各国的腐败情况。1995年，透明国际公布了首份清廉指数报告，此后，这份年度报告经常被各大权威国际机构引用。从“纯洁绿洲方案”[注]到国际腐败洞察指数[注]，透明国际在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研究质量需保证

1994年，一篇题为《中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崛起》的报告被推荐给有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作为决策参考。这篇报告是由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的三位作者为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所撰写。报告从启动到完成大约经历了一年时间，经过多次讨论，数易其稿。

电子时事通信

互联网时代，智库开发了以电子出版物的形式来提高传播速度和广度，电子时事通信就是其中一种，它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达给受众和利益相关者，与平面媒体制作相比，传播成本低廉、时效性强，成为咨政、启迪大众的重要途径，受到很多智库的青睐，成为智库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之一。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出版了包括《国际经济报告》周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的《阿拉伯改革报告》月刊（*Arab Reform Bulletin*）、中文的《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防武器扩散信息》周刊（*Proliferation News*）等在内的6份电子时事通信。

---

1. 任晓.第五种权力：论智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刊物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也与日俱增，这些都超出了一家智库的能力所及，因此，200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外交政策》出售给《华盛顿邮报》公司。
3. 任晓.第五种权力：论智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 1997年3月，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透明国际提出了“纯洁绿洲方案”。
5. 1998年9月，透明国际发布了该指数，涵盖了85个国家和地区。

舆论引导机制

> 智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
> ——裴敏欣[注]

1968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这一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一项调研，之后将调研结论以论文形式发表在1972年的《舆论季刊》上，在这篇名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中，两位专家提出了“议题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如果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就会影响公众舆论。

我们发现，欧美智库纷纷成为“议题设置理论”的实践者，积极利用新闻传媒的力量进行议题设置，从而实现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当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欧美智库又站在网络新媒体的风口处，向全球推广自己的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在全世界构建自己的影响力。

媒体传播战略

“创新的思想、扎实的研究只是智库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重要工作是投入大量的精力思考传播战略，并将这个战略付诸实践。”[注]

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在诞生之后的很多年里并未引起太多重视，在全国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一直到新总裁威廉·

巴若第（William J.Baroody）就任后，局面才发生了扭转。威廉·巴若第认为，“创造内容与传播内容对智库同等重要”，他十分强调使用营销和公关战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企业研究所每周都会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的电视节目，并在全国六百多个电视台、广播电台进行播放。到了80年代初，企业研究所已经从最初很不起眼的一家协调性机构发展成为华盛顿的重要智库。里根当选总统后，从企业研究所挑选了数十名专家委以重任，在这些专家的协助下，里根政府在经济、政治、外交、法律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企业研究所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通过新媒体平台展现专家风采，凝聚网络人气，网罗新生代用户。比如，2012年5月，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的一场讲座被剪辑改编成“白色书写板”风格的视频发布在YouTube网站，吸引了近15万人观看。

传统基金会曾采取购买电视时段的方法进行传播。1982年，该智库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购买了90分钟的电视节目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两个无线电播音室，并开设了政治新闻谈话节目在电视台播出。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基金会的讲座、演讲、报告等得以传播到美国上万个家庭。

来自意大利的国际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ISPI），是一家拥有80余年历史的智库，研究所通过与意大利最大的电视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以及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日报之一——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大众媒体决定报道哪些舆论的时候，现实世界已经被压缩了，在政治生活中讨论哪些议题，以及如何讨论这些议题，很大程度上都由媒体所决定。”[注]众多智库的传播实践也证明，媒体的报道在帮助智库传播观点方面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媒体的发声，不但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影响公众，还能够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美

国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智库的媒体影响力与国会影响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媒体影响力大的智库往往容易得到国会的青睐，从而成为国会的“座上宾”。㊟

那么，智库如何才能获得媒体的青睐呢？唐纳德·阿贝尔森认为，这取决于智库的规模与研究范围的大小，就像布鲁金斯学会更像是一站式的“政策商店”，所以更容易获得媒体青睐。㊟我们认为，要获得媒体青睐，至少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了解媒体

最成功的销售人员往往是那些能够站在客户角度进行换位思考，能够说出客户潜在需求的人。某种意义上，媒体也可以被看作智库的一个重要“客户”，在与媒体建立联系之前，你需要了解其需求。

·联络媒体

如果媒体从没听说过某智库，那么即使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也不会引起其重视。因此，智库对媒体需求有清晰的了解后，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定位列一份“意向媒体清单”，将计划建立关系的媒体一一列出。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媒体分享有价值的信息，充分展现智库的专业性，以此吸引媒体的眼球。

·建立信任

如果媒体形成了一种惯性意识，认为每次与你通话都会解决某个问题，比如找到新的思路或是以往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专家来咨询，而给你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那么就会经常与你联系。这样，智库就确立了在媒体心目中的一个可靠信息源的地位。

·沟通常态化

智库可根据每年的出版计划、论坛活动、课题项目等制作媒体计划，提前评估哪些活动或者出版物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地提前与媒体沟通，对于沟通的先后顺序及资源都需要做慎重考虑。

·媒体投入

在媒体投入方面，国外智库一般都很“大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用于传播方面的费用占总预算的3%，约为245.2万美元。不过，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要首推传统基金会，仅2007年这家智库在媒体与政府关系方面的投入就达到了800多万美元，占其预算的17%。[注]传统基金会的公关部门曾立下目标：“保证记者永远没有理由不引用至少一位保守派专家的意见，或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至少有一些保守观点的存在。”很显然，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仅2003年该智库学者就在电视上出现了1100多次，在广播里出现了1400多次，在报纸和网络媒体中出现了900多次。[注]

与西方智库重视媒体传播相比，中国智库在利用媒体力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中国智库已经意识到了传播力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这家智库成立于2013年，短短两年时间，就做到了“声名鹊起”，我想，这与其重视智库的营销能力，利用媒体力量打造传播力是分不开的。

网络媒体的全球传播

一直以来，著书立说都是传播思想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智库传播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然而，当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一切都在悄然发生改变。对于互联网传播，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

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描绘道：“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布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无法控制这个网络。”日新月异的信息传递手段、迅猛的信息传播速度，都对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重视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

在这个“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时代，舆论的形成机制正悄然发生改变，开拓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当下智库社会化传播中的重要选择。

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几十名专业工作人员与学者们一同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Focebook、Twitter等形式将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加工”，让政府、媒体、大众都能看明白。打开2015年年报，我们看到，布鲁金斯学会的Twitter粉丝数达到178000人，Facebook粉丝数达到165000人。

美国胡佛研究所的Facebook通过重点推介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塑造智库的良好形象，受到众多粉丝的关注和热捧。

美国进步中心充分发挥了Twitter的互动性特点，为其关注者创造了一种可以与中心内人员互动交流的感觉。

·优化智库网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网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网站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并称为经济学界影响力较高的三大国际网站。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网站每月拥有平均近40万的访客、超过100万次的点击量。

为了最大化网站传播效果，国际智库各出奇招。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就雇用了大量来自新闻一线的以及具有国际事务背景的专业人员亲自“操刀”，将会议与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展示，还专门发布了对国际时事的独家采访，其目标就是要将网站做成“有关国际时事和趋势值得信赖的、非党派的、及时的分析和背景介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早在2004年就推出了中文网，旨在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基金会的著作、活动等信息，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与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目前，大部分的美国智库都有自己的网站，实力雄厚的智库还会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网站。相形之下，中国大多数智库的网站可谓“寒酸”，麦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直言，“的确有学者和我说过，中国现在大约有2500家智库，但是从没有数据库让我获取这些智库的信息，令我苦恼的是，中国很多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或者网站更新太慢，中英文双语网站更是少之又少，很多网站上没有智库专家的档案，甚至连有效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注] 笔者认为，智库网站是智库的一张名片，是智库全方位展示自我的一个窗口，是公众了解智库“真相”的开始。智库要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拓展全球视野，让网站成为智库国际化的第一步。

在全球化时代，智库在国际交流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越发凸显，能否用国际语言进行交流和传播显得尤为重要。“两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要“重视智库外语人才培养、智库成果翻译出版和开办外文网站等工作”。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要“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中国智库建立和完善英文网站，向世界介绍最新的政策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活动内容，以及中

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的动态，可以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中国声音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提升。

在竞争白热化的思想市场上，如果缺乏全方位的舆论传播机制，再好的思想也会被埋没。在新媒体风起云涌的时代，智库要扩大影响力，不但要在传统媒体上经常“发声”，也要认真研究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分析不同的受众需求，适时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You Tube、Vimeo等传播手段，构筑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传播平台。这一点对于社会智库尤其重要，正如安德鲁·西雷所言，“如果说对于大型智库，社交媒体提供了接触更广泛和更多样受众途径的话，那么对于小型智库来说，社交媒体则提供了廉价而高效的途径去开拓思想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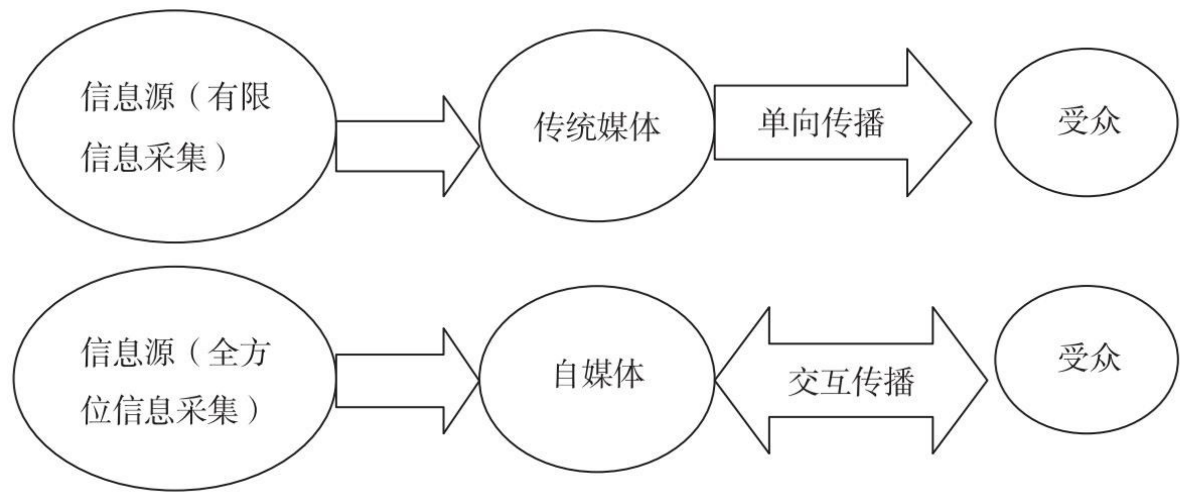


图6.2 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传播比较

1. 裴敏欣，中国问题专家。
2. Brain Lee Crowley.How Can Think Tanks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n the Media?.A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99.
3.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4. 肯特·威佛与安德鲁·里奇通过分析美国51家智库的知名度之后发现，吸引了相当媒体报道数量的机构比那些媒体形象一般的智库更有可能被召集到国会陈述观点。
5.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6. 原松华.建设一流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J].中国发展观察，2012.

7.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智库本身——对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N].光明日报，2015-07-01.

第七章
智库的国际输出力

国际化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是大国智库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年前，当国内对国际化智库的概念尚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经验时，笔者便开始探索中国社会智库国际化的模式，在CCG创立伊始便秉持全球视野，把“走出去”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好声音”作为目标。智库的建设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唯有如此，才能在做好研究的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国际输出，打造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塑造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

>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智库需要在世界历史和地缘经济的大环境里研究全球化。
>
> ——陈启宗[注]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期间，笔者受到了学会的两次邀请，参加了有关中国“海归”研究与中国人才研究的两场研讨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人才和“海归”研究的重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国际化智库所拥有的全球视野。

全球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共同的挑战与威胁：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问题、难民问题、人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金融监管……我们发现，在这些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领域，国际知名智库早已“深耕细种”：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国防与安全政策、全球卫生问题、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与贸易等领域，布鲁金斯学会在商业与金融、国防与安全、能源与环境、全球发展、国际事务、法律与正义、都市治理等领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民主与法制、能源与气候、核武器政策、俄罗斯与欧亚大陆等领域都拥有国际话语权，这就在无形中有助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保持有利地位。

国际智库注重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这是其能够取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当然，前提是这些智库还需要有国际化人才的支撑。

2009年，就在《里斯本条约》生效的前夕，布鲁盖尔研究所出版的《2010~2015年欧洲经济的优先议程：新委员会备忘录》，在第一时间成功影响了欧盟新机制的决策。这家智库成立于2005年，短短十年

时间，就发展成为欧洲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智库，在欧洲智库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关键原因就在于该智库能够顺应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大势，其成员来自整个欧洲，而不局限于欧盟国家，国际化人才决定了其视野更加广阔。

总部坐落于英国伦敦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具有浓郁的“泛欧”特色，委员会由一百多位来自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的政界、学界、工商界精英人士组成，委员会的办公室遍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如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这种结构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多样化的视角，更好地反映欧洲复杂的政治与决策现实。

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世界舞台上经常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这也是目前全球性战略议题的设置和话语权被牢牢把握在国外智库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次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笔者曾坦言：“现在中国具有国内视野的智库并不缺，真正缺少的是具备国际视野的智库。”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省与省之间的比较，更需要参考全球大局与国际大势。

要形成中国智库的国际视野，不妨借鉴这样一句话，“让国际智库成为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建设者”。正如跨国公司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理念与文化、技术与模式，并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一样，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为中国智库织出一张大网，对于增进理解和消除误会十分重要，毕竟国际输出不能只靠“自说自话”，还需要拥有听众听得懂的话语以及可以接受的讲述方式。

---

1. 陈启宗，中国香港恒隆集团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CCG联席主席。

向世界发声

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得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龙永图[注]

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人类便踏上了全球化之路。几百年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在各国经济中的优先增长，信息全球化成为当今全球化的新动力。我们必须承认，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普通人，不管情愿与否，都已被卷入其中。今天，代表着一国"智商"的智库不仅需要了解世界，更需要走向世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可以称得上智库走向国际化的鼻祖。基金会相信，"单一存在于某一国家必然会限制其视野，在当今世界中，智库的使命既然是要贡献于全球安全、稳定与繁荣，就需要保持跨国的存在与跨国的视角"。[注]于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在巴黎设立欧洲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分崩离析，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时，基金会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心，促进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原苏联国家的专家一起就俄罗斯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军民关系等重要政策问题开展研究。进入21世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新愿景：成为第一个全球性智库。2005年，基金会设立中国中心，随后继续开疆辟土，设立中东中心、欧洲中心，根据基金会的规划，未来还将在亚洲的印度以及拉丁美洲建立研究中心，逐步形成其全球网络。

在走向国际化的旅途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并不孤独。

2006年，布鲁金斯中国政策中心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将中东中心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来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将自己定位为一家位于瑞典的国际性研究所。成立30周年之际，该研究所曾自豪地宣布，从未任命一位瑞典人担任所长。研究所在布鲁塞尔、北京、华盛顿等地均建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来自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华盛顿成立了美国分部、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洲分部、在巴林设立了中东分部。来自日本的野村研究所在伦敦、纽约、巴西和中国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

兰德公司同样不甘落后，除了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以及三大分部外，还将欧洲总部设在荷兰莱顿，在德国柏林和英国剑桥设有分支机构。除了设立分支机构，兰德还承接了大量的国外研究课题。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就曾委托兰德进行一系列技术前瞻研究，帮助天津制定与实施一项战略性的远景规划。2011年，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兰德公司，就广州“知识城”[注]创建全球链接的区域创新体系开展课题研究。海南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也均出自兰德之手。

国际知名智库在设立海外分支机构，进行全球化布局的同时，还通过举办各种国际性研讨会加强与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构建面向全球的研究网络。正如菲尔德和格兰特在《善的力量》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想要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联盟网络，并将其作为组织改变的引擎”。与其他组织战略合作形成的关系网，是智库可以利用的一个无形资源，相较于智库的“单打独斗”，常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每年举办的研讨会、论坛达到七八百场之多，平均每天接待三百多人，CSIS借此与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例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日本

冈崎研究所、“台湾欧美研究所”等智库互动密切，经常就美日战略以及亚太区域安全等议题举办研讨会。

国际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研究与发声，是智库展现自身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比如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几乎是所有研究国际问题智库都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选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门设立了“中东项目”，旨在通过详尽的国别研究，结合当地视角与横向比较视野，深入分析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等问题，提出公众和决策者需要的判断与建议。英国的外交研究中心针对中东地区设立了两个大型研究项目：“文明计划：为中东改革提出西方的策略”“伊拉克之后的新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布鲁金斯学会更是以中东政策研究见长。

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一次又一次刷新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美国《时代》周刊干脆将其形容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的确已经坐到了世界大国的“主桌”上，但是，大多时候我们都在遵循着别人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参与着别人设定好的议题，这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必须学会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智库，在社会系统中掌握着相当多的话语资源和话语能力。作为世界智库大国，中国智库理应在国际话语权体系中大有可为，然而根据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七个区域13个地区的政策话语中心里，大洋洲与亚洲智库的话语中心分别为：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中国竟然无一城市上榜”。[注]要扭转这种弱势局面，中国智库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智库的成长必须具有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这就需要：中国智库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密切关

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

1. 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
2. 李铁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3. 广州知识城市是广州开发区与新加坡星桥国际的合作项目，旨在打造一个汇聚创新型产业和知识型人才的生态宜居新城。
4. 原松华.建设一流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J].中国发展观察，2012.

第八章
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在西方国家又被称为“影子政府”。2008年以来，CCG参与推动了“千人计划”、人才签证、中国绿卡待遇、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等政策的诞生。然而，智库仅提供一种参考性的专业意见，不能代替政府做决策，更不可能越界干预政府的决策。

智库影响决策：一般方式

决策需求作为智库的市场，智库就必须要明确市场目标。智库可以提出有穿透力的预见预测，提出技高一筹的解决方案,提出可以落地的实施措施，以帮助决策者更加清醒，减少失误。与一般性研究不同的是：智库产出并不是以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为终止点，而要与决策者形成供给与需求的链接，并为决策产生具有价值的影响。

——刘燕华[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宣称自己是一个“事实库”，致力于发挥信息的力量。如果基于此，认为这种智库对影响政策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所有的智库，无论何种类型，都在寻求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因为不同智库在功能定位、机构规模、地理位置、资金供给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其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大不相同。威尔逊中心高级学者约翰·苏尔（John Sewell）认为：“大多数智库在提出问题方面比将问题推上政治议程上做得更好。因为新想法需要时间的检验，决策则常被政治事件所驱动，这是研究者所不能控制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政策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大多智库将研究成果以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形式加以呈现，通过会议、论坛等公共对话方式，帮助决策者、专家及一般公众了解智库的新思想，引起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影响长期舆论环境，并最终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比如威尔逊中心的环境变化与安全项目（ECSP）就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产生新想法，并帮助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以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新观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各种方式影响决策。这里，我们按照长期与短期、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进行一个大概的分类（见图8.1）。

·短期间接方式

智库通过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参与电视新闻访谈，接受主流媒体采访等方式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热点话题发表观点，尤其是对一些突发性事件进行点评，引起社会关注，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海湾战争期间，仅1990年8月一个月内，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就在美国晚间电视节目中露面达14次之多，可谓“赚足了眼球”。

·长期间接方式

智库通过出版物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影响政治决策者、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这方面的典范仍非布鲁金斯学会莫属，该学会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和专著出版，根据2013～2015年学会年报，布鲁金斯学会三年出版了129本著作，更重要的是，学会还设有自己的出版社与书店，专门负责学会研究员著作的出版与销售。

·短期直接方式

智库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与论坛，通过邀请高层决策者的出席，可以达到主动设定议题与议程，与政策制定者面对面交流的效果。智库也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层的听证会、讨论会等方式，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直接交流，这无疑是一种关键而深刻的影响决策的方式。

承接政府课题，是智库发挥决策影响的重要途径。比如兰德公司通过承担美国军方的研究课题，与政府部门人员一起从事研究，分享

研究成果，实现与决策层的对接，直接影响政策。

向政府提交政策研究报告。2006年底，在伊拉克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美国企业研究所推出了题为“选择胜利：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计划”的报告，提出应将重点转向社区与居民安全维护以及经济重建等方面，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肯定和赞扬。

·长期直接方式

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美国的两党制造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格局，随着政府的更迭，相当一部分官员流入智库，“蛰伏”起来，由决策者转变为研究者，这些具有丰富政府工作阅历的研究人员对问题的把握有其独特的视角，在影响政府决策与国会立法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当这些研究人员所认同的政党“东山再起”时，又会有一部分智库精英成为未来总统的参谋，或进入政府成为决策参与者。基辛格、赖斯、伯南克、拉姆斯菲尔德……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美国智库“旋转门”的最好注解。

毫无疑问，“旋转门”机制是智库影响决策的一种长期而直接的方式。此外，智库专家还可以通过担任政府决策机构顾问的方式，直接影响政策。对大多数民间智库来说，国家层面的建言献策渠道可能非常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寻找地方政府层面的突破口，努力做好地方政府部门的“外脑”，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笔者就担任了多个省市的人才工作方面的顾问，如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浙江省政府人才工作顾问、四川省政府海外人才顾问、广州留交会和大连市海创周顾问和无锡市政府海归创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东莞市长经济顾问、深圳前海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人才顾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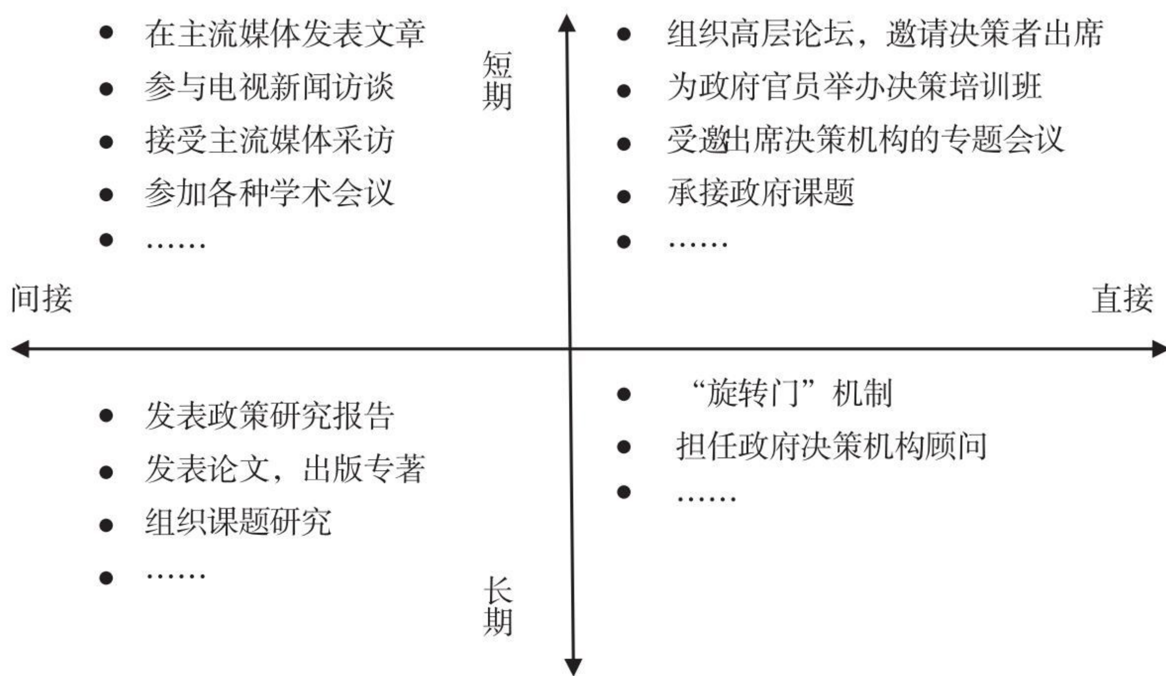


图8.1 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与途径

1. 刘燕华，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副部长。《智库运行和智库产品的评价要点》

政策影响机制：中美图景

虽然智库不是分析政策问题的唯一来源，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具有连续性的分析来源。很多事件已经表明，智库中熟练的政策分析师常常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推动关键政策的制定。[注]

——安德鲁·西雷

美国智库政策影响机制

美国决策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分权，这种分权体现在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横向分权源于三权分立制度，这一制度造成决策主体的分散，在决策程序中，国会、政府与司法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纵向分权指的是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相比于英法等单一制国家，美国的纵向分权程度较大。[注]美国开放的政治体制、独特的政治文化、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得智库等社会力量具备强大的政策影响力。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影响国家的政策决策。

·影响总统

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周期，也为智库提供了成为“未来总统参谋”的绝佳契机。对于相当一部分缺乏联邦政治圈从政经验的总统竞选者而言，邀请资深的智库专家组成政策研究特别小组，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竞选成功后，这些智库专家中的一部分还可能会进入内阁，担任政府高官，成为“总统参谋”。

1998年4月，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沃克·布什（Geoge W.Bush）中断了竞选连任州长的筹资之行，赶往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家中。舒尔茨此时的身份是胡佛研究所成员，他这次邀请布什是想让其结识几位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他们都是美国领先的政治专家。长达4个小时交流的结果是，布什在竞选总统时，聘请了大概12位胡佛成员为其提供从税务问题到福利、外交等各方面的顾问服务。除了倚重胡佛研究所，布什还重用了很多其他智库的专家，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以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罗伯特·泽奥利克等。[注]

1979年秋，传统基金会总裁埃德温·福伊尔纳（Edwin J. Feulner）就预料到共和党要取得大选的胜利，于是，他决定启动一个全面研究计划，为新政府执行内政外交提供一个指导性文件。1980年总统大选结束后，福伊尔纳前往海亚当斯酒店，将一份长达千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打造保守型政府之蓝图》[注]交到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注]手上。米斯在《支持里根》中写道，“里根总统让人把那份报告复印以后，给内阁里的每个成员分发了一份，并指导他们怎样阅读它”。据福伊尔纳估计，传统基金会超过60%的建议方案都被里根政府采纳和实施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华盛顿的观察人士把这份报告称作里根政府的《圣经》了。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能够有机会不断获得对一些复杂、重要和紧急外交问题的深入分析，我求助于一个叫作‘三边委员会’的组织，来自这个世界的三个民主地区的几位领导者每六个月碰一次头，一起讨论与日本、北美和欧洲当前利益相关的各种想法……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身份让我有幸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很多成员还帮助我研究外交政策”。[注]

· 影响国会

在美国，国会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传统基金会尤其善于通过国会来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现任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曾说，“我们的角色是影响华府政策圈……最首要的目标受众是国会，其次是总统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注]美国智库十分重视与国会保持长期的接触和联系。传统基金会在内部设立了众议院和参议院联络办公室，通过与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智库能够及时了解议员们的政策需求与关切点，随时跟踪参众两院的最新议题，从而确保在最佳时机向政策制定者推送制定关键政策所需的研究成果。

美国智库还经常邀请国会议员参加智库的研讨会。胡佛研究所从1980年开始就在帕洛奥多举办华盛顿研讨会（Washington Seminars），邀请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参众两院各委员会成员参加。该研究所认为，“这些会议和研讨会对于持续进行的胡佛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有效地研究及执行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策与计划同样功不可没”。[注]

听证会是美国国会行使立法权的重要一步。由提案到法律，一般需要几个步骤，首先，提案需要经过听证，经两院通过后形成“法案”，然后交给总统，如果总统通过或者虽否决了但经过两院2/3的议员重新通过，那么，“法案”就可以正式成为法律了。尽管从提案到法律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听证却是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自然也成为智库影响政策的重要渠道。

美国智库的专家们尤其是知名专家可以得到在国会作证的机会，比如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在国会作证32次，为国会立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著名学者李侃如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符合美国利益，中国人为举办奥运会而感到自豪，如果美国政府试

图利用奥运会在政治上得分几乎注定将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不满。李侃如的这次发言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注]

为国会立法起草法案是智库最直接的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手段。当然，只有很少的智库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诺曼·奥斯坦（Norman Orstein）曾经领导一个团队，起草了美国《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

· 影响政府

“某种程度上，政府运转基于备忘录。如果国务院官员、国防部官员或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拿着你的研究报告，在他写备忘录给国务卿、国防部长或总统本人时，就会用你的主张、分析报告，你就有了影响力。如果你的报告不能放在他的面前，或者更糟的是，你不知道谁是负责的官员，那么你就没有影响力。”[注]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决策更依赖于外部咨询，这被称为“美国现象”[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就出台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对咨询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成立宗旨、工作原则、工作程序、咨询委员会与总统和国会以及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的关系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注]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和完成的各个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决策在出台前，要有两份以上翔实的咨询报告。

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为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及有利条件。智库可以在为政府决策做咨询论证时融入自己的观点，向政府表明本机构对此类问题的看法，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作用方式。[注]

中国智库政策影响机制

“中国的智库呈现出一个竞争的多圈层结构。政党和国家机构设立的智库因对政治制度嵌入性强，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决策者，或者说这些智库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更可能获得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个圈层之外依次是社科院系统、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与权力中心的‘政治距离’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距离远的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就不能产生影响力……民间智库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它们的社会距离很短，甚至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民间智库可以获取更为准确的社会信息，提供更加科学的政策分析。”

中西之间政治体制有别，决策过程存在诸多差异，这也决定了中国各类智库拥有独特的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方式。综合来看，在我国，智库主要通过内参系统、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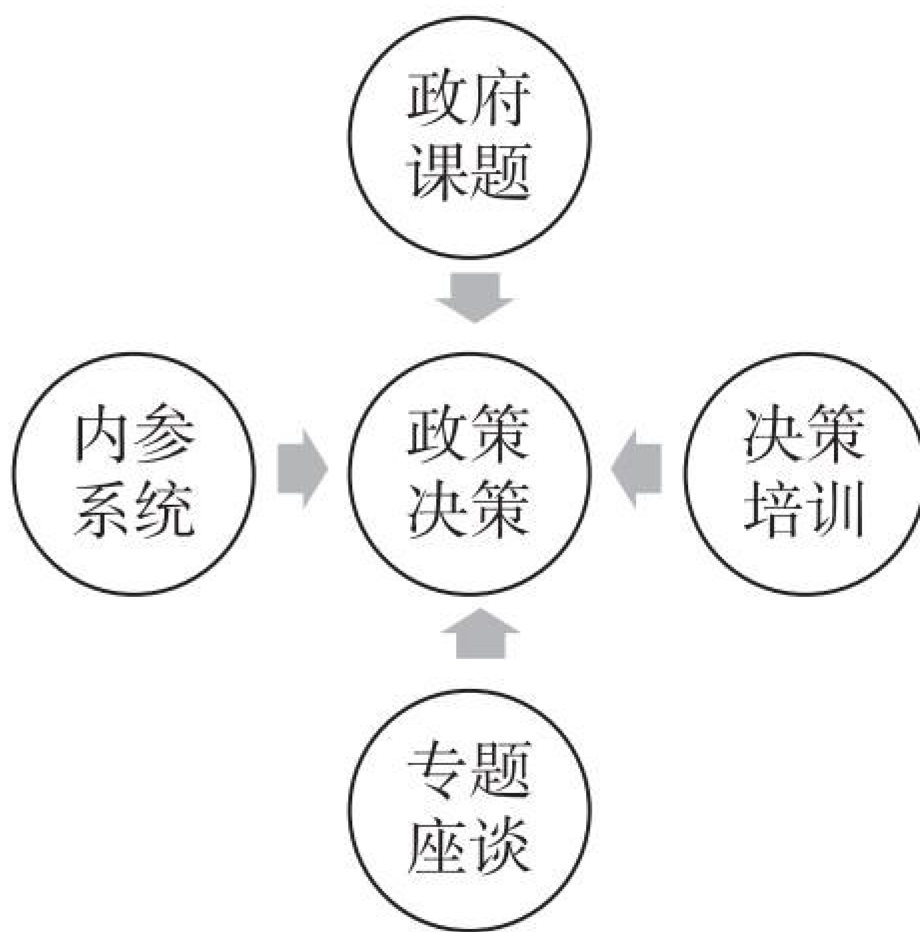


图8.2 中国智库影响政策决策渠道

·内参系统

内参系统是中国决策制度里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影响决策的方式。该系统既保证了特定层级的党政领导人了解到部分有效的实际决策信息，也通过批示促进了部门与官僚之间的协调。(注)中国的智库尤其是体制内智库可以依靠内参报送系统向决策者输送研究观点，创设内部议程。其影响常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中国智库影响政策决策的一种重要模式。

198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王建通过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的报告，提出在沿海地

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等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年，中央政治局便确定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也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的口号……

很多智库都有自己的内参刊物，除了比较有名的新华社内参外，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也相当有分量，“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每期只印两百多份，直接报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办、国办等单位”。[注]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的《侨情专报》通过积极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建言献策，也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CCG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论坛等汇集的专家观点等集结成《建言献策参考》，定期提交给中央有关部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并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比如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就对笔者关于解决“海归”社保问题的建言给予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就笔者关于中关村国际人才吸引的建议做出批示等。

· 政府课题

政府将特定的政策问题形成课题项目，以定向委托或竞标的方式要求智库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社会智库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公开竞标课题，介入政策过程，发挥政策影响力。

以“千人计划”为例，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高层次的海外引才计划，2008年启动至今，为国家引进了五千余名[注]海外高层次人才，这些人才分布于科研、产业创新、教育等各大领域，增强了我国在各行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成为我国赢得人才战争的重要抓手。据不完全统计，回国（来华）后，“千人计划”专家们已经发表了超过4000篇（部）论文及专著，其中在《科学》（*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

表了50余篇论文，承担了2886项国家及地方的重大科研项目。《科学》评出的“2012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中，有三项背后活跃着“千人计划”专家的影子，其中高居榜首的，赵政国与杨海军参与的ATLAS组实验，成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现“上帝粒子”的直接推手。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启动地方引才计划，如北京的“海聚工程”、天津的“千人计划”、江苏的“双创引才计划”……各种引才计划一起带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高端人才“归国潮”。

笔者作为参与推动者与亲历者，见证了“千人计划”的出台始末。

2008年初，中央统战部计划召开留学人员座谈会，作为会议组织者，我们邀请了钱颖一等专家学者，就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进行了座谈。会后，中央统战部将会谈纪要整理后报送中央。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对座谈情况非常重视，并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研究，制定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为中国的引智工作开辟出新局面。同年4月25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在会上，中组部启动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编制工作，笔者被聘为“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负责“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这一重要课题。几个月后，笔者带领的CCG研究团队提交了由一个主报告和七个子报告组成的十几万字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报告》。CCG的研究为中央人才规划纲要的编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得到了中组部的好评，并成为我国政府出台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的决策参考。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建议加快对国际人才的“抄底”，这成为“千人计划”在2008年底提前出台的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千人计划”的推进，CCG多次针对计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建言献策。2009年，我们向中组部提交了《完善千人计划的建言献策报告》，提出多项“千人计划”具体实施建议；2013年12月7日，由笔者担

任主任的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CCG一起举办了“千人计划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长施一公等国内外学术科研领域的13位顶尖专家参加了座谈，围绕“完善千人计划工作和建立退出机制”的议题，大家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曾多次组织“千人计划”建言献策座谈会。每次座谈会过后，都会有一份非常有分量的建言献策呈递给政府部门。CCG还曾多次在建言献策座谈会上提出扩大“千人计划”的范围，进一步推动了外专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的出台。

美国著名的政策科学家约翰·W. 金登（John W. Kingdon）[注]在其著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影响决策的各种力量汇合成政治、政策与问题三股源流，平时各自向前推进，各种议题在其中浮沉不定，未必能形成政策，此即所谓“政策原生汤”（Policy Primeval Soup）；当宏观形势出现变化后，上述三股源流得以汇合，使特定议题进入决策流程，形成明晰的政策，金登将此变化称为“决策窗口”（Policy Window）。他认为两种情形会导致“决策窗口”的打开：即政治力量的内部结构出现重大调整，或突发重大事件导致外部形势急剧动荡。[注]智库需要认真研究政策的形成过程[注]，根据政策形成不同阶段的特点，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决策窗口”期，不失时机地向政府推送政策观点，从而充分发挥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其实，政府咨询需求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除了常态化的政策需求外，重大改革方案和规划出台的前夕，都可被看作咨询服务需求的“旺盛期”（见图8.3）。



图8.3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专题座谈

智库可以通过参与决策者的重要会议来影响决策。一些政府决策机构在决策前，经常会召集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专家观点被决策者采纳，自然会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途径。不过，目前我国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

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意见》明确指出，“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这无疑为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打开了一扇门，如果未来能够从法律上为决策咨询提供制度保障，相信智库将在国家政策决策的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决策培训

决策培训发端于美国商学院，起初以高层商业管理人才为主要培训目标。近年来，决策培训的目标逐渐扩展到政府官员等决策层。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等都有对国务院官员的培训项目，大西洋理事会设有对国防部高级军官的培训项目。布鲁金斯学会则已形成一套服务全面、分层合理的特色决策培训模式(注)（见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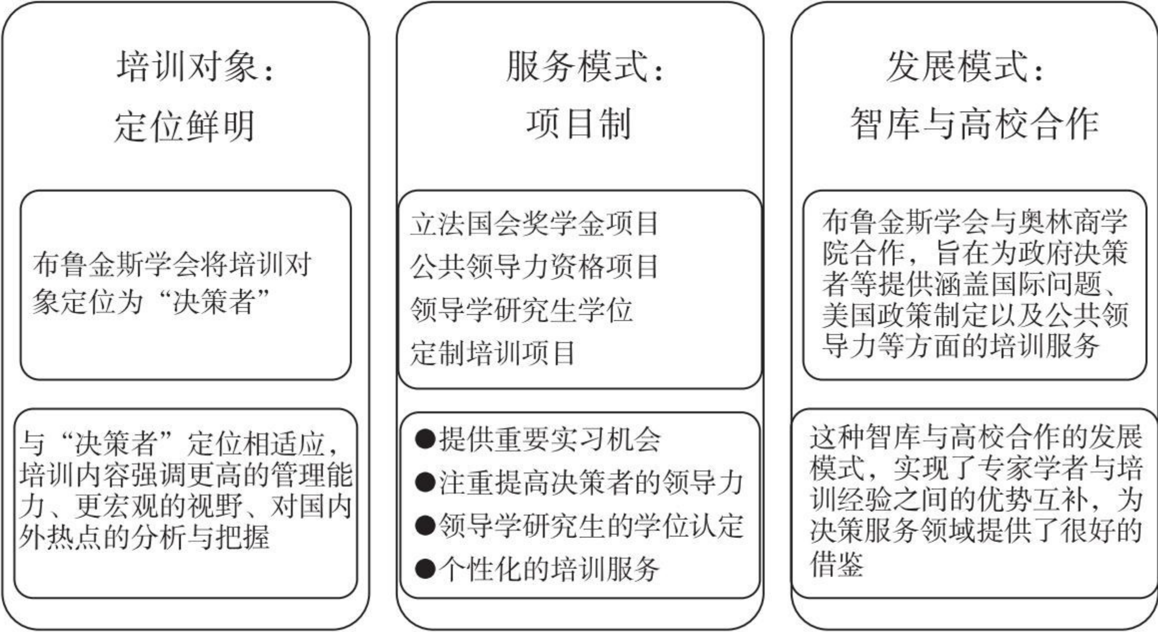


图8.4 布鲁金斯学会的决策培训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视培训服务为决策服务的重要方式。学会在决策培训服务方面的各种做法很可能引领美国智库培训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我国形成规范、系统的决策培训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与经验。

在中国，一部分重要的专家学者也有机会给决策者讲课，就一些重要现实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2009年8月，笔者应中组部的邀请，为中组部机关近300位干部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的讲座。2015年6月，人社部在河北秦皇岛举办“全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能力建设培训班”。笔者受邀做了“国际人才最新发展的趋势、挑战与对策”的有关培训。CCG还多次受邀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央党校等地授课。除了国家部委层面的决策培训，CCG还应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

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内蒙古、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邀请，为当地政府官员进行培训。

为政府官员讲座，实质上是将智库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的另一种途径，虽然这种途径不能直接产生政策影响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失为一条“曲线报国”之路。

---

1. Andrew D.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 郑永年等.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3. 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 Mandate for Leadership:Bluepr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Administration.
5. 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司法部部长。
6. 卡特.为什么不能出类拔萃？（Why Not the Best?）.
7.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9. 引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智库及其对华倾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11. Th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Sixth Edition, NJ, Prentice Hall, 1987.
12. 杨诚虎，李文才.发达国家决策咨询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13. 王颖.浅析美国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J］.人民论坛，2013(13).
14. 郑永年.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15. 安库雷.中央党校教授：为决策者提供参考[J].南方人物周刊，2008(19).
16. 截至2015年底，“千人计划”已分11批引进520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17. 美国著名的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师从美国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大师级学者艾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著有《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

政策》《国会议员的投票决策》（*第3版，1989*）和《异常的美国》（*1999*）等多部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18. John W. Kingdon.Agenda,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New York: Longman, 2007：168-169.

19. 这里的政策过程是指从政策问题提上议程、形成政策选择、做出政策决定、实施政策内容、评估和反馈政策效果、政策修正等一系列政策循环周期的总和。薛澜，陈玲.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西方学者的视角及其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05.

20. 李婧.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决策服务的新视角[J].科教文汇，2013.

结语
中国需要智库，更需要智库市场的百花齐放

中国智库诞生至今已60余载，然其被国际知晓还是近些年的事情。2009年，笔者将之称为中国智库走向世界的“元年”。2009年7月，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球的数百家顶级智库齐聚一堂，共话如何走出危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之策。正是这次峰会的召开，使中国智库在全球的知名度大增，如果仔细翻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8年以来的全球智库报告，就会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点，根据该研究报告统计，2008年中国智库数量为74家，2009年陡然增加到400多家。实际上，由于中外统计口径的差异[注]，本土智库的数量远不止400多家。科技部曾于2011年组织过“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注]统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共有各类型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注]。

从数量上看，我国堪称世界智库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发展总体呈现“量足质缺”的状态，智库的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政策影响力等方面与国际智库尚存在差距，难以满足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智库发展的迫切需要。从结构上看，官方、半官方智库占比达到90%以上，民间智库仅占5%左右，这与世界上其他智库发达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中国的民间智库很难有所发展呢？“因为民间智库拿不到有关部门的数据，所以智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信息开放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李曙光院长可谓一语中的。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政策研究的前瞻性，然而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民间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

于是政府信息“下达”民间智库的渠道就这样被堵塞了。更关键的是，民间智库缺乏将研究成果“上传”到政府决策层的渠道。尤其是在各级党委政府大多建立了全面覆盖的政策研究室、信息工作部门、各种研究中心的局面下，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自身就产生了海量的信息和政策建议，民间智库本来就不响亮的声音变得更加微弱。“上传下达”渠道不畅的同时，民间智库还普遍面临着“人才难题”，并且缺乏支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民间智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发展智库也成为各国的重要选择。其实，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用“短短”的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它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做政府不便做或者难以做的事情”[注]，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对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智库还可以发挥“第九大民主党”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作为公共政策有效供给的一个重要途径，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情况，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注]。

中国需要智库，更需要智库市场的百花齐放。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即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独立的社会智库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与政策思想往往能够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可以起到官方、半官方智库难以发挥的作用，增加了决策的可选择性与科学性。更重要的是，民营智库恰似思想市场的一群鲇鱼，是搞活思想市场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进可持续的国家繁荣。如果国家能够为各种类型的智库创造同台竞争的机会，无疑将会大大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勾画出了路线图，设定好了时间表。《意见》从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等多个层面为引导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一个国家为智库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各类智库创造了同台竞技的平等机会时，智库才能真正发挥出“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虽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兰德与布鲁金斯，然而，我们分明已经听到中国智库春天的脚步声，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思想市场定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

1. 外因上，海外研究者统计中国智库的渠道相对有限；内因上，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不高，两方面原因造成中外统计口径上出现差异。

2. 在“智库”概念引入中国之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机构为“软科学研究机构”。

3. 考虑到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概念比智库要相对宽泛一些，据业内专家估计，中国智库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2000家左右。

4.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在“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附录1
2015年全球智库排名

2016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了最新的《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其中，CCG上榜的表单数量达到5个，分别为全球最佳民营智库排名50强、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75强、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

榜单一：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75强[注]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2. Chatham House (United Kingdom)

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United States)

4.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United States)

5. Bruegel (Belgium)

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United States)

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United Kingdom)

8. RAND Corporation (United States)

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United States)

10. Amnesty International (AI) (United Kingdom)

11. Cato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12. Heritage Foundation (United States)

13. Fundacao Getulio Vargas (FGV) (Brazil)

14.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Germany)

15.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IIA) (Japan)

16.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France)

17. Fraser Institute (Canada)

18.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Germany)

19.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 (United States)

20.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United States)

21.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Belgium)

2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Sweden)

2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United Kingdom)

24. Carnegie Moscow Center (Russia)

25.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KAS) (Germany)

26.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FES) (Germany)

27.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Belgium)

28.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United States)

29.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 (Japan)

30.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United Kingdom)

3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ina)

32.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 (Russia)

33.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Republic of Korea)

34.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Lebanon)

35.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China)

36. Consej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ARI) (Argentina)

37.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Denmark)

38.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Canada)

39.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China)

40.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 (Germany)

41.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 (Germany)

42.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WMCES), FKA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Belgium)

43. IDEAS (United Kingdom)

44.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IIA) (Australia)

45.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 (United Kingdom)

46.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therlands)

47. Human Rights Watch (HRW) (United Kingdom)

48.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 (Republic of Korea)

49. 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CPSS) (Egypt)

50.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China)

51.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EA) (United Kingdom)

52. Libertad y Desarrollo (LyD) (Chile)

53.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Switzerland)

54.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

55. Food,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Analysis Network (FANRPAN)(South Africa)

56.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PI) (Norway)

57. Bon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version (BICC) (Germany)

58.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DOB) (Spain)

59.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United Kingdom)

60. Razumkov Centre (Ukraine)

61.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Norway)

62. East Asia Institute (EAI) (Republic of Korea)

63. African Centre for the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CCORD) (South Africa)

64.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IISS), FK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and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65.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AERC) (Kenya)

66.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M) (Poland)

67.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ASE) (Poland)

68.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FANS) (Republic of Korea)

69. Demos (United Kingdom)

70.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Indonesia)

71.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CER) (United Kingdom)

72.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China)

73.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ISS) (France)

74. 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 (TESEV) (Turkey)

75.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 (Belgium)

76.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SPI) (Italy)

77.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FANS) (Republic of Korea)

78. Urban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79.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CCS) (India)

80.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E) (Germany)

81.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IA) (Singapore)

82.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IA) (South Africa)

83.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IDSS) (Singapore)

84. Fundacion para el Ahalisis y los Estudios Sociales (FAES) (Spain)

85. Centr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CCR) (South Africa)

86.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87. Heinrich Boll Foundation (HBS) (Germany)

88. Association for Liberal Thinking (ALT) (Turkey)

89.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United Kingdom)

90. Real Instituto Elcano (Spain)

91. Timbro (Sweden)

92. Centro de Estudios Publicos (CEP) (Chile)

93.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Singapore)

94. Civita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United Kingdom)

95. Centro de Divulgación del Conocimiento Económico para la Libertad (CEDICE Libertad) (Venezuela)

96. Atlantic Council (United States)

97.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IAI) (Italy)

98.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CPS) (United Kingdom)

99.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CPPS) (Malaysia)

100.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FLACSO) (Costa Rica)

101. African Technology Policy Studies Network (ATPS) (Kenya)

102.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IDS) (Bangladesh)

103. Uniru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China)

104.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 (India)

105.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CIS) (Australia)

106. Hudson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107.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 (CFE) (Republic of Korea)

108.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Israel)

109.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India)

110.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China)

111.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TERI) (India)

112. Fundacion para la Educacion Superior y el Desarrollo (Fedesarrollo) (Colombia)

113. IMANI Center for Policy and Education (Ghana)

114.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 (CPS) (Hungary)

115.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 (South Africa)

116.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IIPS) (Japan)

117. EGMONT – The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gium)

118.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India)

119.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Belgium)

120.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 (Germany)

121. Fundacao Armando Alvares Penteado (FAAP) (Brazil)

122. Free Market Foundation (FMF) (South Africa)

123.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GIMO) (Russia)

124.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Senegal)

125. Lithuanian Free Market Institute (LFMI) (Lithuania)

126. Cambodia Development Resource Institute (CDRI) (Cambodia)

127. Istituto Bruno Leoni (IBL) (Italy)

128.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SAM) (Azerbaijan)

129. Instituto Ecuatoriano de Economia Politica (IEEP) (Ecuador)

130.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India)

131. Gulf Research Center (GRC) (Saudi Arabia)

132.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DRI) (France)

133. Regional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CSS) (Sri Lanka)

134. Centro de Divulgacion Conocimiento Economico para la Libertad (CEDICE)(Venezuela)

135. Adam Smith Institute (United Kingdom)

136.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DA) (India)

137. Mercatus Center (United States)

138. Centro Euro-Mediterraneosui Cambiamenti Climatici (CMCC) (Italy)

139. Centro de Estudio de la Realidad Economica y Social (CERES) (Uruguay)

140.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ESD) (Azerbaijan)

141.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 (United States)

142.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S) (Japan)

143.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KIPPRA) (Kenya)

144.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EPRC) (Uganda)

14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United States)

146. Ifo Institute-Leibniz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Germany)

147. Institucion Futuro (Spain)

148.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OSSREA)(Ethiopia)

149.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ELIAMEP) (Greece)

150.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DCY) (China)

151.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FEEM) (Italy)

152.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IIA) (Finland)

153.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United States)

154.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 (United States)

155. Ac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berty (United States)

156.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 (FNF) (Germany)

157.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 (United States)

158.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 (Japan)

159.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omicas Nacionales (CIEN) (Guatemala)

160.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161. Israel-Palestine: Creative Regional Initiatives (IPCRI), FKA Israel-Palestin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srael/Palestine)

162. 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 (Denmark)

163.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srael/Palestine)

164. Centro Studi Internazionali (Ce.S.I.) (Italy)

165.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SSER) (Ghana)

166. Caucasus Institute for Pea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IPDD) (Georgia)

167.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CLAWS) (India)

168. Centre for Geopolitical Studies (GEOPOLITIKA) (Lithuania)

169. Delhi Policy Group (India)

170.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ISS) (France)

171. Hoover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172.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CPR) (India)

173. Ethiopi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EDRI) (Ethiopia)

174. Fundar, Centro de Analisis e Investigacion (Mexico)

175. FundacionLibertad (Argentina)

榜单二：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4.中国社会科学院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6.清华大学卡内基中国中心

7.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8.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

9.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10.天则经济研究所

11.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12.财团法人国策研究院（台湾）

1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14.上海社会科学院

15.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16.思汇政策研究所（香港）

17.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8.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19.中国金融40人论坛

20.察哈尔学会

21.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22.中共中央党校

23.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24.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

2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6.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

27.香港经济研究中心（香港）

28.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29.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30.综合开发研究院

31.亚非发展研究所

3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33.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34.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35.经济与技术研究院

1. 该榜单为2016年1月29日发布。

附录2
世界知名智库一览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其创立者是来自圣路易斯市的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S. Brookings）(注)。拥有悠久历史的布鲁金斯学会，堪称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布鲁金斯学会曾经为美国制订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国会预算办公室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和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实出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曾与布鲁金斯学会有过“亲密接触”，寻找了多位外交与经济幕僚，当选总统后，又邀请了多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加入奥巴马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Susan Rice）、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贝德（Jeff Bader）就在其中。卸任官员到学会任职的也很多，比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卸任后就加入了布鲁金斯学会，成为研究所总裁。

2002年起，布鲁金斯学会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先后建立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英格堡医疗保健改革中心（Engelberg Center for Health Care Reform）、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等国际化分支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在吸引学者方面堪称一流，学会把学者从“象牙塔引入政治世界”，依靠他们发掘新课题并制订研究计划。学会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公开发表的，每年出四期的《布鲁金斯公报》，汇集了颇有分量的专题文章与研究报告，同时，还出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布鲁金斯学会确定了四大研究领域，包括能源与气候、创新型发展、全球演变管理、机会和福利。学会认为，这些领域是目前当政者最为关心的。

智库链接：http://www.brookings.edu/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10年11月25日是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75岁的生日，这一天，这位尽人皆知的钢铁大王宣布了人生最大的单笔捐助——捐出1000万美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和推广国际事务公众教育的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基金会第一届董事会就囊括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著名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等28位重量级人物。卡内基对董事们的要求是运用这笔基金“促进消灭国际战争这一我们文明最肮脏的污点”。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议题主要为国际事务与美国外交政策。基金会的研究成果众多且影响深远，22卷的《国际法经典著作》、150卷的《世界大战经济与社会史》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权威学术成果。基金会曾经发行的《外交政策》杂志(注)，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读者遍布150多个国家，以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在世界广泛传播。

200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了新愿景，目标是成为第一个全球性智库。目前，基金会在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都设有地区性中心。

智库链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冷战智库”之称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起初是乔治城大学的一部分，由前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乔治城大学的牧师詹姆斯·霍里根以及保守派学者戴维·阿布希尔共同创建于1962年，后于1987年独立出来。

自成立以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直走在探寻解决棘手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最前沿。1978年，中心在美国国会山召开了第一次关于柬埔寨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听证会，美国国会由此对这个悲剧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2006年，中心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巧实力”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政府应制定软硬实力结合得更全面的大战略，以此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这一观念被奥巴马政府采纳。2012年，在美国国防部的委托下，CSIS出具了一份针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地区军事政策的研究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CSIS出品的知名学术期刊包括《外交政策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内容分别为年轻的专业人士对外交政策的观点、世界热点问题等。CSIS出品的研究报告中，《世界各国实力评估》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本。近几年中心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因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Aging*）、《阿富汗的教训》（*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War Fighting*， *Intelligence and Force*

Transformation）、《美俄关系》（*U.S.-Russia Relations:Form Idealism to Realism*）等。

近年来，CSIS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智库之一，“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主张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认为美国应在亚太扮演积极角色”等是其近几年主要的主张。

智库链接：http://csis.org/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著名智库，曾被《新闻周刊》称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

成立伊始，外交关系协会就表现非凡，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凯洛格公约，30~90年代，先后提出了“要求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展的主张”“建立联合国，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遏制苏联的政策，参与制订马歇尔计划”“对美苏关系重新定位并参与设计星球大战计划、和平演变计划等”“利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东欧和中国产生影响，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是外交关系协会出版的著名杂志，自1922年创刊以来，该杂志逐渐成为美国重大国际事务的权威观点发源地。

智库链接：http://www.cfr.org/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美国空军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署了一份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计划合同，缩写为RAND，即兰德计划。1946年，兰德提交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份报告《试验性环球飞船的初步设计》。1948年，兰德从道格拉斯公司脱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通过促进科学、教育和慈善的发展，维护美国的公共福利和国家安全”。

与美国其他智库相比，兰德公司属于规模庞大、研究种类齐全的一家智库。兰德拥有员工1600多名，其中研究人员将近1000名，来自4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兰德的核心研究领域包括：民事司法、教育、能源环境、人口与老龄化、儿童政策、国际政策、国家安全、科学技术、交通与基础设施、艺术、公众安全、药物滥用研究等。

兰德与美国军方机构、政府部门都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这些部门包括空军、农业部、教育部、国土安全局、能源部、司法部、外交部、国家情报总局、财政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兰德与政府之间并不局限于一般的课题合作，兰德还经常为政府培养和输送一些技术人才，而军方和政府也经常为兰德提供一些内部消息。

兰德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著称于世，其在宇宙飞船、系统分析法、计算机和互联网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宇宙飞船。20世纪40年代，火箭科学还在初级研究阶段，第一颗人造卫星尚未诞生，就在此时，兰德的《试验绕地飞船的初步构想》横空出世，并前瞻性地提出了绕地空间站的革命性构想。

系统分析法是兰德最早提出并加以运用的，后逐渐变成兰德所有研究活动的核心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国防部将这套方法运用于整个军事领域，并随之在各政府部门推广，形成了著名的“计划—规划—预算系统”（PPBS），之后又在民间得到推广和应用。

计算机。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会发现一台名为“JOHNNIAC”的计算机，它的发明者正是兰德数学研究部的几位员工。这台计算机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系统分析法所需要的复杂的数学计算，可见，对兰德人来说，对分析工具实体的发明与分析工作是并行且相互促进的。

互联网。1955年，一位名叫保罗·贝恩的青年工程师从休斯航空公司跳槽到了兰德，为了研制出一套军事命令与控制系统，他将信息分散，然后使用标准化的数据模块分节点传输，这样的数字空间简直超出了当时世界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这可以看作互联网数字科技的灵感起源。

智库链接：http://www.rand.org/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卡托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创始人包括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爱德华·克里恩（Edward Crane）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卡托”一词，则源于论文集《卡托的信函》（*Cato's Letters*），信函中的“卡托”指的是一位罗马时期捍卫共和国制度的政治家。

卡托研究所是一家奉行自由主义主张的智库，其研究理念深受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及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卡托研究所经常针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发表评论，比如批评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过度的政府开支、移民政策等议题上的政策。这些评论使卡托“自由、独立”的名声在外。以至于一位美国记者乔治·威尔如是说，“给美国人自由，美国人将会开花；给卡托（自由），美国人民将确保自由”。

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非常强大。其研究员大多毕业于哈佛、耶鲁、牛津、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具备世界500强企业、知名非政府组

织、政府部门工作经验，比如，高级研究员道格·班窦，曾经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特别助理，还担任过美国知名政治杂志《探寻》的编辑，经常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是ABC、CBS、NBC、CNN等美国知名媒体的权威评论员。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迈克尔是世界著名环境问题专家，曾经担任全美气候学家学会主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报告的撰稿人之一，该小组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卡托研究所在中国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比如卡托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所长、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就关注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前景》《中国新千年：市场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国的未来：建设性的伙伴还是新兴的威胁》等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专著。

智库链接：http://www.cato.org/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由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创建于1973年，约瑟夫·库尔斯是科罗拉多州大啤酒制造商阿道夫·库尔斯公司总经理，也是里根“厨房内阁”的重要成员。保罗·韦里奇是右翼政客，他担任了传统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

1977年，传统基金会发起著名的保守主义运动，传统基金会也逐步发展成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智库。《纽约时报》称之为保守主义之中的“帕台农神殿”。传统基金会有1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任过职，对里根政府的政策产生过深刻影响。基金会的3位学者进入布什政府任职，其中，亚洲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叶望辉出任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亚太政策顾问；资深研究人员尼娜·里斯出任副总统助理。

传统基金会主要关注短期和即时的公共政策议题，不过仍然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原著和政策理论依然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从1995年开始，与《华尔街日报》联合编制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共考察了包括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政府财政负担、资本流动、外国投资、工资和物价、银行与金融状况等在内的10个指标，该指数在业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专家都将其看作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政府和企业也对其“爱不释手”，比如美国曾在2001年停止对阿根廷的贷款援助，其主要依据就是传统基金会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将阿根廷列为经济体制最不自由的国家。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为了解在世界版图上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传统基金会设立了凯瑟琳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际研究院，研究院下设亚洲研究中心、华盛顿亚太圆桌新闻社等部门。对于曾经提出过“中国威胁论”的传统基金会来说，也开始举办研讨会强调美中合作。注

智库链接：http://www.heritage.org/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进步中心成立于2003年，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影响深远。美国《时代》周刊曾于2008年发文如此评价美国进步中心：“在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与其媲美。”

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该智库的很多成员被吸收到竞选班子中。克林顿当选后，该智库又被公认为克林顿的私人智囊，其中，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D. Podesta）被委任为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

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进步中心帮助奥巴马团队调整竞选策略，为其后期竞选提供了重要支持，因此深得奥巴马赏识。奥巴马当选后，进步中心多位成员受到政府重用，进步中心的主任波德斯塔被任命为奥巴马过渡事务主管，执行副总裁巴恩斯被任命为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

2012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美国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法案采纳了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的《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中的很多建议。

美国进步中心非常重视中国研究，主席波德斯塔多次率团访问中国，曾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接见。进步中心还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等机构合作，连续几年在北京举办“中美对话论坛”。

智库链接：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全称为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前身为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正式成立于1943年。

AEI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该研究所与美国共和党有较深的渊源，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因此又被称为“保守的布鲁金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大量政府要员纷纷加入AEI，极大地增强了研究所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2011年11月，研究所与共和党联合举办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AEI的社会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AEI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研究一直是AEI研究的重点，其主要观点是推行自由经济理念，主张市场竞争。外交与国防领域，1970年研究所出版了外援理论的小册子，2001年开设了“亨利·温特国际发展讲座”，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做国际问题方面的讲座。其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健康卫生、公共舆论与政治、能源与环境、社会与文化研究等。

智库链接：http://www.aei.org/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创办人为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与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Peterson），其中，伯格斯滕曾于1977~1981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主要负责国际事务，被美国媒体誉为“最能影响市场”的全美50名经济学家之一；彼得森曾出任过美国商务部部长、雷曼兄弟董事长以及黑石集团董事会主席等职务。

虽然相比美国其他主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机构规模不大，研究人员数量也较少，研究领域比较狭窄，不过，其影响力不可小觑，知名度也很高。金融危机后，“购买美国货”的声浪在美国本土此起彼伏，新经济刺激计划中被要求加入相应保护主义的条款，然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势必进一步恶化本已不堪重负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势。在巨大压力下，奥巴马政府要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48小时内拿出一份关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评估报告。这家智库不负重托，在翔实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成为奥巴马政府敦促国会停止施压的有力武器。

PIIE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注]“G2（中美国）”等概念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受到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

克、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众多重量级人物的追捧。

PIIE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政策，注重热点跟踪研究是该智库的重要特点。目前的研究重点涉及全球经济危机，尤其关注遭受严重冲击的欧洲市场，信贷与经济复苏，全球失衡与汇率之争，全球化及其政治争议，双边、多边、地区贸易谈判等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PIIE加大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力度。2006年，PIIE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联合出版的《中国：决算表》一书对中国崛起与美国对策进行了探讨，曾引起轰动。近年来研究所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PIIE与国内智库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2015年，PIIE已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举办了四次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

智库链接：http://www.iie.com/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属于美国智库中的“年轻一员”。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为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A. Flournoy），均曾被奥巴马纳入麾下。库尔特·坎贝尔于2009~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米歇尔·弗卢努瓦于2009~2011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制定。

CNAS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以及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等重量级人物。

CNAS的政策研究以国家安全为重点，内容涉及地区政策、防务政策、跨国犯罪、战略资源、反恐战争、气候变化等方面。

CNAS对奥巴马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影响非常大。早在民主党内部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时期，CNAS就成为奥巴马所依赖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智囊。CNAS对亚洲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更将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升到关系美国在全球战略地位的高度，其关于美国应对亚洲权力结构变迁的策略、巩固亚洲同盟关系等都被转化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实践。

智库链接：http://www.cnas.org/

尼克松自由与和平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尼克松自由与和平中心，由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创办于1994年。中心秉持尼克松主义的思想理念，主张接触主义，遵循“反对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世界”的外交思维。现任尼克松中心主任的迪米特里·赛姆斯（Dimitri K. Simes）是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

中心研究方向集中在对外关系领域，主要反映了六大项目课题：能源安全与环境变化、外交策略研究、移民与国家安全研究、美俄关系、中国研究、区域性策略。中心定期出版的外交刊物《国家利益》季刊，具有较强的专业影响力和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智库链接：http://cftni.org/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

卡特中心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与夫人罗莎琳·卡特创办于1982年，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的宗旨是：“致力于促

进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饥饿和疾病”。

卡特中心宣扬和平主义思想，倡导慈善、民主事业，促进和平、人权和公共健康，卡特因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卡特总统以及中心专家的不断推动下，卡特中心在民间外交与人道主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2002年，卡特中心成立中国项目，专门对中国的社会公平、公民教育等问题进行研究，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一位华裔政治学学者，也是CCG专家委员会的专家。

智库链接：http://www.cartercenter.org/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是为纪念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由国会特许建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其研究宗旨是通过独立的研究和开放性的对话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在威尔逊中心，来自全球的专家及学者展开课题研究。秉承着威尔逊总统的精神，该中心建立起连接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的桥梁，去应对来自国家层面的问题和挑战。威尔逊中心从地区和课题两个方向下设研究项目，其中地区类的项目包括非洲项目、亚洲项目、中东项目、巴西研究所、加拿大研究所等；课题项目涵盖环境变化与安全、历史与公共政策、科学与技术创新项目等。威尔逊中心拥有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理事会，成员包括美国国务卿、教育部长、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等。

智库链接：https://www.wilsoncenter.org/

艾斯本人文中心（The Aspen Institute）

艾斯本人文中心创建于1950年，是美国一个国际化的非营利性智库，致力于建立启蒙性的领导力和开放思想的对话，通过研讨会、政策项目、会议等来提供无党派性的具有前瞻性价值的调查和研究。艾斯本人文中心的国际合作伙伴和分支机构遍及柏林、罗马、东京等地，并且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在非洲、中美洲和印度均有领导力项目，此外，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前主任、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主持“全球社群中的华人”研讨会，其相关成果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艾斯本印度中心从新兴市场国家角度出发，希望和Smadja & Smadja国际会议机构共同打造一个关于“金砖五国”和其他新兴发展国家的论坛。

智库链接：http://www.aspeninstitute.de/

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 and West Center）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成立于1960年5月1日。它既是一个东西方知识分子的交流平台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中心，也是美国具有官方背景、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中心是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倡议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的有关法案而成立的，其宗旨是“通过合作研究、培训和探索，促进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了解”。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国会的拨款，还从2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私人机构、基金会、公司以及“东西方研究中心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获得资助。

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亚太地区的人口、国际经济与政治、能源与矿产资源、环境、通信及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尤其关注亚太事

务。中心的国际专家们与世界各国的专家们积极合作，就上述问题与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则通过学术专著、文章、电子数据服务系统以及新闻媒介广泛传播。中心每年出版的《亚太安全展望》成为美国政府界定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制定亚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参考。

2010年，在东西方中心成立50周年庆典上，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朱迪斯·麦克哈尔(Judith A. McHale)评价说，“东西方中心对于美国国务院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该中心的使命是推动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接触与合作，体现了美国在21世纪应该且必须奉行的道路。正是该中心的工作，预见和加速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促使美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注)

智库链接：http://www.eastwestcenter.org/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MPI）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是独立、无党派、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移民问题和美国移民政策的独立智库，总部设于华盛顿。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移民问题，主要针对国际移民趋势、美国移民构成、非法移民、移民执法、移民遣返、移民认证、移民权益、移民法规等进行研究与分析，对美国制定相应移民政策影响颇大。

MPI密切关注美国移民法案改革的最新动向，所长帕帕德·美特里欧（Papademetriou）先生认为，政府不是吸引人才的主要推动者，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人才的界定并不应该以高学历为衡量标准，而是应该具有积极的事业心和进取心，能够将

所学、所长应用到社会实践与建设当中去。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改革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使人才结构更好地适应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做到人尽其才。企业应在社会人才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智库链接：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亚洲协会由洛克菲勒家族创立于1956年，现已成长为美国最具权威的亚洲政策民间研究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教育研究性的世界领先的全球化智库。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目前在美国的休斯敦、洛杉矶、华盛顿特区，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度的孟买，韩国的首尔，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设有分支机构。

协会宗旨是促进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民间交流，增进亚太地区民众、领袖和机构之间的相互了解，致力于在政策、商业、教育、文化和艺术等领域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鼓励创造性地表达，并产生跨越政策、教育、商务、文化等领域的新思想。

作为美国与亚洲之间最主要的民间社团组织，亚洲协会也是美国与亚洲交往的最佳平台。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一些重要变动，都会在亚洲协会的活动中放出探测球。亚洲协会在亚太地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常年主办专注于研讨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智囊论坛——威廉斯堡会议。此外，协会还定期组织多样化的商业活动，如自1989年起每年在亚太区主要城市举办“亚洲企业年会”，现已成为最负盛名的国际性企业高峰论坛之一。

智库链接：http://asiasociety.org/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是美国东部传统“大西洋主义者”重要的民间政策研究和协调机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强调“大西洋团结”，其目标是“发展健康的跨大西洋关系，促进建立更强大的国际制度”。研究方向主要有：大西洋联盟未来将面临的问题及跨大西洋经济关系；中欧与东欧、俄罗斯融入欧洲一体化问题；促进美国国内在对俄、中、日、朝与中国台湾政策上达成共识；亚洲能源需求与环境保护等。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是华盛顿对华研究的主流智库之一，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发挥过重要作用。近年来对亚太与中国等方面的研究有所侧重，为此专门设立了“大西洋太平洋”“朝鲜转型”等项目。

智库链接：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CEP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欧盟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83年，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研究中心现有30多名专职研究人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中心的资金来源包括：欧盟的项目资金、来自企业和机构的会员费等。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涵盖经济政策、金融市场和机构、贸易发展与政策、政治与机制以及司法与内务等诸多方面。其中，经济政策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政策、人口老龄化、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问题；贸易领域，CEPS未来将集中在欧盟与韩国、印度、东盟等新兴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能源气候领域，主要致力于研究减缓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创造低碳经济等。司法与内务属于欧盟内一个极富活力的研究领域。CEPS的研究重点包括，外部边界控制体系的中长期影响、欧盟的移民与难民政策、警务与司法合作的机制等，其目标是帮助欧盟寻找公民自由权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智库链接：https://www.ceps.eu/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发起创立，是首个真正泛欧性的智库，其目标是："就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连贯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发展进行研究，并促进泛欧性的争论。"其组成和活动也具备明显的"泛欧"特征，由一百多位来自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的精英组成，包括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思想家和商人。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委员向委员会就政策观点提供建议和反馈。委员每年会晤一次。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都设有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形成了一个研究、讨论、建议和沟通的平台。此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开发进程与众不同。它从全欧洲招揽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实习生，以此来实现其泛欧洲的发展目标。

在成果推广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广泛运用新媒体，比如博客和播客。博客主要用于发布内部研究员的文章和简短的研究报告；播客则主要用于发布外部专家以及其他外交领域学者的各种观点。

委员会每年的欧洲外交政策评估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一年度报告系统地评估了欧洲28个国家在处理与其他66个国家外交关系时的表现。目前，委员会承担的在研项目包括：亚洲与中国（Asia & China）、中东与北非（MENA）、欧洲再造（Reinvention of Europe）、广阔的欧洲（Wider Europe）。这些项目都拥有独立的负责人和研究团队和办公地点，普遍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支持资金雄厚。

智库链接：http://www.ecfr.eu/

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

布鲁盖尔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旨在提升欧洲的经济政策决策水平，现已成为欧洲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智库。该研究所的会员既有来自奥地利、芬兰、比利时、爱尔兰、丹麦、英国的国家政府，也有来自微软、高盛、德意志银行、谷歌、三星电子等各行业的著名跨国公司。

成立短短10年，就取得了如此骄人的业绩：首先，得益于“地利”。布鲁塞尔是欧洲事务的中心，这为研究所获得一手资料、建立世界关系网以及获得媒体宣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其次，得益于“天时”与“人和”，研究所能够顺应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大势，比如其成员来自整个欧洲，而不仅限于欧盟国家，这也决定了其视野更加广阔，可以为人们提供分析欧洲事务的全球视角及分析全球事务的欧洲视角，加强了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欧洲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和所担负的全球责任的理解。

随着布鲁盖尔的迅速崛起，它在欧洲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特别是在涉及欧洲经济、欧盟机制、欧元区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开始享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前夕，布鲁盖尔研究所出版的政策报告《2010~2015年欧洲经济的优先议程：新委员会备忘录》，在第一时间成功地影响了欧盟新机制的决策。布鲁盖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Zsolt Darvas曾在2011年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和银行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撰文，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欧元区存在的十大根深蒂固的问题，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整个欧洲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智库链接：http://bruegel.org/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于1926年获得皇家特许证，办公地点设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广场，是英国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在世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作为世界知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为了使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讨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曾在1927年提出了著名的查塔姆准则（Chatham House Rule），大体就是如果一个会议，或者会议的一部分，按照查塔姆准则进行，则与会人员可以自由使用在会议中获得的信息，但任何与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所属单位信息不得被泄露。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衷是避免地区冲突与世界战争，因此在国际关系、区域发展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此外，研究所还抓住了时代发展新趋势，拓展了能源、环境和资源管理以及能源、环境和发展政策与食物供给的协同研究，以及国际经济研究领域，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对国际关系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每年出版六十余份报告、论文和书籍，其出版的研究类杂志主要有两类，其一是侧重于当前国际问题的《今日世界》，其二是偏向于国际问题回顾与综合的《国际事务》。这些杂志出版物及其他发表的论文、报告都是英国政策制定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为扩大全球影响力，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议，中国前外交部长杨洁篪、钱其琛都曾在会议上发表演讲。

智库链接：https://www.chathamhouse.org/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是法国历史上第一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旨在促进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在国际层面上针对当前的国际问题展开对话。研究所作为独立性机构，不依附任何政府部门，成员不包括政府供职人员，董事会负责研究所的日常营运。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有着强大的国际合作网络和国际影响力。研究所围绕国家关系的地区研究和新兴学科这两个大方向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其中地区研究下设德国、北美、亚洲、欧洲、中东地区等8个主要研究方向，新兴学科设立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经济项目、能源项目、空间项目、环境与健康研究项目、移民与公民研究项目6个方向。

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学术评估组织——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均由法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权威组成。委员会的任务是把握与指导研究所的科研方向，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单位的工作进行评估；对课题的立项、可行性及应用前景进行评估；对课题的结项进行鉴定。

研究所同样承担着杂志的发行和出版工作，由其出版发行的“*Ramsès*”和“*Politique Etrangère*”刊物都对政策研究者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其中“Ramsès”累计发行量已超过10000册，在国际社会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每年举行多次论坛和国际性会议，曾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阿富汗总统阿尔扎伊等20余位总统，针对当前的国际关系发表看法，以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合作。

智库链接：http://www.ifri.org/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与大多数致力于为决策层提供政策及信息咨询的研究型智库不同，成立于1995年的透明国际是以宣传和监督为导向的机构。透明国际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立，是一个由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以及商人志愿发展起来的监督贪污腐败的国际非营利性组织。虽然总部设在德国，但机构的服务对象却是面向全世界的，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

为了保证机构所做的调研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维持透明国际日常运营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捐赠，同时捐款的个人或机构不允许参与透明国际的政策决定。透明国际的宗旨是增加社会部门的工作透明度，促进工作的廉洁性（包括确定财产权、制定法律标准等），并防止腐败的发生。

作为一家智库型单位，透明国际不亲自参与反腐工作，但会和政府合作制定反腐政策，并在自己建立的网站发布反腐信息。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反腐败指数”以及出版的《透明国际通讯》等刊物已经成为全世界反腐研究的重要参考。透明国际发展至今，已经在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揭露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同时也在促进国际多边合作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智库链接：http://www.transparency.org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旨在纪念瑞典和平150周年，致力于研究国际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内容涉及军事武器的发展、军火交易和生产，以及裁军和非军事化等，通过独立的研究探求世界安全、冲突与和平，并提供政策分析与建议。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十分注重国际研究合作。它与不同国家的研究学者建立合作关系，定期邀请访问学者和实习生参与研究项目，同时与全球其他研究机构保持联系。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出版多种研究刊物，其中《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年鉴》是军控领域最有国际影响力和最具权威性的资料，被翻译成中文、俄文、阿拉伯文等语言。该研究所自成立以来，集中对军备和裁军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所有研究根据和来源完全开放，并一直与各国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其成果成为瑞典和国际政治界以及研究人员、新闻记者和学者经常使用的权威性资料来源。

智库链接：http://www.sipri.org/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Primakov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领导层渴望了解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诞生的，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隶属于苏联科学院体系。该研究所是由俄罗斯联邦政府组建的官方智库，有着强大的科研能力，主要工作方向是向俄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客观的解读和预测。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战略发展层面等，定期开展国际项目研讨会，并与国内外研究机构保持合作关系，为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提供对俄罗斯法律政策、世界市场等课题的研究报告。研究所在基础设施配置以及研究人员数量上均已达到俄罗斯一流水平。截至目前，研究所共设有20个研究分支机构，领头研究工作的学术委员会共有委员53人，研究人员两百余人。由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的各类期刊杂志，如《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俄罗斯与欧亚新兴国家》等均是俄罗斯知名期刊，在国际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俄中两国历史关系悠久并互为接壤邻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的研究机构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曾多次派出学者来华进行学术交流，旨在促进中俄双方的智库文化交流。

智库链接：http://www.imemo.ru/en

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

贝塔斯曼基金会成立于1977年，创始人为欧洲传媒巨头莱因哈德·莫恩，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教育、医疗卫生、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推动及发展，资金来源为其在贝塔斯曼集团的股份收益。近年来贝塔斯曼基金会针对德国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展开课题研究，对德国理疗保险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以预防为主减少就医的改革方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基金会同样关注德国学生在国际上的表现，通过分析比较德国学生与国际同龄学生的成绩水平，提出了儿童早期智力开发的方案，并在一些学校进行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贝塔斯曼基金会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在美国华盛顿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每年都会在美国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以扩大德国智库在北美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了贝塔斯曼基金会的重视。在2012年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中，贝塔斯曼基金会认为中国在扩大投资互惠互利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期待德中贸易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发生转型，给双方带来利益。

智库链接：https://www.bertelsmann-stiftung.de/en/home/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Ltd.)

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创始人为野村德七。研究所前身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调查部，是一家涉及咨询业务、金融领域IT解决方案、产业领域IT解决方案以及IT基础服务的综合性研究咨询公司。与传统智库的非营利性不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以民间思想库的形式存在的营利性与企业性质咨询机构，通过承接来自政府、企业及民间团体的课题研究，收取相应的费用。

野村综合研究所设有两个总部。位于东京的总部主要负责日本及其他国家经济、金融、股市等的研究；位于镰仓的总部主要负责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的课题研究，下设经济研究部、社会体制研究部等部门。为了掌握海外市场动向，野村综合研究所还在国外设立了12所调查研究机构，如以美国的经济、军事、政治为主要调研对象的野村纽约办事处；利用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收集欧洲和中东的政治与能源信息的野村伦敦办事处等。

作为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野村综合研究所对日本政府部门的战略、政策制定过程影响深远，曾参与日本政府ICT国家战略的研究、对外贸易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制定工作等。此外，野村综合研究所出版的《智慧的资产创造》《金融IT中心》等杂志均为行业内具有指导性、建设性的杂志刊物，是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智库链接：https://www.nri.com/

峨山政策研究所(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于2008年2月11日，由韩国国民议会的第七任成员兼名誉主席郑梦准博士创立，现有17名全职研究人员，20名项目官员和32名正式员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区域研究、舆论与国内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全球治理研

究。在2013年，峨山政策研究所还推出了月度电子期刊《峨山论坛》，对亚太地区的飞速变化做出解读。

峨山政策研究所在财政上依赖重工集团，但是它并没有唯命是听，而是保持了自己的客观独立性。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也并没有局限在企业范围内，而是着眼于大局，力求推动半岛和平统一，致力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为宣传其研究成果，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研究所定期出版刊物，其中《亚洲新闻》《朝鲜半岛通讯》《东北亚简报》等刊物都比较有影响力，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智库链接：http://en.asaninst.org/

韩国产业研究院（The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韩国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76年，是韩国最大的经济技术研究机构。在华盛顿、东京、布鲁塞尔和中国香港设立了4个海外事务所。研究院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包括产业经济研究、国际产业合作、区域发展研究、小型企业及风险资本企业研究、市场走向分析与经济预测等方面。

韩国产业研究院是韩国最大的科技与贸易情报收藏中心，集贸易、产业、技术信息的收集与研究于一体，拥有韩国一流的调查研究型团队，通过收集信息与分析数据，研究韩国与世界面临的挑战。研究院资料库现有各种情报资料1.2亿件之多，刊物近万种。研究院与海外15家数据资料中心建立了联系，负责收集海外产业、贸易与技术发展方面的最新动向，为韩国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出谋划策。[注]

韩国产业研究院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国家产业发展问题研究，之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教育、卫生、能源、国际关系等领域，成为对韩国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综合型智库。由于韩国政府是研究院最重要

的客户与资金来源，所以智库研究者如果想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就需要按照政府所确定的方向进行研究，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智库的学术独立性。

智库链接：http://eng.kiet.re.kr/kiet_eng/main/

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ndonesia)

1971年，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雅加达诞生，并逐渐成为专注于国内外事务的思想库，为国际社会了解印度尼西亚打开了新的窗口。

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中心下设经济学部和政治与国际关系部两个研究部门。研究中心出版的三大期刊《印尼季刊》（*The Indonesian Quarterly*）、《中心分析》(*Analysis CSIS*)和《印尼经济研究公告》（*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均为行业内具有指导意义的杂志。

研究中心拥有多名世界知名的资深经济学家。比如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列为全球百名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的前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部长冯慧兰（Mari Pangestu）于1986年加入研究中心，并担任过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除了在国内的研究，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还积极加快自己的国际化步伐，先后和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建立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越来越多地促进了包括东盟（ASEAN）、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等在内的多边区域组织的发展，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智库链接：http://www.csis.or.id/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该研究所的宗旨是：“通过对国际问题的专门研究，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同时，普及国际问题相关知识，预测信息颁布，资助奖励日本国内大学及研究团体在国际问题上所做的研究，推动日本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确保日本形成健康向上的外交方案，进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3个方面：国际关系、经济问题和区域问题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和领域有8个：亚太地区、东北亚、美洲、欧洲、俄罗斯和独联体、中东和非洲、安全、经济和全球问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有3个专门的研究中心：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研究中心、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研究中心、裁军和核不扩散研究中心。

智库链接：http://www2.jiia.or.jp/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前身为加菲战略研究中心（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研究所长期致力于军事安全与国际战略领域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研究所建立了两个数据库，一个是以色列国内对于安全与防务问题态度的民意调查，对政府的军事决策影响深远；另一个是中东各国历年来的军事力量数据，对以色列军情部门的形势研判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中，除了专职科研人员外，还会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聘请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加入。如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扎基·沙罗姆（Zaki Shalom），因其在以色列核战略领域的深厚造诣而被长期聘为研究员。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非常重视国际合作能力的培养，比如研究所设立了专门的访问交流基金，鼓励国外的专家学者从事访问研究。研究所还与国外学术机构包括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开展了一系列的战略对话。

智库链接：http://www.inss.org.il/

---

1. 1916年、1922年和1924年，布鲁金斯分别创建了政府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院。1927年，这三个研究机构合并，组成了现在的布鲁金斯学会。
2. 由于刊物投入等原因，2008年，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将《外交政策》杂志出售给《华盛顿邮报》公司。
3. 李轶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 李轶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5. 美国白宫，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uploads/InnovationStrategy.pdf, 2011-02。
6.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国际金融问题专家约翰·威廉森提出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7. 李轶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8. 李轶海等.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附录3
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
——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专家观点集萃

2016年6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举办了“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此次峰会共分五个论坛，分别为“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智库的发展”“智库研究、理论建设与创新”“智库的运营管理创新与人才建设”“新媒体、互联网与智库创新”。这里按照五个论坛的方式，选取一些专家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并希望能够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一些理性的思考与借鉴。

分论坛一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

在国内经济转型与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智库如何创新以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

中国智库不能“一窝蜂”而起，现在智库很多，但许多是翻牌智库，本来是研究院现在叫作智库，本来是一个大学的中心，现在也叫作智库，政府的研究部门也变成智库。智库还是要名副其实。要强调高质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打造高质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有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开放。

首先，中国各种智库总是各自为政，相互联系很少。大家可以探讨、探索怎样在中国的智库之间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联系机制（如紧密型的、松散型的、机构型的、基于项目的），如何使中国的智库不再各自为政，建立一个真正相互联系的网络，形成高质量的智库。

其次，中国智库也要同国际智库建立各种或紧密或松散的不同层次的联系。有时候是根据一个项目比如研究全球化的问题建立联系，只有联系才可能产生活力，只有活力才能够产生真正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和全球最好的智库建立联系、交流，使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有各种不同角度的思想。

只有国内各个智库之间建立联系，以及和国际智库建立联系，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才能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争论中找到真理，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一定要反对“近亲繁殖”，一定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姓、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才能产生最健康的下一代。

希望媒体向智库开放，积极支持，要是没有媒体的支持，关在房子中做研究毫无意义。智库的功用是影响社会、影响决策者、影响世界，所以和媒体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做智库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一是大数据为科学性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二是全媒体为智库研究成果发声提供了最大的平台。大数据和大平台，是中国智库发展得非常好的客观条件，我们要坚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智库。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智库发展有很多重大的战略机遇。

一是决策者高度重视，前所未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决策科学化、对智库的建设如此重视。

二是中国有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亟须解决。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平发展需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对智库参与者来说，现在是发挥聪明才智的难得的时代，不能辜负时代的期望。

三是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智库形成了期待、共识和合作。

四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为中国的智库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条件和资源。

五是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研究公共政策提供了很多新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等。

中国的智库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现今智库数量增长很快，核心问题是质量。怎样为决策者、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管用”的政策研究成果是重点。每年中国智库提供的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庞大，但其中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却不多。所以下一步中国智库的发展要着力提升公共政策研究的质量。

首先要有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领军人才，其次是其他方面如研究手段、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以及智库文化等。智库文化除了智库内部自身的严谨求实之外，还需要全社会形成互相批评、互相指正的严肃的学术风气。

中国智库的种类很多，有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企业智库等。我服务的机构是一个官方智库，我体会最深的是要想聚集高端人才，给他们创造一个能激发他们智慧的平台，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完善。对官办智库来说体制机制问题是核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

了不同于美国、英国、欧洲，中国大量的智库具有官方色彩，官办智库在整个智库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要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我认为要着力于改革体制机制。去年中办、国办专门制定了关于高端智库试点的方案，对于涉及智库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包括经费管理制度、国际合作制度等，开了个好头，还需要进一步往前走。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和刚刚闭幕的科技大会上谈到了很多科研机构的体制问题，引起了当时在座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只有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取得巨大进步，才能为我们建设高水平、富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和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国的差距就在于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这一届党中央特别是习主席将智库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智库不仅仅是以前所说的低层次、低水平地出招，而是要出高招，乃至要出绝招。要解惑，给民众、给国内和国外解惑；要指路，给企业指路，给政府指路。但这些是一般性的，我们要将智库提到更高的层次：首先，习主席提出智库要引领社会发展，也就是要把它看成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智库的思想产品就是灯塔。同时智库还是人类发展、人类文化交流的罗盘，可以让我们在风浪的世界中有定力、有方向。其次，我们还没有看到智库也是生产力，思想产品是更重要的GDP。现在有智库解释“新常态”吗？有智库解决创新和发展问题吗？发展的五大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但我们还没有提出中国的带有世界性的产品。最后，中国的智库在社会上仍然只起到辅导性的作用而不是决策作用。辅导和决策是两个层次。

如何获得决策上更大的话语权，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战略性。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智库，应该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由现在被动

地解读，转变到引导政府决策。这种转变需要很强的战略性和长远的目光。其次，专业性。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智库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美国的智库有其特点：彼得森研究所提出G2、人民币被低估40%、TPP；兰德公司有另外一套，它最早预言到苏联的解体、加勒比海危机等。最后，还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

最后我提两条建议：第一，针对创新和发展，一个关键是各级智库要参与各级政府的决策会议。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不仅如此，各级智库都要能对政府的决策进行参与，这是创新和发展的开始。第二，思考如何打造有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应该从机制和体制上，把更多的有思想的人才聚集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上升到中国智慧，上升到战略智慧，继而提出大的命题——从利益共同体逐渐走到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处在低层面，如果发展到命运共同体，那么大家面对的所有问题就会趋于一致。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迅速上升，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能力还很弱，发声的机制和平台很少，原因在于没有一个能够参与国际交往的智库体系。

美国的智库有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交往经验和传播经验，而我国才刚起步。现在从党和国家的高层一直到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智库的重要性。把中国特色的智库推向世界，在智库领域中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势在必行，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任务和挑战。

最近两三年智库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但问题也存在。如发展太快，仓促而就，很多是过去的机构的"翻牌"，这种发展思路

值得商榷。有人说中国智库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细看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智库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发展。

首先，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智库是服务于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复兴，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战略，因此要站位高一些，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观念、树立更广泛地参与和服务于社会的意识，这样智库才能办好。

其次，智库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事情，要加强对智库发展的政策支持。智库发展中面临很多政策上的瓶颈，比如涉外研究的智库从事“走出去”和“引进来”、举办国际会议等，与外事部门的规定的衔接有时会遇到重重阻力，可见政策支持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同时，财政支撑也是智库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必须研究和解决。

最后，要解决人才支柱的问题。很多智库是空壳的，真正能够起核心骨干作用的人才严重不足。

政策支持、财力支撑、人才支柱是中国智库走向未来必须关注和重点解决的问题。

智库在发展过程中，还要重视能力建设问题。

一是智库要产生思想，提出意见和建议，给社会以启迪，给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以启发。与学术研究不同，智库研究并非烦琐的历史考证，它的重点是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有预测性和对策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我国的内政外交两个大局。必须把研究能力的建设重点放在这个方面。

二是交往能力建设。智库必须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同行对话，要求智库更多地思考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扩大交往，通过交往学习借鉴国际智库的成长经验。我们的智库起步晚，所以交往能力

要进一步加强。不仅仅是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进行交往，和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埃及等次大国的智库也要开展交往，拓宽交往面才能扩大视野，博采众长，真正做到包容互见。

三是传播能力。智库要加强传播能力建设。智库产生的成果，形成的思想、观点、意见、建议，最终是要提供给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智库的研究成果只有被有关部门采用，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才能实至名归。

政策研究创新是要有前瞻性、未来性和储备性的，那么如何解决政策研究创新和现有政策的冲突问题？

魏建国： 前瞻性不够的关键是站得不够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得高，才能总揽全局。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点很必要：一方面，要利用好现有的大数据。举个例子，当前“一带一路”最需要和我们进行产能合作的是哪些国家，可以通过大数据判断。另一方面，智库应该看到国外使馆及研究机构多而全的文件，这一点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一些社会智库来讲很有必要。

隆国强： 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怎样把长期的战略性研究和短期研究统筹好，战略性研究讲的前瞻性和储备性是长期问题，针对性是短期问题，每一次短期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字路口，而长期问题是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缺乏长期战略研究指导的短期问题研究很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一定要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结合起来，在长期战略性研究的基础上再来研究短期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想要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是要有宽松的研究氛围，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强调，内部研究无禁区，对外发表有纪律；二是需要有竞争，中国智库特别多，这给智库之间开展思想产品的竞争提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就是在研究者之间的竞争和激荡中产生的，当然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

龙永图：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虽然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惊人的相似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在中国发生着。70年代的英国与当今中国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讨论前瞻性，就研究一下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中出现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对比思考当中国已经发展到它们相应的发展阶段时，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同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值得研究。

于洪君：智库不能进行前瞻性的研究、预测性的研究，其存在就没有意义，甚至不能称之为智库。但要解决前瞻性研究和现有政策矛盾的问题，除了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借鉴国外经验之外，我国还需要为智库形成一个重大信息通报制度——国家采取重大决策之前与智库进行交流，为智库提供信息，让智库的研究有所依循。同时国家应该给智库适当的培训，包括人才培训和政策培训，还要打破一些学术研究的禁区。要让社会智库发挥先导作用，必须给政策松绑，要鼓励和创造机会，让智库进行超前的研究，进行前瞻性预测性的研究，从而保证智库的生命力。

分论坛二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智库的发展

·专家观点

Jose Chicoma（意瑟斯基金会总干事）

我认为1.0版本的智库是没有学生的大学；2.0版本的智库更多地关注政策研究，政府和智库之间开始产生交流；到了20世纪，智库3.0版

开始形成，在政策议程方面产生了更多的意见，也为公众带来了更多的观点。我认为应发展出4.0版和5.0版的智库，也就是形成新的管理方式，并利用技术进行交流。要产生治理效果，对政府和社会都要产生影响。要多元化发展，丰富人才的构成从而提升创造力。墨西哥的智库承担着向社会提供更多信息、使民众拥有更多选项的任务，中国的智库也可以这么做。在发展5.0版本的智库过程中，我们还会面临新的挑战：智库发展存在限制，在金融方面的限制尤其严重，包括税收等；此外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这些问题都给智库的整体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许多国家正在寻求解决方法，而我们坐在这里共同交流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智库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旋转门”，很多历史文献都提到过“旋转门”的重要性。很多专家建议中国尝试“旋转门”机制。我下面的研究就是关于“旋转门”机制对中国智库影响的评估。

我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智库调查数据，来评估在中国“旋转门”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数据测量表明大概50%的智库领导人都有其他类型工作的经验。我用一个表格去衡量智库、智库领导人的影响力，包括学术影响、公共影响力等，用个人和社会网络的相关因素衡量个人网络对智库领导人的影响，用回归模型来展示“旋转门”对智库的影响。当把不同的变量、不同的社会网络因素都考虑在内时，我们看到，在中国，“旋转门”机制与智库的影响力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表格是关于“旋转门”机制对于智库收入的影响，结果同样是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数据还表明，“旋转门”机制对个人社会网络建设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Tim Summer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强调智库的独立性。独立的特征包括：一是智库不应该有机制化的观点和立场，只提供一个研究和对话的平台，然后把研究结果传播出去。二是智库要有批评的眼光。不管是对政府也好，对企业也好，或者是对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好，都要有批判的态度。三是智库要设定好目标，让政策决定者知道方向，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才要有独立的思考方式，特别是对于利益相关方，更要保持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独立性。四是透明性。透明性首先意味着研究成果的公开，这根源于我们非营利的、为公众服务的机构性质。透明性也涉及资金的问题。我们的资金来源有政府的但不仅限于英国政府，会员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捐献、基金会等亦有所贡献。资金来源影响行为方式，所以智库要有一定的自律。五是全球化。在伦敦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国际化的大都市，我们有条件用全球化视角运营智库，建立全球化的人际网络。不管是科学技术创新，还是人文科学创新，必须通过全球化的人际网络才能实现，而且创新在国际网络方面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全球化运营视角就意味着建立人际网络，创新也要通过全球的人际网络才能实现。

唐晓阳（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副主任）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独特的合作模式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智库和大学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其实践性。美国的智库有自身的很多传统，但对中国并不适用。因此我们探索出了适合中国背景的建言献策方式和机构组织形式。用这样的合作方式，使清华—卡内基研究项目中的研究者在专业媒体平台上向国际社会传播思想，同时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其他国家的观点。我们需要创新，创新要求我们产生新观念和新思想，从现存的合作中找到新的东西。卡内基以前聚焦于核问题和苏联的问题，与中国

的合作为其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使其拓宽了视野，于是卡内基研究中心改变了研究方案，项目也不断地扩展，开始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

我的观点可以总结为“CPI”：C是汇集，把不同的部分汇合在一起；P是务实，在新的内容、背景和新时代下选择符合实际的模式；I是创新，通过现实的角度、长远的视角寻找适合的方法。

· 精彩对话

詹姆斯·麦甘[注]：意瑟斯基金会作为一个新生智库，在创新方面的思路和考虑是什么？

Jose Chicoma：作为墨西哥的新生智库，我们的关键是适应现代环境。另外灵活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越大的智库面临的问题可能越多，它们需要寻找内部的平衡。大的智库机构有很多资助者，想要保持独立的研究就必须学会更好地交流。因此对于大的智库而言，升级到5.0版很困难。而对于我们新生智库来说却是非常好的创新机会，我们有更高的弹性和灵活性，能够更好地沟通，同更多机构连接，这是最大的创新点。

詹姆斯·麦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历史很悠久，作为一家传统智库，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Tim Summers：我们最大的挑战是适应世界改变的节奏，资源、权利的配置都在改变。许多老牌的智库想要去创新，试图找到一些新的政策方法来为自己寻找出路。为了适应这些改变，我们的研究要更加灵活，同时还要制订策略性的计划。

詹姆斯·麦甘：智库哪方面对创新的需求最大？

唐晓阳： 智库在两方面最需要创新：一是全球化，在中国，全球化是一个新趋势。中国的企业来到了国际舞台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状况。智库可以和国外的一些机构合作，作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二是交流，如何通过交流影响大众。大众对于智库的批评是智库就像是对政府的重复。如何让智库有自己独立的新鲜的想法，让大众看到智库能够提供真正的价值，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朱旭峰： 我想最重要的创新是组织的创新。中国各类智库探索出自己的道路和获取资源的方式，有自己的生存能力，这就是创新。此外，需要鼓励中国智库增加透明度，透明度能够促进制度改革，促进创新，刺激竞争，还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投入中国的智库建设。

分论坛三智库研究、理论建设与创新

· 专家观点

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

专业伦理是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过多强调治理结构、治理手段、流程管理、质量管理，但这些流程实际上只是外在的控制性手段。这些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确很重要，但我们忽视了智库是由专家组成的，它的行政人员也是具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于知识型员工和专家组成的智库而言，专业伦理本身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治理途径。

专业伦理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价值观。也就是对本专业价值的认知。如媒体行业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是保证公民知情权，所以要传播信息和分享信息。任何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二是指导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准则。精神和原则有时是推动一个世界进步或者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专业伦理是指导个人或团体的一种行为准则，智库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即专业伦理体系。

三是风格和习惯。在一个行业久了，自然会形成独特的观察问题的风格和视角。

专业伦理的治理的功能分为三个方面：

1.积极的功能。伦理的自主性、专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可以抵制不道德的因素和外在负面因素。知识行业大部分都是服务公共利益的一种具有奉献属性的职业，很难飞黄腾达，但仍有很多人出于职业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从事这个行业。

2.指引的功能。使命感和责任感会指导专家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3.规范的功能。凡是专业伦理意识很强的人，行为会有自我约束和规范，比如学术的良知与操守、客观性、科学精神。

专业伦理分为三个层次：责任感、专业认同和资政启民。这是中国智库的价值观。中国智库也应该建立自己的准则，客观性、独立性、科学性、中立性、专业性、服务性、精确性和传播性。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才会形成中国智库的模式，有主体意识和专业自觉的研究人员的智库，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因此，我主张中国智库治理创新要内外兼修、标本兼治、道器合一、主客一体，把科学的管理和专业伦理建设结合起来。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智库创新目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界定了我们智库建设和智库发展能到什么程度，目前智库建设的理论还十分薄弱，所以对基本的理论要探索清楚。智库不能是单学科的，而是要多学科的，对智库基本规律的研究是智库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是从决策者的角度推动智库建设的创新。决策者目前对智库发展非常重视。但是，各级党委政府怎样用好智库仍需创新。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如果研究是自拉自唱，提出的问题与决策者可能相去甚远。所以在智库的管理上的创新要做的是决策者给智库出题目，将决策者、智库研究人员、智库机构联系起来。

三是智库管理方式的创新，要对决策者提出要求。决策的时候只是靠某一类的智库是不够的，应当建立智库综合体，把决策者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交由不同的专业智库共同研究。

四是在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智库发展和运行机制要创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不再由少数人占有或优先占有，这给我们提供了发挥13亿人的智慧的条件和机会，因此智库从选题到研究资料和研究方向都要创新。

有人认为智库“虚火旺，是一窝蜂”，我认为这个说法缺乏根据。中国各级各类智库都不够，不管是质量还是队伍建设上都刚刚起步，智库的管理体制、理论机制都在摸索中，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中国智库的发展。整合高校各学科资源、拓展高校研究领域为决策服务，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我的感想是三个结合三个优先。

三个结合，一是政策建议的研究和基础理论创新要结合。二是社会经济热点和焦点的研究与发挥智库特色要结合。社会的热点焦点很多，智库的选择一定要和自身的关注点相关，发挥自己的特长是关键。三是国情研究和国际潮流与国际动向的研究相结合。

三个优先，第一个优先是在重大决策前送报成果要优先于按照我们自身的计划按部就班地送报成果，报送成果的时机把握非常重要。第二个优先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优先于问题的发现。第三个优先是提炼观点梳辫子优先于复杂的中药铺式的论证。我们在研究室工作最大的经验是要一事一报，同时一定要讲出怎么做。学术界、知识界要给出解决方法而不要太多论述。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智库要发挥作用影响决策者，首先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人数很有限，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还要帮助国家高层、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这实际上难度非常大。很多同志热情很高，但还没有完全掌握窍门，展开铺陈得很多却没有抓住要点，所以也需要专业能力的提升。我们要提升研究的能力，还需要长期的积累。

从国家层面上看，培育智库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有一个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但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既没有必要对初创阶段的一些无序状态过多地指责和苛求，同时也应该抱着更加开放的学习的心态。

当然个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必要的，但最终的竞争力还是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体制的创新实现。智库治理机制现代化，不再受制于体制机制的障碍，才能有竞争力。所以，提升研究能力和治理水平，关键是要落实，这是智库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精彩对话

方晋[注]：中国智库建设现在是不是“一窝蜂”？

李刚：我认为的确存在这种现象，由于咨询公司本身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如果越来越多的咨询公司用智库概念来包装的话，很有可能会使智库概念泛化，这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建立机制和宏观管理的模式来定义智库，宏观的控制还是有必要的。

李晓西：我有两个观点：一是放开竞争，竞争产生后就会有保留、有淘汰；二是控制行政的利益和行政的干预。实际上还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智库中体现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担心了。

徐洪才：首先，我认为要鼓励竞争。但现在同时有鱼目混珠的现象，混淆了咨询公司和智库之间的本质区别。智库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为公共决策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咨询公司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所以存在借智库之名寻求利益的现象。所以也要正确引导、鼓励有序竞争，这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分论坛四智库的运营管理创新与人才建设

·专家观点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我针对主题谈几个核心观点。

一是新时代的智库建设的定位。我们处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下，要以此来考虑自己的定位。二是要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对金融机构产生的挑战。要用新理念、新体制和新机制构建智库，适应时代的需要，针对挑战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基本定位。下面分享一下民生银行研究院在组建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首先，在运营管理机制上，民生银行研究院按宏观中心、金融中心、产业中心、区域中心四个中心来构建。把宏观放在最顶层，金融供给是中心，实体经济、产业、区域是立体的三角形，这个框架运营相当成功，原因是机构定位比较适合，立足点也比较高。

其次，在运作机制上，注重文化建设。在研究过程中也融入了民主、法制、科学等理念。民主表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和课题，都由各个中心集体讨论，再到全院集体讨论，出来的报告集中了全院的智慧；法制化运行表现在每周一召开办公会进行研讨，总结上周工作和展望下一周的工作，形成纪要发送全院，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科学表现在我们主要的报告从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包括历史的纵向，全球视野，以及定量定性相结合，这样易于看清比较复杂的问题。

最后，在人才培养上，要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同时重视内部培训。人才对整个研究的三维框架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

全球智库运营管理应该嵌入管理学的思想。具体讲包括七大要素的7S理论：战略、组织、系统是三个硬件，人才、技术、共享价值观和风格是四个软件。我们借鉴管理学的理论运用到智库的运营，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智库的人才建设第一要务是职业精神。智库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职业素养，急功近利。第二是人力资源的培养，不仅要有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有激励制度，而且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必须同轨。第三是职业考核，智库人员要加强考核。

刘金石（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

高校要发挥好优势办好智库，关键是机制体制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机制，二是运营管理机制。从人才机制来说，关键是怎样把我们高校研究产品转化成智库的研究产品，比如有些高校专门招聘写手，把学术研究的政策含义转换为政府需要的文件，让政府官员能够看得懂。另外，要通过引进智库的领军人才来带动智库建设。

杨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关于管理机制和人才我想谈三点。

第一，我们和其他智库有些不同，我们最初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投资在华南理工大学下设的二级学院，所以，在机制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现在有了大学和中央的资助，是PPP结构。另外一个特点，郑永年教授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郑教授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很高，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形成了五个方向，包括中国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政策、中国经济政策、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国的教育政策。年轻人员就按照这五个方面分配，每个方面有一个主攻方向，然后进行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积累，这是人才的布局。

第二，讲一下关于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智库人才不是学术人才，也不是管理人才。有些人是人才，但在我们智库工作不一定合适。政策研究是团队研究，而不是个人研究，我们希望建成一个以政策研究为目标的团队。

第三，在人才机制和培养方面，我们试行了四个方面。

1.引进人才是合同制。合同制下，如果做得好也是很稳定的。

2.我们要稳定队伍机制，保障收入水平。

3.激励制度。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升迁机制，每年7月有成果评估，成果好的可以提前升迁。其次，引入海外的“旋转门”机制，这一机制建起来以后，对人才的培养和对国家的发展非常有利。最后，使命感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人使命感非常强烈，但现在年轻人的使命感比较弱，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实际收益。所以我们将建立企业的文化、逐步培养起使命感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

4.培养机制。政策研究应该有其特殊的培养机制。

怎样提出政策能使大家接受，我补充三个要素：第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有功效的；第二，提出的时间点是正确的，在这个时间点能使整个社会产生共识；第三，要有实现程序，一个政策是由一组政策组成的，每一步是什么非常关键。政策研究的三个要素是我们许多年、许多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此外，还要重视调查研究，离开调查研究，政策研究是空洞无物的。

分论坛五新媒体、互联网与智库创新

·专家观点

何申权（《环球时报》执行副主编）

自从习主席提出号召以后，中国的智库确实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浪潮。同时，我又感觉到，智库的发展有些迫切但又有些迷茫，不知

道朝着哪个方向走。作为媒体人这种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迷茫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时代变了。今天的主题有一个“新”字，新媒体和媒体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区别非常大。过去微博、微信是新媒体，但媒体的技术在不断地发展、更新和变化，微博、微信很快就会成为旧媒体，新媒体给我们做媒体和做智库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迷茫。在一片混沌、看不清路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找出一条路，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刘细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

在网络化时代，情报无处不在，所谓的情报就是对于信息分析的结果，发现它的一些客观规律的内容。新媒体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在传播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播，这是新媒体的基本特点。我的专业是情报学，情报学的背景是信息交流，实际上这种开放性的交流在学术界非常盛行。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第一本学术期刊出现，几百年来传统的学术性交流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来的交流模式已经对思想的传播产生了禁锢作用，所以催生了新的开放交流。这就是新媒体另一个特点——开放。但我想说的是，新媒体、互联网和智库无论如何创新，都不能丢掉智库的根本，而智库的根本是学术研究。

至于如何做研究，有基本的几点：一是关注古今中外；二是数据模型；三是博弈的特点。智库观点也要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当然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智库的新议题有些是全球性的，或者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但我认为智库的观点还是要有意识形态，逃脱不了哲学的范畴。

讨论媒体和智库的关系，要明确如何利用媒体，发挥智库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媒体成为一个桥梁。通过媒体作为智库的桥梁，均衡各方面利益，能够让智库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周凯莉（封面传媒副总裁）

很多人认为，媒体和智库是两个非常独立的个体，但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号召的提出，智库产品供需增加，智库传播影响力提高，建设智库的壁垒打开了。此时媒体和智库的融合出现了可能。

与此同时这两年是新媒体公司的爆发成长期，媒体和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市场的鼓励，比如智库媒体。但媒体和智库的矛盾是存在的，智库是B2B（企业对企业）、点对点的定制服务，但媒体是B2C（企业对个人），是面对公众的，两者的受众属性不同。但它们可以融合的原因有下面几点：第一，两者在垂直细分领域的创新上是统一的。第二，媒体智库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通过媒体进行智库的品牌扩张，使媒体智库通过互联网来连接公众，同时传播知识。第三，从终极目标来看，媒体和智库都是为了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获知，对智慧的渴望，从而启迪人们改善生产生活，取得社会进步。

媒体智库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有以下几点。

第一，智库在新媒体公司里必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不可能隶属于市场部或者产品运营中心。

第二，创办智库的媒体要有创新力，需要在互联网形态下更新知识，有远见、有勇气。

第三，媒体可以为智库产品产生多维度的传播。

第四，需要用互联网进行更新，因为智库和媒体是两个比较陈旧的模式，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颠覆，进行结构的创新。

第五，媒体智库和所有的智库一样，需要有研究者、运营者和募资者，但我们的研究力量和传统高校智库无法相提并论。媒体的运营

人才非常重要，运营者是心脏，专家是大脑，而通过媒体实现的传播力可能是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

周湘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媒体能够为智库提供的服务有六点。

第一，媒体可以为智库提供专门的版面，发挥智库成果的呈现功能。

第二，可以自建产品，实现媒体从传播者向智库产品生产者功能的转变。比如光明日报成立了智库理论与发布中心，自身也生产智库产品。

第三，通过媒体的传播发挥智库信息放大的功能。

第四，媒体也可以开展评价，体现智库的导向功能。

第五，设置议题，发挥对智库发展纠偏作用。媒体组织论坛和专家讨论，对智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

第六，解疑释惑，发挥智库的公益辅助功能。

邹明（凤凰网总编辑，凤凰国际智库主任）

第一，具有创新精神的智库，要考虑自身资本的运作问题，考虑资本结构的问题，考虑融资的问题。资金对智库很重要，有了充足的资金，甚至可以聘请哈佛的教授来担任研究员。所以智库未来的发展不应当急功近利，要有持久发展的准备。第二，智库创新要脚踏实地。我在俄罗斯同当地律师和中小企业座谈，发现原来有很多问题我

们都解决不了，国内智库研究一点没有涉及，如法律问题、用工问题等。所以智库如果要创新，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提高为国家、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这样智库无论怎么创新都能在社会和国际上立住脚。

·精彩对话

王斯敏㊟：智库对媒体是有需求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但今天智库对媒体的需求经常表现为什么呢？在你们看来智库和媒体间要想建立真正的良性的关系，除了浅层的方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媒体要怎样发挥好作用？智库在媒体面前又该怎样寻求自己的需求点？

何申权：媒体和智库是天然的合作关系，利益完全一致，各自擅长不同，非常互补。智库产生思想，媒体就是思想的经纪人。但目前表现出来媒体与智库的合作相对比较简单。在合作的领域中，后期的合作多了一些，前期的合作少了一些，应该把媒体和智库的合作前置。

摆在智库和媒体面前的有两个根本性的挑战，即生存与发展。媒体和智库有很多共识，很多环节可以深度融合。互联网时代打破了过去行业和行业间的边界，突破的边界越多越能抢占先机，越能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并且获得发展的机会。

刘细文：新媒体、互联网在智库的传播中能够发挥作用，互联网上其实有很多数据，不同的观点和思想能产生一些新的碰撞，这就是一种创造。国际上对媒体智库是这样认为的：通过媒体的传播掌握民意、掌握公众的观点，给智库提供新的思想，继而平衡公众观点。由此可见，新媒体的发展、传播只是一部分，背后的数据分析是关键。

周凯莉：第一，新媒体智库应该学习经济学人智库，和媒体形成互动，在新闻事件和舆情发生之后，通过智库的研讨跟进，形成一条深度挖掘、深度传播的产品链。第二，智库在新媒体中的重要作用是打造产品矩阵。第三，智库必须要有资金的支撑。

周湘智：第一，媒体要提高发文质量。第二，抓亮点。媒体采写人自己也应成为智库研究的专家，这样才能抓住嘉宾发言的亮点和新闻点。第三，要深入讨论，讨论微观的机制和技术性的问题。第四，要发动。在全民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智库，媒体要把社会民间的智慧发动聚集起来。此外，智库本身特别是体制内的智库也要提升媒介素养。

邹明：我还是回到创新。第一，智库作为企业也好，作为思想领域的机构也好，在互联网时代，如果连一个新媒体推广部都没有，就谈不上互联网与智库的创新。新媒体推广部承担了整个智库思想的推广和宣传，通过它才能把智库思想、理念传播出去。第二，一个好的智库必须有自己的大V，必须有自己的招牌，通过它来提升智库的知名度，这是智库在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重要的环节。

---

1. 詹姆斯·麦甘，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
2. 方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3. 王斯敏，《光明日报》智库版主编。

参考文献

[1] ［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潘羽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 陈先才.台湾地区智库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3] 褚鸣.美欧智库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 崔树义，杨金卫.新型智库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 崔树义.国外思想库的媒体推广术及其启示[N].学习时报，2012-03-05.

[6] 崔树义.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J].重庆社会科学，2012（6）.

[7] 戴慧.英国智库考察报告[J].中国发展观察，2014(1).

[8] 丁煌.美国的思想库及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7（3）.

[9] 冯绍雷.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 冯叔君等.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1] 冯叔君等.智库视野：智库在国际重大事件中的影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2]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3] 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世界智库比较研究”课题组.世界智库比较研究.

[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国外智库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注重提升影响力的英国智库[J].管理观察，2013（28）.

[15] [美]加图研究所.加图决策者手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第7版）［M］.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16] 李安方.智库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操作[J].重庆社会科学，2012（6）.

[17] 李安方等.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18] 李建军，崔树义.世界各国智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9] 李凌等.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0] 李轶海.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1] 李桢.智库对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力研究——以社科院系统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2012（6）.

[22] 卢咏.公益筹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3] 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4] 罗德恩.美国第一智库：白宫头号智囊兰德公司的秘密历史[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25] 民间智库“倒逼”官方智库改革[N].新京报,2014-03.

[26] 任晓.第五种权力：论智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7] 任玉岭.国家智库[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28] （汉）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29] [美]斯特鲁伊克.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M].李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30] 唐磊（编）.当代智库的知识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1] 唐纳德·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32]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3] 王辉耀.那三届[M].北京：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

[34] 王辉耀.人才战争[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5] 王继承.兰德公司的成功奥秘[N].中国经济时报，2012-10-19.

[36] 王健.智库转型：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7] 王莉丽.论美国思想库的舆论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2）.

[38]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39]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0] 王佩亨，李国强.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1] 郑永年等.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42] 魏礼群.建设智库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3] 许共城.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

[44] 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J].管理世界，2009（4）.

[45] 杨谧.中国智库的现状与未来[N].光明日报，2015-09-09.

[46] 原松华.建设一流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J].中国发展观察，2012.

[47] 张冠梓，黄晓勇.智库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创新案例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8]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9] 张振华.赢在巅峰：影响中国未来的新智库[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0.

[50] 中国高校智库与特色院校研究课题组.智库之窗[J].管理观察，2013（16）.

[5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52] 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改革智库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上下册）[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

[5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智库及其对华倾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55]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56] [美]詹姆斯·麦甘恩，理查德·萨巴蒂尼.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M]. 韩雪,王小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57] 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

[58][美]詹姆斯·麦甘恩，安娜·威登，吉莉恩·拉弗蒂.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M].王晓毅,张倩,李艳波,郑少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9]王亨，李国强等.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60] Andrew D.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A Stn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1] James G. McGann with Richard Sabatini.Global Think Tanks: Policy Networks and Governance.New York: Routledge, 2011.

[62]Simon Sinek.Start with Why: How Great a Nonprofit That Builds Buzz, Delights Donors, and Energizes Employee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63] Michael E. Porter.“What Is Strategy?”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December 1996.

[64] Thomas Medvetz.Think Tanks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65] Adam Alter.Drunk Tank Pink: And Other Unexpected Forces That Shape How We Think, Feel, and Behave.Penguin Books,2014.

[66] James G.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 Academics, Advisor and Advocates.New York: Longman,1995.

[67] Donald E. Abelson.Think Tanks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ed.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James G. McGann.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2012.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3.

[69]Donald E. Abelson.A Capitol Idea: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70]Murray Weidenbaum.The Competition of Ideas: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Think Tanks.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 2009.

[71]John Sewell.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Washington.DC: Overseas Development Network, February 1998.

[72]Andrew Rich.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3]Paul Brest and Hal Harvey.Money Well Spent: A Strategic Plan for Smart Philanthropy.New York: Bloomberg Press, 2008.

[74]Chip Heath,Dan Heath.Made to Stick: Why Some Ideas Survive and Others Die.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75]Sarah Durham.Brandraising: How Nonprofits Raise Visibility and Money Through Smart Communication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0.

[76]Stephen Denning.The Secret Language of Leadership: How Leaders Inspire Action Through Narrative.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7.

[77]Peter F.Drucker.Managing the Nonprofi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Business Edition, 2005.

[78]Leslie R. Crutchfield,Heather McLeod Grant.Forces for Good: The Six Practices of High-Impact Nonprofit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79]Jim Collins.From Good to Great in the Social Sectors: A Monograph to Accompany Good to Great.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01.

[80]Jim Collins.Good to Great: Why Some Companies Make the Leap and Others Don't.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01.

后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办、实践与探索

2008年，对于全球来说，注定将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年。

放眼国际，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吞噬着全球经济。而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带来后果之严重，更让大家始料未及。回看国内，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雪灾，时值春运高峰，京广大动脉却一度中断。2008年中，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波及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灾难，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5月16日，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在我的积极倡议下，欧美同学会、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举办捐款活动，我担任了赈灾委员会的主席，在现场，我们的募捐额超过了300万元。

2008年，对于我个人而言，同样意义非凡。

回首30年前，1978年，我离开四川，奔赴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广州，之后，我又从广州到了北京，从北京到了加拿大，从加拿大到了中国香港，从香港又回到北京。而这30年间，我的身份也经历了多次转换，从一名大学生到中国政府官员，从留学生到跨国公司高管，从外国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从大学教授到社团创办者。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我决定把人生的精力投入到一个全新的事业——创办一家国际化智库，为我中华之崛起贡献智慧的力量，我称其为自己的“中国梦”。

毅行八年：努力、成就与影响

2007年，首届中国智库论坛在北京召开，长期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十大智库浮出水面。令人遗憾的是，十大智库里面竟然没有一家民营智库。民营智库在当时中国的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CCG成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看上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然而，当梦想照进现实后，你会发现，有时候现实比你想象得更加残酷。对于我来说，除了要维持百余名研究人员的团队阵容外，我们每年还要在国内外举办各种论坛、学术研讨会，大大小小的活动算下来一年有几十场。从2008年创办开始一直到2012年，CCG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我每年需要自掏腰包才能勉强支撑智库的运营。虽然很难，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在我眼中，CCG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公益，我不索求多大的商业回报，而更看重CCG对国家政策的贡献。

容闳，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人士。他没有做官，也没有什么实权，但作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曾为中国学生开启了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20世纪90年代，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自己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呢？我一直在思考。我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人员中，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与以往的公派留学生回国后多进入体制内不同，这些自费留学生回国后多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工作，或自行创业的也不在少数，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体制外的庞大群体，我称其为“海归”，记得1999年凤凰卫视曾采访过我，我当时提出“‘海归’就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意思”。“海归”这个群体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有国际化的视野、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他们有报效国家的满腔热情，他们完全可以对中国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他们也有归属需求、人生诉求。作为一名老“海归”，我开始了对这个群体的深入研究，并相继出版了“海归时代”等系列研究成果。

2012年，CCG在多年的研究和积累的基础上，首创《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相继推出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与《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CCG的蓝皮书系列扩展到企业国际化领域，在对2000多例企业“走出去”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推出了《企业国际化报告》蓝皮书，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2016年伊始，《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注]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总部等全球八十多个地点同时发布，被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智库排行发布会。我国共有9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75强”，CCG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等同时上榜，同时，CCG还入选了全球最佳民营智库50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智库；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CCG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1位。

我和CCG多年的努力在得到社会肯定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的首肯。作为民营智库负责人，我被李克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注]，这不但是CCG的一件大事，也是民营智库的一件大事，因为建言献策渠道不畅是民营智库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隐形障碍，而现在这道障碍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从中透出的光线已经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了民营智库的希望。

穿梭于东西方的这些年，我深刻感受到智库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意味着什么。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同样需要智库和思想等软实力，中国不仅需要企业家，也需要更多以完善社会为己任的社会企业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情结吧。

我们希望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可以为相关专家、学者和智库从业者及政府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在智库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推动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研究人员于蔚蔚、任月园、李苗苗、许海玉、卢文华、李师贤等对本书的有关章节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副总编乔卫兵，也要感谢黄静编辑对本书的顺利出版所提供的积极支持与细心配合。

本书写作周期较长，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但鉴于水平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出现纰漏。我们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以便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王辉耀 苗绿

2016年9月于北京

---

1. 《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连续第九年为全球智库界打造的最具权威性的智库研究发展报告。该智库研究报告旨在研究全球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的智库研究体系，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跟踪研究和综合排名，以加强全球智库的能力建设并提高智库的表现，该项全球智库排名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排名。在《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排名过程中，TTCSP向全世界超过6500家智库，超过7500名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发送智库提名的邀请，由同行、专家推荐入选，最终由专家进行审阅和排名。
2. 作为高级智库，国务院参事室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提出意见与建议，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直通车”的方式向总理建言献策，对政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